

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1985年6月號

總24期

• 月刊 •



削平山頭 防止內戰

鄧小平下令 取消十大軍區

白狼揭秘

刺殺王炳章的交易

本期專題

民族性
傳統文化
與
專制制度

柏楊：認識自己的醜陋面
孫隆基：長不大的中國人



金觀濤的另一力作

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

捐款設立基金 獎勵促進中國民主傑出人士

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經七十四年，中共建國也已三十五年。然而，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權利仍在執政者種種藉口下受到不同程度的剝奪。文革浩劫使人民深刻體會到，中國只有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國家才會長治久安，人民才會富足幸福，中華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為推動中國民主、法治之進程，我們決定：

一、每年捐出二千五百美元，連續五年，共一萬二千五百美元，做為特殊基金，獎勵對促進民主、法治有卓越貢獻之人士。區區之意，旨在拋磚引玉，深望各界熱愛民主、法治、自由之同胞慷慨解囊，少則數元，多至上千上萬，增強該項基金，以獎勵更多的對民主、法治有卓越貢獻之人士。

二、此基金專款專用，特委托中國之春編輯部設立專賬保管，賬目公開。

三、委托中國之春編輯部於一九八五年下半年聘請若干關心中國民主、深孚衆望之人士與捐款者代表組成評選小組，選出一九八五年度得獎人。我們希望各界熱愛民主、法治之人士及中國之春讀者踴躍提名，為未來評選提供寶貴意見。

海外華僑數千萬，渴望祖國真繁榮、真富強，早日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之社會。望大家出錢出力，共襄盛舉，不勝切盼之至。

美國加州華僑 黃雨川、郭平、楊雲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

編者語：加拿大溫哥華華僑譚純先生以真名真姓捐款獎勵中國之春雜誌優秀作品之舉，在大陸留學生及僑界引起熱烈反響。留學生們說：「華僑是革命之母。有堅強的僑胞做後盾，中國的民主運動是有希望的。」在譚純先生的帶動下，美國加州華僑黃雨川、郭平和楊雲先生決定定期捐款，獎勵促進中國民主、法治之傑出人士。我們相信，他們的行動，必將進一步鼓舞海內外爭取民主、法治、自由與人權之人士。據我們所知，譚純、黃雨川、郭平、楊雲諸位先生都不是百萬富翁。譚、黃二位經營中小生意；郭、楊二人則為科技人員。我們希望，他們的慷慨解囊，能夠感召更多人的出錢出力，推動中國的民主事業。

中國之春歡迎僑胞捐款，充實「獎勵促進中國民主法治傑出人士」之基金。對此項基金捐款時，請在支票上特別寫明。中國之春也號召各界僑胞進一步捐助中國之春的各项活動，您的捐助，可獲得減稅（Tax deductible）。

最近，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當前的改革，有「收」的趨勢。

趙紫陽在前些日子召開的六屆人大三次會議上，穿着中山裝，強調經濟改革要「穩」下來。國務院還下達文件，暫時凍結各省、市、自治區自行管理的外匯。看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犯罪，使改革派在恢復派（保守派）的壓力下，放慢了腳步。同時，胡耀邦忽然強調「在思想戰線上不能搞精神污染」，強調黨對新聞事業的控制，這與其在去年底「作協四大」上的開明態度相比，簡直判若兩人。此外，中央一聲令下，各地開始掃蕩較不受共產黨控制的地方文藝小報，甚至有些地區出動警察，強行禁止。一時間，一些老「左」們蠢蠢欲



不是太快 而是不平衡

談「收風」

動，準備像八三年底清除精神污染一樣，大顯身手。人們感到，在改革的春天裏，忽然又起了一股寒流。

為什麼「收」？恢復派認為，前一階段的改革「冒進」了，他們本來就是不主張改革，而主張調整的。改革派呢？他們在壓力下動搖了，企圖以妥協來穩定自己的地位。

早在去年十一月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尚未正式開始時，本刊就曾發表文章，預見到改革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經濟犯罪和貿易赤字等併發症（見本刊十八期三十八頁），而當時趙胡改革派還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出現通貨膨脹。對於改革出現不穩局面的原因，本刊也早在去年八月份出版的十五期上，發表文章展開

討論，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不匹配」，必然導致「跛腳」的「蹣跚」狀態（見本刊十五期三十六頁）。

趙紫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穩」字，等於承認前段時間已出現不穩的蹣跚狀態。那麼，不穩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像趙紫陽所說的那樣，乃由于「追求過高的速度」嗎？

我們的看法是，出現不穩狀態的原因，不是改得太快，而是改得不平衡。一個人走路或跑步，穩不穩，並不取決於快慢，而是取決於是否平衡。健康的人，兩腿和兩臂協調動作跑得再快，也是穩健的。而雙腿不平衡的跛腳人，上下肢動作失調的人，稍一起步，便會不穩，甚至摔倒。

社會改革尤如行路，問題不在快慢，而在講求平衡和協調。在我國當前的改革風中，一直存在着兩個巨大的「不平衡」。

第一個「不平衡」是經濟這條腿使勁向前邁，而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的改革跟不上，甚至在某些方面進行收緊，呈現典型的一隻腳拖後腿的「跛腳症」。一個社會是由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構成的，這些因素彼此互相關聯。我們並不要求在任何社會的改革中，各種因素必須齊頭並進。在某些階段上，個別因素的變化可能是先行的。然而，當該因素已向前大步跨越時，其它連帶的因素的變革必須跟上去，才能求得平衡發展。例如，在我國當前的改革中，一般都承認經

濟改革的步伐不慢，然而，在政治上，在保障言論、出版自由上，却始終未有改善，這就大大限制了人民對改革的參予，限制了輿論做為箝制恢復派、監督經濟主管官員的制衡力量的作用。法律改革跟不上，始終不能擺脫人治的狀態，更使單槍匹馬的經濟改革出現失衡現象。

第二個「不平衡」出在經濟領域自身上。改革派對貿易界、服務性行業和某些輕工業鬆綁，擴大了這些行業中的私有制成分，使這些行業很快出現了生機。另一方面，改革派却不敢對重工業、能源工業、原材料工業進行改革，不允許私有制涉足這些禁區，使這些工業的發展跟不上輕工業、服務業和貿易界發展。這就導致了另一種跛腳狀態：效率低的國營基礎工業拖住了效率高的私有成份較多的民需工業的後腿。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國營企業的幹部，為了獲得額外收入而趕上鬆綁企業的職工，則有可能從事經濟犯罪活動。

所以，改革派在檢討前一階段改革時，只是在速度快慢上打轉轉，是不能找出問題的癥結的。用政治收緊、封殺地方小報、箝制人民言論的辦法，來「保證」經濟改革的進行，只會加重原有的不平衡狀態。

目前，中國的改革有三種趨向：一、停步或回頭；二、繼續跛腳向前；三、調整戰略，進行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的相應變革，使改革平衡而穩健地向前發展。我們寧願經濟改革慢一點，也要使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的相應改革跟上去，否則改革出現摔跟斗的現象是難以避免的。

改革，是關係到中國未來命運的大事，它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我們反對停，反對收，因為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只有堅持平衡而協調的改革，改革才有希望。

中國之春刊頭系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總二十四期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五年六月號總二十四期目錄

" CHINA SPRING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ending at Flushing, NY.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P.O.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社論

3 ■ 不是太快，而是不平衡——談「收風」

讀者、作者、編者

6 ■ 誰是江湖騙子？再提文風問題·去除恐懼 關心民運·
王驚蟄文讀後感·也談中國與外國·要實行民權

(中國大陸留日學生) 高衡權等

特稿

9 ■ 謾罵決不是戰鬥——駁人民日報對中國之春的專罵 (本刊評論員)

11 ■ 請人民日報自重 (中國大陸留日學生) 黎音

12 ■ 中國之春的影響在擴大——評人民日報批判中國之春

13 ■ 與江南的一次會面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高衛國

13 ■ 與江南的一次會面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汪岷

民運報導

15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宣傳組)

19 ■ 壓制民運是迫不得已嗎？——一九八二年赴京告狀記(下)

(中國民聯歐洲分部) 耿晨

國內快訊·時事評論

23 ■ 北京的改革在「降溫」？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黃嘉明

26 ■ 作協四大後的震盪與反覆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李明珏

28 ■ 「貓病院」為何生意興隆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黎音

29 ■ 國內近聞三則 (美國加州華僑) 凝青光

32 ■ 略論文藝管制放寬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余典

32 ■ 中國人何時享受新聞自由 (美國華僑) 周立仁

本期專題

民族性、傳統文化與專制制度

33 ■ 繼承群體主義 發展個體主義 (本刊編輯部)

34 ■ 正視自己的醜陋面 (台灣作家) 柏楊

41 ■ 母胎化與枕墊——中國人的人格成長

(美國堪薩斯大學教授) 孫隆基

編者的話

隨着民主運動的深入開展及民主思想的廣泛傳播，民族性、傳統文化與專制制度的關係問題，再度引起了大家的關注。本刊就此組織了一批文稿。讀者將會發現，柏楊、孫隆基、王炳章和金觀濤等人的分析層次，已較前人所發展，有些概念是新近才提出來的。有的文章雖長些，但讀起來輕鬆、痛快、發人深省。我們相信，這次新的文化反省，必將為將來民運的發展奠定基礎。

國內形勢的發展，始終是不平衡的，很多人擔心有「收」的趨勢。本期對此專門發了報導和評論，目的是堵住「收」風。

美國竹聯幫首領白狼前些日子在加州透露，除江南之外，他們還知道另一個在美華人曾被人謀刺的內幕。此事披露後，各界揣測紛紛。最近，白狼在紐約正式宣佈，這位被謀刺的對象，是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本刊對此有初步報導。

人民日報公開辱罵中國之春一事，留學生中反響強烈，本刊選登了幾篇來稿，希讀者對此進一步發表意見。

下期預告

本刊「民族性、傳統文化與專制制度」專題，邀到了大批精彩文稿，下期將推出另外幾篇重要文章，特別是數篇國內稿件，極具可讀性。

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副主席陳香梅女士最近訪問了北京和台北，與將經國總統和趙紫陽總理會了面。她回到華盛頓後，接受了本刊的獨家採訪。訪問記將於下期刊出。

最近，一位留學美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因個人人權問題，向美國法院控告了美國政府，結果勝訴。這充分體現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本刊已獲得此案的詳盡資料，整個案件既曲折又富啟發性，如獲該位留學生的同意，下期將公佈於衆。

下期還有中國旅法作家張諱的新作。

50 ■ 打破民族性、傳統文化和專制制度的惡性循環 (中國民聯) 王炳章

62 ■ 中國政治轉型的困難所在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 李椿

64 ■ 文化背景與科學技術結構的演變

——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上)

(國內) 金觀濤 樊洪業 劉青峰

● 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

79 ■ 鄧小平欲取消十大軍區 (國內柳平)

● 特別報導

82 ■ 竹聯幫白狼披露：刺殺王炳章的交易 (本刊綜合整理)

83 ■ 王炳章會被刺倒嗎？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南思蜀

● 報導

84 ■ 王克平、李爽在國外嶄露頭角 (中國之春駐歐記者) 黃忠豫

84 ■ 法國的中國人權演講會 (中國之春駐歐記者) 黃忠豫

● 大陸專欄

85 ■ 「我們要和人一樣生活！」——請聽城市待業青年的呼聲 (本刊編輯部)

86 ■ 待業何時止·真理在哪裏·給我們工作 (國內待業青年供稿)

● 台灣專欄

87 ■ 台灣之路 (旅美華人作家) 阿修伯

● 僑社專欄

90 ■ 「零的突破」及「知音」觀後 (德國華僑) 杞人

● 文藝園地

91 ■ 爭牛權的胡大狗 (小說) (中國大陸新移民·香港) 黃流

90 ■ 毛澤東地下讀「中春」 (小幽默) (國內) 洋廣

98 ■ 黃昏的鐵路·春之夜思 (詩二首) (中國大陸留學生) 劉宏平

98 ■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政治笑話) (國內) 秦恒

● 封面

四個堅持——中國專制制度的最新表現形式。(圖為雲南玉溪縣城街頭宣傳畫——本刊特邀記者韋鋒攝)



讀者、作者、編者

誰是江湖騙子？

編輯先生：

我們是正在日本學習的中國公費留學生。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第八版刊登的《江南先生印象記(二)》我們看過了。說實話，我們對於這篇文章借江南之口攻擊中國之春感到震驚。《人民日報》第一次點名批評中國之春，就這樣惡狠狠地、咬牙切齒地進行咒罵，把一頂頂骯髒的帽子扣在中國之春的頭上

，我們認為這不是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態度。反而，文章的作者倒給我們留下了專橫而又不文明的印象。

每一期《中國之春》雜誌我們都能讀到，由中國民聯日本分部寄來。我們覺得《中國之春》是一個嚴肅、正派的刊物；中國民聯是一個嚴肅、正派的團體。儘管你們有的觀點和提法我們並不完全贊同，但是，你們要在中國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主張我們是擁護的。從你們的文章中，可以瞭解到你們完全是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態度是忠懇的，意見是坦誠的，立論基本是公正的，根本看不出你們有什麼野心。我們和中國民聯在日本的成員也有過多次接觸，發現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熱愛祖國，關心人民，有着美好理想的天真坦率的青年人。把這樣的青年污蔑爲「江湖騙子」，「政治娼妓」真是太不公平了。

令我們感到奇怪的是，現在國民黨天天在攻擊共產黨，可是共產黨却揚著笑臉一廂情願地做着握手言歡的姿態。然而中國之春只是向共產黨提出一些利國利民的意見和建議，共產黨就如眼中釘、肉中刺，恨得入骨三分，這就使我們不解了。不給人民群眾講話、提意見的權力，却對來自國民黨政權的咒罵與攻擊表示出容讓，不知這又是什麼「新精神」？

這又不禁聯想到我們自己的命運。我們也如你們一樣，是一群留學生。今天俯首貼耳當個「書獃子」，我們就會受到黨的表揚和愛護；如果明天我們給黨提出一點什麼犯忌諱的意見來，很可能朝夕之間就被罵成「江湖騙子」、「政治娼妓」乃至「反革命份子」。嗚呼！多麼可怕而又可悲的事，真是不敢去想呵！

(中國留學生、日本) 高衡泉等

一九八五年元月

再提文風問題

編輯先生：

我和我的朋友們，接到每一期「中國之春」，最愛看的首先是「讀者來信」，因為它們是反映各種讀者心聲的窗口，然後是簡訊、雜文、短評，這類文章，一事一議，言簡意賅，讀得快，印象深。對於某些長篇宏論，如果沒有顯見的重點，拉拉雜雜不知所云，則僅偶爾涉獵，往往讀過反而後悔。

記得在文革中逍遙在家無所事事，那時我是什麼到手的東西都要細讀的，但是今天在日理萬機的美國生活中，可看該看的東西太多了，這就要挑。就是說，有了競爭，就要適應讀者，提高質量。讀者在你的雜誌上費了時間而不得要領，下次就可能改讀別的雜誌了，同類的雜誌還是有的。

在貴刊兩年來稿源逐漸豐富、內容逐漸充實的情況下，我建議對三頁以上的宏文多作編輯功夫，至少要加上幾十字的摘要，提綱挈領，叫讀者諸君一見而知取捨。比如第二十三期上「新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從『毛澤東選集』五卷看毛澤東的知識份子理論及政策」一文，恐怕就有鬆散冗長之嫌，而內容又乏新意。如果壓縮一半，則讀者編者兩利。

順便說一句，貴刊的「稿酬每千字二十五至三十美元」的辦法，不分等類，是否有改進之必要？

忠實的讀者

高海平(大陸學者)
一九八五年四月六日

去除恐懼 關心民運 ——兼答幾位關心我的老朋友

編輯先生：

自從爲「中國之春」寫過幾篇小文，好幾位朋友在不同的遠方來信來電話，諄諄囑勸，一致認爲最好「莫談國事」。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中國歷代的文字獄，又從蔣介石對待李公樸、聞一多；毛澤東對待胡風及老舍與近幾年魏京生、王希哲的被囚；江南的被刺殺……等，論述了一個中國小民，談政治就是禍！

和那些老前輩與有名的民主鬥士相比，我寫的那一點點實在微不足道。而我這班至親好友（甚而影響了我太太），便都爲我捏一把汗，關於此一問題，我想借貴刊一點篇幅，表明一下我寫稿的用意并公開答覆我那幾位遠方的老友。

※※※

※※※

※※※

陳、楊、謝、趙，諸同志和老友：

再一次深深感謝你們對我真摯的關懷。你們勸我不要寫稿的見解，形成於我們親身的經歷，我也衷心感到那是實實在在的，是應當慎重考慮的。我們是白費了青春的一代，當年我們熱愛祖國，追求民主自由，在蔣介石獨裁時期被當作紅色份子；在毛澤東專制時期又被當作白色份子。但歷史已證明，我們所持的理想和意見都沒有錯。如果得到採納和實施，祖國的現狀應比今天好得多。可惜，我們竟因此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況下，遭受莫須有的迫害，至今餘悸猶存。

你們主張不寫稿的另一理由是由據說大陸與台灣的政治已比較從前民主些了。我以爲那祇是兩個執政黨各自在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之後，痛定思痛，才學乖了一點。但鑒於中國封建制度保持過久，養成中華民族封建意識深厚

，使國、共兩黨在被迫地走向民主的過程，總是迂迴而不徹底的。

你們大都誤解我寫稿是爲抒發「宿怨」，勸我要「君子不念舊惡」。陳、謝還提到當年鬥爭我們的人，後來也被鬥，他們被戴高帽遊街，有些還死於非命，境遇比我們慘。但是，你們都忽略了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根本區別。我們是一群手無寸鐵、毫無權力的知識份子，我們運用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祇是爲了充分反映民意，以求祖國的國泰民安；而他們首先是爲了自己和小集團，進行「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爭權奪利。我可以說：經過反右到廬山會議，大陸政治上的正氣全消，凡與「一言堂」相左的意見，誰也不敢提。一切「你死我活」的行動，都說是「保衛毛主席」，再沒有一句口號是爲國家進步和人民幸福的！

打倒「四人幫」後，戴過高帽的人上台了。但幾十年的冤案未算清（也永遠算不清），新的打擊、報復、迫害的案件又陸續出現。代表中華民族俠義骨氣的彭德懷，因爲民請命而被屈至死，祇敷衍地平反了，却得不到應有的表彰。而據前數期「中國之春」揭露，爲保護那具犧牲萬民做他政治試驗品的毛澤東的僵尸，天天浪費無數人力、錢財。還有那殘害國家人民極甚的四人幫首犯，却被免去死罪，優禮有加地供養在「天牢」裏，過着比一般老百姓舒服得多的生活。又如最近見報的，明明是靠吹捧起家的江青的「寵物」，前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居然還頗有風騷地接見大寨農民赴京的代表。

凡此種種，他們確實做到了你們所說的「君子不念舊惡」，而我却懷疑，他們能否真正愛民和反映民意？

趙向我舉例，他去年回大陸一行，接觸到的人，包括共產黨的基層黨委書記，都可以自由地批評毛澤東了。說是民主已大有進步。須

知，毛澤東的錯誤，幾十年來逐點呈現在人民眼前，是鐵一般的事實。莫說現在，就是「紅太陽」當頭猛曬的年代，人民都已私下議論紛紛，難道還敢學從前那樣，把批毛視爲反革命嗎？問題在於中共中央仍未想到要研究毛澤東錯誤的根源和形成的過程，并決心吸取教訓，教育全黨戒絕不民主的專橫作風，反而有很多跡象繼續在毛的「黨天下」的軌跡上滑行下去，試舉最簡單的一例：試問現在各級人民代表，有幾多位不是由共產黨以不同的方式圈定的？

陳又勸我以國家爲重，不要淨寫批評文章。他以為祖國比從前強盛了，海外華僑地位提高了，批來批去，會被外人歧視、耻笑。此外，謝又勸我不如省些時間和精力，打打麻將，找些生活享受，以彌補過去所受的苦。希望你瞭解，我和你們都曾是毛語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真正擁護者，我們主動放棄出國的機會或主動由國外回去參加革命和建設，這是我們光榮的歷史。我們應該永保我們愛國的初衷。祖國要強盛和人民要幸福是不可偏廢的兩個方面。國強如蘇聯，其人民生活却不愉快；聽說台灣人民生活較豐足，但其政治不民主，經濟不夠獨立穩定也是不好的。大陸今天比從前有些進步，但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方面以及在經濟開放政策方面，肯定仍有不足之處。我連續讀了幾期「中國之春」，覺得他們有些主張，正是我們當年所嚮往的，是自孫中山先生以來，我中華兒女夢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我才學着他們執筆，訴說一些個人的想法。在大陸，民辦刊物，困難重重，「中國之春」應運而生是必然的、合理的。我與「中國之春」全體成員都不認識，祇是寫稿的關係。據「中國之春」的報導，目前大陸與台灣都把它列爲禁書，不准進口。我以爲這就是不民主、不自由的具體徵象。一切反動統治者的愚蠢

，何其相似！思想要自由，社會要進步，是無法阻擋的歷史規律。我們從前在國民黨統治下讀共產黨的書，又在紅色專制下傳閱民辦刊物。難得現在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楊告訴他家鄉有一個華僑，過去全家被鬥，現在認為祖國已改進，便捐了一大筆錢回去。這確是很感人的。但熱愛祖國不單表現在捐款上。如果制度不完善，沒有民主監督，聽任官僚主義者貪污浪費，或用非其人，使建設與外貿受騙賠本，則及時的批評建議，比經濟支持更重要得多。

趙寄了些他去特區參觀的照片來，說開放使大陸面貌一新，人民生活也有改善。但因此，我們便該滿足了嗎？便可放過其他方面帶根本性的缺點了嗎？我是不同意的！指出國家現行政策的不當和不足之處，是人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儘管過去被別有用心政客、黨棍們給我戴上「左派」及「右派」的桂冠，并吃了不少苦頭，但我至今仍以自己始終站穩真正以國家為重的「愛國派」的立場而自豪。

同時，我還希望你們都能拋掉餘悸，把當年的愛國熱情再拿出來，為最後消滅祖國的殘餘封建意識而共同努力！

鍾衡一九八五、三、五

要實行「民權」

中國之春編輯先生：

鄧小平認為台灣方面所謂「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未免不切實際；他還在中央顧問委員會講話中，說國民黨在一九四九年前把國事弄得一團糟，足證三民主義是不行的。事實上，在北伐還未完成之前日本已開始有鯨吞中國之圖（濟南慘案），共產黨又另張旗幟，在外患內

憂交迫之下，國民黨並沒有實行三民主義，但這並不證明了三民主義實在不行，現在時移勢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紛紛獨立，中國也解脫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民族主義的理想已經實現了，以香港為例，英國雖能使五百多萬的「港人」過着遠比大陸華人為高的物質生活，還予他們以相當高度的人權保障。至於民生主義，在台灣，人民衣食早已不成問題；在大陸，農村的經濟改革卓著，使百分之八十的中國人溫飽，雖然生活艱辛的地區還存在，民生問題的解決，祇是數年內的事，所以，現代中國的問題，還是「民權」這個死結。台灣當局雖還能容忍黨外刊物，法治的程度仍不高。大陸的大眾媒介，還是當權派的「歌德」工具，最近為了發展經濟，獎勵萬元戶，但嫉妬的人比成功的人何止十倍！出眾之士一經誣告，便會像林彪一樣失了踪，所以政治現代化比「四化」更難，所謂四化，仍不脫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舊套，即使成功了，十億的華人，仍不過是「經濟動物」而已。

撰安

旅美華僑胡明達謹啓三月四日

王驚蟄文讀後感

中春編輯先生：

讀到廿一期談文革專題中王驚蟄君的「歷史的關鍵性轉折」一事。覺得這篇文章，對整個文革作出了相當有份量的評估。我特別欣賞文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原有意識的總崩潰，傳統文化的中斷，為新觀念的產生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以為這是一個有獨到性的見解，

頗有啓發性。這個觀點，為中國民主運動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理想基礎。不知各位以為然否。

八五年三月雲中童於南美

也談中國與外國

編輯先生：

貴刊第廿二期留學生園地，劉田剛先生寫的中國與外國寫得非常精采，看後非但使人發笑，而且可使一些人哭，還可使一些人啼笑皆非。本人讀後意猶未盡，茲列舉數節如後，請貴編輯斧裁是幸。

1. 中國人喜歡談馬克思科學唯物論，而行的却是不科學的唯心論；外國人不管你談什麼論，而行的却是唯物論、科學論、存在論、唯鈔票論、唯汽車洋房論。

2. 中國只有一個馬克思共產社會主義優越論，其餘均是垃圾論。外國則每個人有一個個人主義優越論，不管其它什麼論。

3. 中國人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而領導却實行生產資料分配權益私有制。

外國人民實行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政府領導階層却實行民選公有制。

4. 中國人天天講平等，而天天出現不平等，連坐車乘船坐飛機住旅館，吃飯都不平等；外國人天天講自由，但連打小孩教小孩也不自由，連鄰居都要干涉。

5. 其餘的相信還有很多，希望有心人繼續寫，如中國人講情感外國人講性感，中國人講一元化，外國人講多元化等等。

近好

唐先生上

一九八五、三、廿一

謾罵決不是戰鬥

一駁

人民日報

RENMIN RIBAO



對中國之 春的辱罵

——本刊評論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國共產黨報人民日報第一次點名攻擊了中國之春。在該日的報紙上，崔陳發表了「江南先生印象記」一文的第二部份，文中說：「對於以王炳章等人搞起來的『中國之春』，他曾著文嘲諷，說在美國的土地上結不出中國的民主之果，指出他們接受台灣津貼進行所謂的『民主運動』，是對中國現代史的莫大諷刺，說穿了他們是拋棄大陸的妻女另尋新歡的偽君子，是借愛國之名，行敲詐之實以中飽私囊的江湖騙子，是一群名利薰心，搞政治投機的政治娼妓。」

崔陳將江南樹立為「聞一多第二」的大塊文章，很快把江南事件推到高峯。一九八五年二月份，香港「九十年代」雜誌披露了江南給台灣國民黨情報局七封信報信，明確了江南的情報人員身份。有趣的是，其中一封信公開了「江南先生印象記」作者崔陳的身份。崔陳原為北京政府民航總局駐舊金山辦事處的官員，為江南的策反對象，曾為江南提供過重要情報。崔陳後來回國，任瀋陽民航局票務處副處長，但他答應江南，回國後設法繼續為江南提供情報。

崔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文，歌頌江南，是想主動掩蓋自己的身份？還是北京當局授意他用江南之口攻擊國民黨、台獨和中國之春？其中奧妙，我們不甚了解。無論如何，崔陳的文章「立了一功」，把江南事件推到了高潮。我們不想全面評論國共兩黨這場扣人心弦的「江南惡戰」，我們只想對人民日報借江南之口攻擊、謾罵中國之春發表一些看法。

按崔陳的說法，江南是「反對中國之春的英雄」。事實上，江南對中國之春的態度究竟如何呢？

一九八四年三月份，中國民聯副主席汪岷

先生有幸在舊金山會晤了江南先生。（詳情請參閱本期汪岷先生所撰的文章）。根據汪先生表示，江南一開始就對汪先生的來晤表示熱烈的歡迎，並不惜數度關閉店門去街口等候。當江南先生見到中國民聯的汪岷、李然等先生時，極熱情地與他們搭肩握手，然後請進室內暢談，招待之親切，如同摯友。試想，假如中國之春在江南先生的印象中，像崔陳所描述的那樣，是所謂「偽君子」、「江湖騙子」及「政治娼妓」之流，那麼江南先生還能和中國之春人員坦誠地握手言歡嗎？

崔陳在文中明確寫出：「他（江南）曾著文嘲諷：：他們（中國之春）是：：偽君子：：江湖騙子：：政治娼妓。」我們查了江南先生的著作，並未找到類似的文章。因此，可能結論只能是：1 崔陳根本是在造謠；2 江南當崔陳的面痛罵中國之春，當中國之春的面又肯定中國之春，是一個兩面派，就像他當面籠絡崔陳，背後又向台灣滙報崔陳一樣。

衆所周知，「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報，能夠登上黨報，不管是捧是罵，都是不容易的。崔文明顯地反映了中共官方對中國之春態度和目的。

從短短一百四十多個字中，我們可以看到該文是從五個方面來攻擊、謾罵中國之春的。第一、嘲諷中國之春成不了氣候。其實，這一點不值一駁。所謂「在美國的土地上結不出中國的民主之果」假如成立的話，那麼早年孫中山先生的海外活動所結出的辛亥革命之果及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等共產黨人在法國的革命活動所結出的中國當今的「社會主義」之果，將作何解釋？

第二、從政治上打擊中國之春，污蔑中國之春受「台灣津貼」。我們不知道該文中的「台灣」指的是台灣人民，還是台灣國民黨。中國之春曾直言不諱地宣佈，她接受台灣人民的

记得也是在1982年7、8月份吧，他读到上海的《解放日报》就曾刊登一篇错误文章所做的自我批评，又马上找来原文细看。他说，把人们之间交往的礼数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逻辑上是不通的，实际上，只能起到淡化正在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的作用。但对于大陆上有些青年人为台湾的虚假繁荣所迷惑而产生的错误观念又不能为他所容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他在一家香港杂志上看到有人盲目地吹嘘台湾现状，感到十分气愤，第一次同我激动地讲，台湾到底什么样子，我们过来人最了解。国民党在大陆时的作为你们都知道，逃到台湾后更变本加厉。山东某个中学的校长，带领一批学生随蒋军到台湾。后来这一批学生发觉上当，纷纷要求返回家园。在威胁利诱皆告失败后，台湾当局下令在黑夜中逮捕这些尚不到廿岁的年青人，装在麻袋里全部投入了大海。当时我正在金門采访，同知道这件事的朋友谈起无不掉泪。对于台湾的特务统治，他更是深恶痛绝。他说吴国楨当年就是因为反对特工进入军队同蒋经国发生冲突，继而排挤离开台湾的，从而对吴先生的人格产生景仰。但是，聪敏过人的江南既然对此有切身的体验和认识，为什么就没有躲过暗杀呢？我想除了用他本人对美国法制的迷信，从而放弃警惕来解释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对手的没落和凶残。这是江南生前所没有想到的。(二)

江南先生印象記

崔陳

江南时时关怀着祖国的命运，对于我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种种改革是心悦诚服、欢欣鼓舞的。最让他钦佩的是两个“文明”口号的提出。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乃至一个人，光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即物质生活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王宝钗坐寒窑，物质生活很低，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同相府里的千金小姐生活相比，前者显然是幸福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因而物质文明的建设速度也应快于西欧、北美地区。他的这一真知灼见，已经为愈来愈多的事例所证实。他还不止一次地同我讲，“不管国民党怎样吹，还是不如共产党好，通人情。大陆今天为这个开追悼会，明天为那个平反昭雪，真了不起。老蒋杀了那么多人，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何时认错？他从来没有忏悔过。”可以说，江南同我们是自觉但又不是盲目地保持着一致的朋友。对于台独分子对他的奉承和拉拢，江南嗤之以鼻，坚持不同他们来往。对于以王炳璋等人搞起来的“中国之春”，他曾著文嘲讽，说在美国的土地上结不出中国的民主之果，指出他们接受台湾津贴进行所谓的“民主运动”，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莫大讽刺，说穿了他们是抛弃大陆的妻女另寻新欢的伪君子，是借爱国之名，行敲诈华侨之实以中饱私囊的江湖骗子，是一群名利熏心，搞政治投机的政治娼妓。

江南先生之生平事蹟，...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top left margin)

上圖：「九十年代」雜誌透露的江南給國民黨情報當局的情報信之一。該信為八四年(?)八月三日所寫，主要内容為崔陳向江南提供的情報。

上：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崔陳「江南先生印象記」的第二部分。陰影部分為辱罵中國之春的内容(左圖予以放大)。

鼻，坚持不同他们来往。对于以王炳璋等人搞起来的“中国之春”，他曾著文嘲讽，说在美国的土地上结不出中国的民主之果，指出他们接受台湾津贴进行所谓的“民主运动”，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莫大讽刺，说穿了他们是抛弃大陆的妻女另寻新欢的伪君子，是借爱国之名，行敲诈华侨之实以中饱私囊的江湖骗子，是一群名利熏心，搞政治投机的政治娼妓。

捐款。中國之春創辦初期，就曾收到過台灣人民的捐款，並將數目公佈于世，中國之春不但仍將繼續接受台灣人民的捐助，也將接受大陸人民的捐助，這是光明磊落的。崔文中用「台灣津貼」一詞，可能並非指台灣人民的捐助，而是指國民黨官方的津貼，因捐助與津貼具有不同的涵義。中國之春從運動一開始，就嚴肅宣佈過，她不接受任何以政府名義的捐助。至今，她仍保持這一鮮明的立場。正是因為中國之春獨立于台灣國民黨政府，她對台灣當局的錯誤政策不斷給予嚴厲的批評和譴責，正因為如此，中國之春至今被台灣政府某些人視為「統戰刊物」，中國之春雜誌至今不准合法進入台灣。實際上，接受國民黨津貼的，不是中國之春，而是江南先生和崔陳本人(按：江南情報信披露，崔去雷諾遊玩，花費由江南向國民黨當局報帳)。

第三、從道德上打擊中國之春。從生活道德上搞臭異己，更是中共的慣伎，至於他們所創造的事實，人們早已熟知，故不必舉例。至於他們所謂的「偽君子」，正是「真君子」倒被偽君子指罵為「偽君子」。誰不曉得當初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中國元老就是被一群名符其實的偽君子迫害的呢？

第四、從人格上打擊中國之春。所謂「江湖騙子」，它是從何說起？真是令人覺得費解。中國之春月刊一經宣佈創刊，馬上引起了廣大華僑的熱烈響應和支援。說實在的，若沒有華僑的支持，中國之春是很難維持到現在，並且取得進步的，為此，我們對廣大關心祖國命運的華僑表示衷心的感謝！但相反地，中國之春能維持到現在，其雜誌質量不斷提高，活動範圍不斷擴大，也證明了中國之春並沒有受了華僑之援助而逃之夭夭、消聲匿跡于「江湖」，而是做了大量工作，做了許多的推動中國

民主的事情。

另外，中國之春的創辦之所以會得到廣大華僑熱烈持續的支持和贊助，乃因他們對中國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嚮往，乃因他們對中國現存制度的失望，這難道還不應使中國政府捫心自問和反省嗎？

第五、從動機上歪曲中國之春。中國之春的骨幹多是在國外獲得學位的公自費留學生及各界知識份子。他們若真是所謂「一群名利薰心，搞政治投機的政治娼妓」，他們何苦在國外搞一個民主運動，而不回國搞政治投機呢？試想，在國外搞民主運動除了冒「得罪」中共的險，遭受各種艱難外，有什麼機會可投、名利可尋呢？說真的，在海外，他們不知要艱苦奮鬥多少年才實現中國的民主，他們若沒有一個崇高理想的話，怎會如此地獻上他們的寶貴一生呢？他們假如按時返國的話，要說他們想搞政治投機倒大有可能，因在國內盛行政治投機，也有很多可投的機會。

魯迅先生曾指出：「謾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我們這一代提倡「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青年，決不仿效人民日報那樣無理的謾罵。近幾十年來，中國人無時不在謾罵，但罵到現在，罵出了什麼名堂？同胞依舊兩岸隔離，經濟仍未脫離貧困，科技仍是落後，人民仍未能真正當家作主。這一切表明，感情的謾罵不但解決不了中國的任何問題，反而使人民吃盡了苦頭。因此，我們不主張謾罵，我們崇尚理性。

中共是一個大黨，本應有泱泱大黨的風度，但為什麼對自己培育出來的青年所提出的一些溫和的建議都不能容忍？關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是這一代覺醒了的青年的責任，他們之所以敢于負起這個責任，乃因他們是赤誠愛國的。我們希望中共的人民日報能就這篇文章，心平氣和地做出答覆。

特稿

請「人民日報」自重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黎音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出現，使得中國共產黨十分驚恐和惱怒。當初，他們尚能故作一副持重的神態，祇在限定的範圍中搞點「內部傳達」之類的小活動，用謊言和假材料蒙蔽國內的不明真相者，以期達到「消防」的目的。然而，他們却沒有料到，中國之春並不像中共某大人物所預言的那樣：幾個留學生翻不起巨浪，折騰幾天就會自消自滅。何曾想到，這股巨浪不僅翻到了五洲四海，捲進國內，而且有越掀越猛之勢。特別是隨着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誕生，進一步推動了整個運動的深入發展。在國內，「中國之春」雜誌的讀者隊伍不斷擴大，瞭解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活動訊息的民衆逐漸增多，對於這個運動響應和支援的層面日益深廣。於是，中共開始覺得難以「穩坐釣魚台」了，焦躁中夾着憤怒，憂慮中帶着怨恨，終於一改做作的不理睬而張口罵人了。

以往，中共攻擊中國之春祇是在背地裏進行。或偶爾散佈一些謠言，或借機來上兩句罵詞，並未動用過官方的宣傳機器，可以稱之為「私罵」或「暗罵」，但在不久前的「人民日報」上，却赫然登出一段點名攻擊中國之春的文字，這可是開始「官罵」或「明罵」了。

署名崔陳所寫的「江南先生印象記(2)」，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第八版上。作者以回憶江南先生為名，實際是假故人之口在連篇累牘地責罵東西。給人的印象似乎江南

先生在生前竟是一位牢騷滿腹，罵人有術的作家。不知江南先生在九泉之下得知他的「朋友」向世人為他樹立了這樣一種形象，能否瞑目？

崔陳的文中談到，江南先生生前曾經著文嘲諷中國之春。將一貫堅持獨立立場的中國之春誣蔑為「接受台灣津貼而進行所謂的民主運動」，把勇於獻身，正在艱苦奮鬥的民運志士咒罵成另尋新歡的偽君子，是借愛國之名，行敲詐華僑之實以中飽私囊的江湖騙子，是一群名利熏心，搞政治投機的政治娼妓」等等。這種潑婦罵街的腔調出自文明社會的一位作家之口，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果然，尋遍江南先生所有的著作，並未發現他曾寫過上述的文字。「人民日報」乃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報，其刊登之大小文字都是經過精心設計選擇，嚴格審查把關的。因此，署名崔陳者借江南先生之口而對中國之春的污辱，無疑是中共對中國之春仇視的發洩和蓄意的攻擊。不過這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罵街行爲，使人覺得過於低級而庸俗，有堂堂大黨之風。

其實細想起來並不奇怪，中共搞政治鬥爭歷來不擇手段。無論是自己內部的派系傾軋或是攻擊它的政敵，他們都常用一種招術，叫做「先從生活上搞臭，再從政治上搞垮」。特別是對於那些在政治上難以攻垮的對立面，總是先從生活方面下手，採取迂迴打擊戰術，常常是用編製的流言，給人栽上難堪的醜聞，或以

臆造的蜚語，給人扣上不名譽的「帽子」。力圖將對手從生活上搞臭，以達到孤立對方的目的。之失去政治上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的目的。

當年「文革」揭發鄧小平曾多次棄妻再娶，生活腐化，所以罵他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更有曾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過的要員揭發周恩來，說他在敵人的監獄中曾以「伍豪」為化名發表脫黨啟事，以求苟活，為此又罵他是「政治娼妓」。所以有些語言聽起來並不陌生，因為已早有先例。

記得在批判林彪時，中共內部曾拋出大量材料，不厭其煩地大談他生活如何糜爛，毛澤東死後，「改革派」與「凡是派」較量初期，從中共內部又爆出了毛的鮮為人知的「宮廷醜聞」。內部是如此。對外，在批判所謂「蘇修」的「九評」中，為了從生活上搞臭「蘇修」，因而大談蘇聯的領導層如何資產階級化，甚至每人有多少條領帶，多少套西裝、襯衫、襪子也都罵進了洋洋大觀的論文之中。總之，無論對內、對外、對洋人、對古人，中共為了政治上的需要，總是可以變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來。

中共還有一種說話粗鄙的毛病，也應當改一改。當年毛澤東口頭常講「放屁」、「婊子」；鄧小平當眾罵人「胡說八道」；胡耀邦在日本給留學生作報告時就冒出一句「他媽的」，至今傳為話柄。可能由於中共領導人「語風」如此，所以影響到「人民日報」的「文風」亦然，使得罵人的文章也登上大雅之堂。但是，罵人和說假話不僅不符合「五講四美」的要求，而且是理虧，無能和淺薄的表現；謾罵和攻擊祇能使人厭惡而永遠不會使人信服。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組成，是以中共派出的品學兼優的留學生為主體，今天中共反來攻擊他們是「江湖騙子」、「政治娼妓」，這對於中共自身是多麼大的諷刺！廣大愛國華僑出

於對祖國前途和十億同胞命運的關注，無私地援助民主運動而竟被貶為是受到「敲詐」的結果，這對於廣大愛國華僑的人權地位又是多麼令人難以容忍的歪曲和藐視！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是尊重中國共產黨的，儘管持有不同的政見，但討論問題的態度一貫嚴肅認真。希望中共能放下大黨的架子，聽納幾句逆耳忠言，這對於國家和民族都是有益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存在和影響已是一個既定的事實，既然這個事實已經無可迴避，中共不如就正視它，面對它，豈不更顯得做事實際而有風度？「人民日報」既已點了中國之春的名字，也應給中國之春說話的位置，這樣才算公平而講民主。所以最後一個希望是「人民日報」能與中國之春展開說理討論，而不要謾罵攻擊，但不知中共是否有如此胆識？

中國之春的影響在擴大

——評人民日報批判中國之春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高衛國

人民日報最近借作家江南之口，對中國之春及其他海外民運刊物，潑了一瓢污水。

然而我們從中得到的第一個信息是：留學生的海外民主運動已經在大陸產生了深沉的共鳴，影響之深遠，已到了使官方的態度由不理

不承轉為不得已要認真對付了。這是一個鼓舞，也更加強了我們的責任感。

既然是借他人之口，偷運私貨，就難免要把馬腳露出來。第一個破綻是：按崔陳的說法，江南曾講：「在美國的土地上結不出中國的民主之果。」意即：中國之春運動是無用的。那麼，江南怎麼評價他自己的創作活動？歷年來海外廣大僑胞有識之士關心國是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將付之東流？此話如果出自村夫野佬之口，可視作情有可原，然而要強加到一個享有聲望的作家頭上，顯然不倫不類，即使真如此話，也難為官方專論所乘，因為它既否定了孫中山先生和中共領袖周恩來、鄧小平、朱德、劉少奇的早期海外革命運動，也否定了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山鼻祖馬克思列寧在流放期間的革命活動，那不是水淹龍王廟了嗎？

另外，通觀全文，但聞切齒格格有聲，甚至使用了「敲詐海外僑胞」、「江湖騙子」及「政治娼妓」這類任何稍有海外生活背景的智慧的人士不大可能使用的語言。足見執筆人眼界之狹隘，手段之低下，非從上司之命者而不能為之。現在，江南已經作古，但我們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一向立場持平，少有過激言論，海外留學生運動更與他無涉，何來此深仇大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而用他人的威望，來拉大旗作虎皮，則為論者不可取之策。

近來不少留學生接到了大陸來信，關切中國之春等組織到底是怎麼回事，可見「文革」之後的中國人，已難輕信一面之詞，以我們切身的經驗，你越是容不得她，人們就越有興趣搞個究竟，當初「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中國人的這種癖好，不是已經表現過了嗎？隨着時間的推移，以及民主運動本身的成熟、擴展，人們是會理解、支持，進而認同的，因為這是歷史的潮流。

與江南的一次會面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汪 岷

一九八四年三月，也就是去年江南被害前的幾個月，我因為要替林希翎到美國西海岸演講作一些安排事宜，從紐約飛到了洛杉磯。和我接洽的「加州論壇報」副社長阮大方先生，向我大力推荐江南，說他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很感興趣，我早已對江南先生的文章，心儀已久。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帶着阮先生的親筆介紹信，飛到了舊金山。

江南先生的禮品店，座落在美麗的舊金山漁人碼頭一個商場裡。一到舊金山，我就給他一個電話，江南在電話裡連說歡迎，說早已收到阮先生的長途電話，今天一早就在店裡等着我。然後他說怕我是大陸留學生，認不得美國的路，要詳細地給我說明來的路途標誌和方位，還生怕商場裡岔路太多找不到他的店，叫我在商場外面的交叉路口等着，他會關了門來接我。放下電話，我真爲他替人着想的細心感動。

可是我也實在是夠「鄉下人出城」的了，等了二個交叉路，都等錯了方位，害他連關了三次店門，往返六次，跑遍了每個街角，最後

才找到；我還在糊裡糊塗地東張西望，他哈哈大笑地走過來，摟着我的肩膀，熱情地與我及和我同行的中國民聯的李然先生、楊明山夫婦握手，把我們請到他店裡去。

聞名不如見面，江南果然是個很「四海」的人，話一拉開，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名人逸事，噹噹地說個不停，從上午談到下午，整整六個鐘頭，其中還包括一頓豐盛的午餐。

江南是個政治感很強的作家，特別是對台灣政界的人與事，來龍去脈，真是瞭如指掌，如數家珍，增加了我不少知識。對於蔣介石先生，他是推崇的，他對我說，蔣介石是中國繼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後的第二個偉人，見我沉吟不語，又補充解釋說，蔣在四九年前的失敗是由於很多方面的歷史因素，到了台灣以後，他是勵志改革的。說到了蔣經國先生，江南說，「蔣經國傳」是既有表揚，又有批評，基本上不是持否定態度的，他還說，如果蔣先生是個開明的人，應該同意他的觀點。他一再強調，寫「蔣經國傳」的動機，不是要拆蔣經國的台



本文作者與江南合照於其店內

。他說：「我認爲在台灣並沒有適當的人取代蔣的位置。」他笑了笑說：「我還幫了蔣家不少的忙哩，我把我在奉化拍的照片，都托人送給了蔣家。」

我們又談到了大陸的政治和政治家們，對於大陸內的開明派和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別令我驚訝的是，我們基本上都能取得一致的分析 and 評價，對於一些他沒有聽過的事，他都能很虛心的聽取，並且馬上就能作出邏輯上的判斷。他極力勸說我在政治傳記方面作些事情，他說，「目前甚至以後一段時間裡，只有在海外才能寫得出比較客觀的政治傳記。」他勸我先從陳毅開始寫，還答應爲我收集一些資料，誰想得到，他的這份熱心，竟未能完成，就先離開人間。我只能把感激之情長留在心間！

江南還談到他對很多大陸作家的印象，特別是在他家住過的大陸訪美作家，對他們的身世、言談觀點，待人接物的態度以及成就評價，都侃侃而談，而且看法很中肯。他對王蒙的

印象最好，在他認識的那麼多個作家之中，王最有突破，對人說話誠懇，思想開放，和他最投機。我向他介紹了很多大陸新一代的年青作家，特別是在天安門事件以後湧現出來的二、三十歲的前衛作者，他非常感興趣，他答應以後到大陸去時，一定爭取和他們見面談談。

對於「中國之春」雜誌，江南對我提了很多寶貴積極的建議，他知道在美國辦一個中國人的月刊很難，幾乎沒有人成功過。他建議我們搞得更加生動活潑，適合海外華僑的特點，搞活版面，開闢廣告欄，還可以同時搞一些如書展等文化商業活動，以增加影響和收入。他提出要將「蔣經國傳」的廣告給我們，我答應了，不料我回紐約，他赴大陸，這件事竟擱了下來，未及再聯繫。唉！這又是一件我深以為憾的事。

記得那天下午，我和江南兩人喋喋不休，互相搶着說話，他連生意也不顧，我的同伴幾次跑進來告訴我，我們倆還是停不下來，一直拖到四點多，我的同伴進來對我們下了「最後通牒」，說他的車要吃警察的罰單了，我們才依依不捨地互相道別，拍照留念。他又關了店門，一直把我們送到車上。一邊走，一邊反覆地叮嚀我，在見到他的老朋友作家高準時多多關照他保重。

唉！江南，你給高準的話，我帶到了，你對我的話，我也照辦了，可是，你呢？

江南先生，你被害之初，被北京捧到天上，成了聞一多式的英雄。事隔數月，忽然你又成了北京、台北和美國的三面閻羅。

望着照片，我還有什麼好說呢？政治如此，人生如此！吾等天真晚輩，又怎能理解？江南，你能給我解釋這一切嗎？

略論文藝管制大放寬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美國）

余 典

據中國新聞社北京消息：中國文化部長朱穆之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主張，要賦予文化藝術單位以應有的自主權，並且主張文藝不從屬於政治，也不等於政治。這一主張是中共執政以來對文藝管制的大放寬，也是改革政策在文藝方面的體現。

朱穆之說：過去把文藝當作政治的見解，嚴重的妨礙了文藝的發展，因此不再提文藝從屬於政治的提法，是消除「左」的思想影響的重大成果。

提起文藝政策，不禁使我想起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文章，我在「政治學習」時學過多次，雖然因為是被動學習，沒有真正興趣，但覺得他說得頭頭是道，冠冕堂皇：「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文藝要「歌頌人民，揭露敵人」「文藝要向工農兵普及，為工農兵提高」，在文藝批評中「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等等。但這些都是理論，在實際運用中，使我發生了疑問：有的作品是符合於「講話」精神的，怎麼一下子變成了毒草呢？例如「紅日」是寫國民黨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戰敗死亡的，是歌頌解放軍的軍事勝利的，怎能是毒草呢？同樣歌頌彭德懷的「燎原」和歌頌賀龍的「洪湖赤衛隊」也不能算毒草，否則就只有歌頌毛澤東的文藝作品才算是香花了。所以根據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毛澤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毛澤東，一切文藝也就只能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文

藝。而倒霉的是，有的作品一旦被認為是毒草，作者也要受到批判，有的被劃為「右派分子」，受到鬥爭和虐待。例如作家王蒙、劉賓雁、鄧友梅、秦兆陽、艾青、陸文夫等等就有過這種遭遇，邵燕祥、高曉聲、劉紹棠、白樺以及老一代的作家丁玲、馮雪峰、徐懋庸、姚雪垠等均曾被劃為右派。這些人大多是共產黨員，他們按「講話」的指示辦事，對共產黨忠心耿耿，但好心不得好報，使人覺得「曹營的事難辦」。

在改革派上台以後，文藝解了禁，許多作品可以閱讀了，一度禁止的電影又上映了，許多傳統劇目也恢復上演了。但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文藝又受到了衝擊，連中共黨內理論權威周揚也因「異化」問題而受到了批判，作家白樺又受到了批判，表現「人性論」的「人啊！人！」受到了批判，有些著名文藝界人士如李谷一，劉曉慶也受到了批判，過去受過沖擊的人更是憂心忡忡，擔心挨整，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所幸這次來勢甚猛的反右風暴因得到了糾正而不久流產。

這次朱穆之主張文藝不從屬於政治，顯然是與毛澤東思想唱反調，也是中共文藝政策的突破，但實際情況將會怎樣發展，尚有待事實證明。

我們認為中共放寬對文藝的管制是好事，但究竟要放寬到什麼程度，應該按照法律的規定，而不是靠任何人的句話，也不是靠那一次會議的決議或共產黨的一個什麼文件。其實國家本來有憲法，憲法中規定了人民的各種權利，只因中共執政以來，憲法從來未有得到過執政者的尊重，否則一部文藝作品怎能任意說成是毒草？又怎能把一個從未犯法的人劃成右派呢？所以中共的文藝管制大放寬不過是使人民多獲得一些他們依照憲法應該享受的權利而已。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國內民運人士組成公司推展民運

國內放鬆經濟以來，刮起了一股「公司風」。各種非政府控制的貿易公司、智力開發公司、諮詢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起來。借助這種形勢，國內民運人士和中國民聯國內若干小組也組織起公司，或進入別人的公司，展開民運的串聯工作。利用公司形式的好處有：(1)合法；(2)接觸面廣，易於聯絡志同道合者；(3)易於建立海內外聯絡渠道；(4)以商養運，即通過合法賺錢手段，支持國內的民運活動。

因勢利導地開展民運工作，是一個重要的民運經驗，值得提倡和推廣。

中國之春雜誌

進入大陸的數量增加

中國之春雜誌創刊以來，每期均有一定數量的雜誌通過不同渠道進入中國大陸。國內民

運人士在獲得中國之春後，爭相傳閱，有的還進行了翻印、傳播工作。後來，公開郵寄的渠道被阻，例如美聯社寄往北京分社的中國之春即被中國海關扣押，海關在給美聯社北京分社的通知中，稱中國之春在政治上、經濟上、道德上、衛生上對中國是有害的。儘管如此，還是有其它管道輸送雜誌進入國內。在一九八三年底進行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不少大學及科研、衛生單位也展開了對中國之春雜誌的清查，有的單位黨委負責人公開宣布：凡有中國之春雜誌者，一律上交。據出國留學生報告，僅華東某大學內，就有數期中國之春雜誌在流傳。

令人費解的是，北京當局雖然禁止人民與中國之春雜誌接觸，但執政者自己却有權閱讀中國之春。據反映，北京的一些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圖書館和閱覽室，都有中國之春雜誌。去年，以教育部副部長李滄為團長的慰問團



二月二十四日，中國民聯澳洲分部成員在墨爾本唐人街春節慶祝活動中散發宣傳品（詳見上期報導）。

赴美慰問留學生時，李滄副部長就曾在私下說過，他經常閱讀中國之春雜誌。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思想是封鎖不住的，隨着中國之春運動的深入，認同她的宗旨的人愈來愈多，自覺地傳播民主思想的人也愈來愈多。由於各界的幫助，最近一期進入大陸的中國之春雜誌，已達數千本之多，估計今後的數量還會增加。

中國之春雜誌已根據憲法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申請，要求在國內合法註冊、合法出版和發行。

最後一提的是，國內的幹部和人民是很渴望讀到中國之春雜誌的。前些日子，一位留學生回國探親，攜帶一些中國之春入境，雜誌被



與會代表們在年會上選購中國之春雜誌。

海關扣留了。據海關內部講，這些雜誌成了海關人員最有興趣閱讀的刊物。現在，海關也放了留學生一把，發現有中國之春雜誌，只要放下就行了，並不追究，海關人員內心說不定還感謝留學生給他們帶來精神食糧呢！帶中國之春雜誌回國探親的留學生，雖然雜誌被扣留在海關，人却能安全地返回海外。這說明，認同中國之春觀點的人愈來愈多，國內當政者也開始正視這個現實了。

中國民聯活躍於亞洲學會年會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中國民聯總部派出王炳章、黃仕中、李兆欽和林樵清四人，參加了在美國費城舉辦的亞洲學會年會。該年會規模較大，約有近千名研究亞洲問題的學人參加，很多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出席了會議。中國民聯的代表在會議期間展覽並

出售了中國之春雜誌，與某些中國問題專家廣泛交換了意見。中國之春雜誌的記者還採訪了有關專家。

二十三日晚，中國民聯代表邀請了出席亞洲年會的部份中國大陸留學生及訪問學者，就當前中國大陸的形勢發展舉行了座談。

中國之春為留學生 人權呼籲獲得成效

一九八三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留學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的公費生陳章和留學美國麻省波士頓東北大學的公費生包斯琴，因受到中國國內某些部門負責人和駐美使館負責人的懷疑，被認為「不可靠」、「有可能出事」而被秘密地強迫遣返回國。事發後，中國之春展開了一系列活動，為他們的人權呼籲。這些活動計有：(1)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事件。海外華人報紙多進行了詳細報導；(2)中國之春雜誌發表調查報告及評論，大聲疾呼要尊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人權；(3)動員留學生紛紛向教育部、領事館反映情況，造成壓力；(4)與一些和中國官方有聯繫的華僑人士接洽，推動他們為陳章和包斯琴正面說情。中國之春的活動顯示了效果。陳章同學在被押解回國四個月後，又重新獲得出國機會，返回羅徹斯特大學就讀。近來，中國民聯仍在努力，和有關方面接洽，爭取包斯琴同學也被批准再次出國。

北京當局為了爭取外匯和高級科技，有時必須塑造比較開明的形象。這就給民運人士改善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提供了機會。中國民聯希望，任何人受到中國官方的脅迫時，不要忍氣吞聲，而要及時與中國民聯或其它人權團體聯絡，把事情公開出來，造成輿論，以有利於事情的解決。

左起：俞國基、王炳章、謝聰敏、許登源、于良驥在臺灣同鄉會的講演會上。



中國民聯應邀 參加台灣同鄉會講演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下午，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應大紐約地區台灣同鄉會會長楊黃美幸女士的邀請，在其主辦的「中共對台統戰」的講演會發表演說。演說者還包括前中報、中國時報總編輯，現任北美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台籍學者謝聰敏先生、許登源先生及台北市黨外參議員林正杰的助理于良驥先生。王炳章演講的題目是：「我們所理解的北京對台統戰政策」。二百多位台灣同鄉參加了講演會。

俞國基先生詳細報告了他對中共統戰政策的研體會。謝聰敏、許登源、于良驥等先生

，則呼籲北京政府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

在講演會上，主持人還介紹了一個有趣的插曲：以前紐約台灣同鄉會舉辦各種活動時，中國駐紐約領事館總有一位小平頭、穿西裝的領事來參加，台灣同鄉會從不拒絕。這次活動，中國領事館原擬派代表參加，但後來聽說王炳章先生要參加講演，就不來了。主持人說，這種心態，與國民黨的心態差不多。

講演會後，王炳章和與會的中國民聯其他成員，應邀同台灣同鄉們共進晚餐。

這次演講會有二個「突破」。第一個突破是，這是海外台灣同鄉會歷史上第一次正式邀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進行演講；第二個突破是，這是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在台灣同鄉會舉辦的類似講演活動中，大家都使用普通話（國語），以前均使用台語（閩南話）。

王炳章在演說中，嚴厲警告北京當局不要使用武力解決統一問題，他指出，某些北京領導人迷信「革命」的兩手策略，始於沒有放棄武裝攻台的設想。王炳章也嚴厲批評了國民黨當局在中共統戰面前偏安、保守、被動、僵化的政策。他形容北京的統戰策略尤如孔明的空城計，其內心是恐懼接觸、盡量避免內外綫同時作戰的。但是，國民黨中了空城計，不但不敢長驅直入，反而向後撤退。王炳章重申了中國民聯的一貫主張：中國不是國共兩黨的，是全國人民的，中國統一及前途問題，應有海峽兩岸人民的廣泛參予才能解決。

香港分部接受中外記者訪問

隨着中國民聯影響的擴大，中國民聯香港分部愈來愈受到各方矚目。在耿晨事件被廣泛報導之後，香港分部的活動更加受到人們的注

意。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六日和廿三日，法新社記者 Francis Marras 和 Peter Lin 先生，美洲中國時報周刊記者蘇煜欽先生，分別採訪了香港分部。香港分部發言人徐瑄先生回答了記者們的問題。

徐瑄在回答問題時指出，中國之春雜誌自十九期以後，在香港的銷量節節上升，近期幾增一倍。由於經費困難，中國之春雜誌在印刷上比較保守，因而很多香港讀者反映在報攤上難買到中國之春。徐還指出，中國大陸當前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績，中國民聯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是，中國民聯尤其關注制度的改革，政策的穩定有賴於國家體制的完善，否則，政策的轉變往往以執政者主觀意願為依歸。

「為了一個自由的中國協會」

邀請中國民聯演講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總部位於華盛頓、由美國政界及學界人士組成的「為了一個自由的中國協會」，邀請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前往講演，講題為：「中國真有機會步向民主嗎？」。大約五十多名美國政界及學術界人士，包括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出席了講演會。講演會由該協會執行主席、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前美國白宮重要官員克萊恩博士（Dr. Cline）主持。該協會會長、前參議員周幼德醫學博士（Dr. Todd）致歡迎詞並介紹該協會的活動。這位前明尼蘇達的參議員說，該協會的宗旨不僅僅是為了一個自由的中國，也是為了一個自由的美國、一個自由和民主的世界。他說，令他感到興奮的是，他和王炳章先生都出身於外科醫生，後來都為了理想而放棄了醫學生涯。

王炳章與出席演講會的最近訪問中國的華裔女作家李效黎女士交談。



王炳章先生在演講中簡要回顧了當代中國民主運動，他指出中國人民從未停止過爭取民主的鬭爭。接着，他列舉了中國所特有的、優於其它共產黨國家的五項有利條件：(1) 文革促進了中國一代人的覺醒；(2) 大批海外留學生；(3) 台灣及香港的作用；(4) 二千多萬華僑；(5) 不受蘇聯控制。他認為，如果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中國有可能成爲第一個步向民主的共產專政國家。

講演會後，克萊恩博士夫婦、國際戰略研究所遠東部主任謝華東先生，宴請了王炳章先生及中國民聯華盛頓代表黃奔先生和宗繼祥先生。

中國民聯在美國中部

展開宣講活動

自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三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中國民聯總部派出王炳章及洛杉磯代表張愛二人，赴美國中部四州，即堪薩斯州、奈布拉斯加州、愛荷華州和明尼蘇達州，就當前國內形勢及中國民主進程進行宣講活動，與大批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來自東南亞的留學生展開座談討論，與一些美國學者交換了意見，還與當地僑領見了面。中國民聯的這次活動，是在當地中國民聯成員的協助下進行的。

這次中國民聯的美國中部之行，活動安排十分緊湊，在九天之中，共安排了五次大型宣講，二次英文講演及五次小型座談。

四月十三日下午，在堪薩斯大學宣講，四十多人與會。十四日晚上與中國大陸及港台留學生座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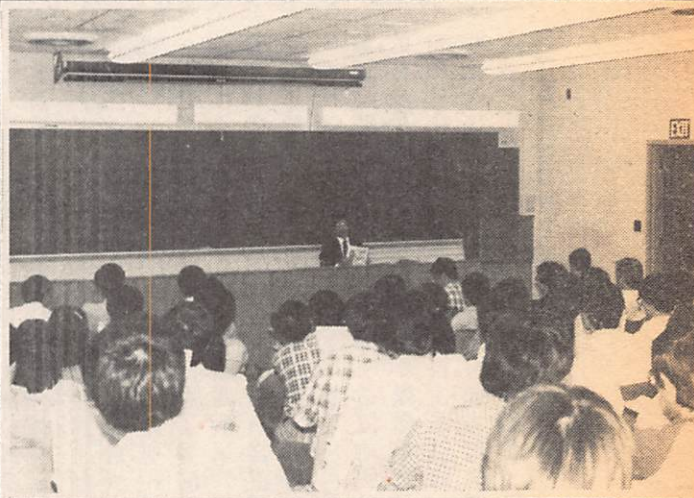
四月十五日晚上在林肯市的奈布拉斯加大學公開宣講，五十多人與會，其中有二十多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及訪問學者。

四月十六日，中國民聯代表走訪了部份中國大陸留學生並與當地華人教授交換了意見。

四月十七日抵愛荷華州立大學，與部份中國留學生座談。

四月十八日晚，在愛荷華州立大學宣講，一百一十多人參加，近半數為中國大陸公自費留學生。十八日上午則應東亞研究教授白納德（Bennett）之請，給部份美國聽眾講解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形勢。

四月十九日下午，中國民聯王炳章、美國賓州大學張旭成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坎甘（Kagan）教授，出席了明大歷史系、明大國際特赦支部和西部銀行工會聯合舉辦的中國



四月十八日，中國民聯在愛荷華州立大學宣講，參加人數眾多，將會場擠滿，半數為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

和台灣人權討論會，分別就大陸及台灣的民主運動及人權狀況做了報告，約有六十多位中外聽眾參加。晚上，與部份中國大陸、港台留學生座談。

四月二十日下午，明尼蘇達大學中國同學會舉辦了「民主如何在中國生根」的講演會，賓州大學張旭成教授、紐約大學熊玠教授、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分別從理論、大陸及台灣民運的實際運作方面，做了主題發言。一百三十多人（包括三十多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及訪問學者）出席了講演會（講演會的詳細內容正在整理，將於以後的中國之春雜誌上發表）。

四月廿日晚，中國民聯的代表又與明大部份中國大陸及台港留學生進行了座談。

四月廿一日下午，中國民聯又在明大就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本身，舉行了一場講演和座談。在中部活動中，奈布拉斯加大學政治系教授、華裔學者陳柄柵博士、明尼蘇達州僑領歐陽青蓉女士、大陸及台灣留學生團體等，分別

宴請了王炳章及張愛先生，表達了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由衷支持。

這次中部之行，有幾個特點值得強調：

第一，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者第一次推動和主辦了中國民聯的幾次宣講活動和座談會。雖然限於條件，他們有些人並未公開出面，但由於他們的實際推動，中國大陸留學生及訪問學者踴躍參加了討論和座談。

第二，部份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及訪問學者，第一次在中國民聯的講演會上公開發表看法，支持中國民聯的某些主張。

第三，中國民聯對國內形勢發展所做的客觀分析，對海峽兩岸民主進程所持的理性態度、對不同意見所表現出的耐心和容忍，不但贏得了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同情和支持，而且獲得了台灣、香港及東南亞留學生的同情和支持。會後，大陸同學紛紛向中國民聯反映：「你們的表現，改變了我們以前對你們的誤解，你們成功了。」還有說：「好好幹吧！我們是站在你們這一邊的！」

第四，在美國各大學中，中國同學是四分五裂的，有各種各樣的中國同學會和團體，有的學校竟然達四、五個之多，如中國大陸同學組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旅美學生聯誼會（有的學校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各自還有自己的圈子）、中國同學會（多為台灣同學組成）、香港同學會、馬來西亞同學會（多為華裔學生），有的學校還有台灣同鄉會（台籍學生組成）和明顯傾向於台灣政府的團體等。平時，這些團體很難在一起舉行活動。這次，中國民聯的到來，却具有特別的號召力，將來自各方的中國同學匯集起來，共同討論中國的民主前途。這或許就是民主對所有炎黃子孫都具有吸引力的表現吧！

壓制民運是迫不得已嗎？

——一九八二年赴京告狀記(下)

晨 耿

×老帥的兒子×××說：「全國性的降溫是有複雜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背景的。」是的，我們在一起議論了當時的形勢。

衆所周知，「粉碎」戰（指粉碎四人幫）的背後實質上是以軍人做後盾的文革倒楣派（如鄧小平、胡耀邦等）和文革保留派（代表人物如葉劍英、李先念、趙紫陽等人）的聯盟的一次「軍事政變」。其實誰都知道「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是一件極為複雜的政治事件，它的主體是一些未經組織的、對當時中國社會具有某種自發不滿的群眾。其中既有文革前期的「老保」，也有以後倒了楣了的「造反派」、「紅衛兵」、「聯動」分子、文革倒楣派的子女……總之，除了文革崛起派分子之外，一切人都有。……文革失敗了，「變法」的東西不得不又倒退回文革前的老套套。政治理想與國民經濟同時崩潰，人人都想罵大街。……於是，「四人幫」控制的北京市公安局從人群中找到了幾句文革倒楣派子女罵毛澤東與四人幫及擁推鄧小平的話上報了中央，四人幫就用此事件把責任推到了鄧身上……

幾年之後，看看這股勢力（主要是要求變革現狀的思潮）風起雲湧，於是鄧小平順水推舟，將這股勢力算在了自己的旗下。但鄧內心却知道，「四·五」運動名譽可平反，但人員却不可重用。他上台的政治基礎是軍人、舊官僚集團和文革保留派，而「四·五」運動、知識份子、右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只是他利用的「同盟軍」。在倒華（國鋒）戰役中，有一股新崛起的共產黨異己力量在夾縫中生長起來，這股力量既不贊成四人幫和毛澤東，也不贊成鄧小平，雖然這股力量在當時還模糊糊不成體統，但隨着思想理論界否定文革，重新評定毛澤東的官方運動，很快出現了「傷痕文學」的

文藝揭露派，以第二代（即中年）知識分子為主力的批判斯大林主義（進而懷疑列寧主義與部份馬克思主義）向西方研探開放的傾向。中共黨內研探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模式，提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問題、民主運動與學生學術結社熱潮，從而形成了以黨內改革派為左翼，再向右是知識分子集團（包括右派、教師、記者、編輯、翻譯、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再向右是大學生激進派、民主運動左派（王希哲、王軍濤、徐文立），最右翼是魏京生的民主改革「大聯盟」。事實上一切社會的變革從根本上是包括物資再分配權力在內的生產方式的變革。面臨一場利益再分配的變動，誠如魯迅所說：「……過去曾經得到過的要復古，已經得到了的要保持現狀，而沒有得到過的要革新……」一句話把當時中國社會各派各階層政治力量的態度給勾劃一清，文革倒楣派的官僚要補償一下文革中的損失，而文革保留派的除了要保留既得利益之外還要再分配到一點新的利益。農民吃到了一點甜頭還想吃更多，知識分子也不滿足于增加的那點「蠅頭小利」，軍人利益不可不顧，牢騷最盛的是城市市民和工人，在這種利益大爭奪的混戰中，各種力量是憑實力交鋒的，軍、政界官僚集團有了保障，農民不敢多「吭聲」（唯恐失去既得的那一點點可憐的利益——土地自耕權），社會本來就很窮，軍政等官僚體系的開支龐大，人人伸手要錢，國家又要發展生產，最後的結果是「工農少來點，知識分子多一點兒」，這時期廣泛流傳一首順口溜為：

老大（工人階級）幹四化，瞪眼看物價。

老二（農）喜上臉，端着米飯碗。

老頭（老幹部）還掌權，不愁手無錢。

老九（知識分子）上升心不滿。

物價、通貨膨脹、就業與社會犯罪、赤字與「三信危機」在這一如山（胡耀邦語）的困難中，又增加了農民因計劃生育而不滿的鼓噪和被表面鎮壓下去了的文革派的煽動，鄧的統治危險極了。不光統治集團內想取而代之的大有人在，其他方面的壓迫感也湧上眉頭。一九七九年，《人民日報》秉承鄧的旨意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要無條件地服從中央》社論，原因是東北和西北部份毛派軍隊嘩變反鄧。軍界對開放和改革阻力甚大，毛派軍人不滿二野（劉鄧大軍）系統軍人的迅速升遷，軍界對知識分子集團和民運中對他們特權腐化的揭露（例如葉文福的詩和「人民日報」《佔房》報道）更是討厭之極，波蘭事件更使正在向西方開放的中共騎虎難下，如若肯定波蘭獨立工會運動必然引起國內工人的組織運動，如若否定波蘭工會又會得罪西方的「財神爺」。于是中共宣傳只好一反傳統地對波蘭事件採取「中立態度」對獨立工會和波蘭統一工人黨各打「四十大板」，儘管如此，在武漢鋼鐵公司和長辛店鐵路還是出現了要求廢除「黨授工會」由工人自由選舉工會的風潮。學運「北伐」從湖南始，到湖北武漢大學《全國大學生通訊中心》成立事件，到河南學生（鄭州大學與河南師範大學）的小字報請願、大辯論和罷課上街示威遊行，進而到北京的《這一代》出版事件和大學生競選風潮。「財神」北伐從香港、廣州起，一路北上大倡「向錢看」之風，走私和經濟犯罪泛濫。而在這大動亂的形勢下，異己的政治力量——民間民主運動已有了結合成全國性統一組織——胚胎政黨的趨勢，這種趨勢如若繼續發展下去，和知識分子、工運、農運結合起來，必然形成非共產黨政治。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內各派都驚呼：發展下去，不得了！

會亡黨亡國的！（一九七九年中央工作會議上×軍老頭子的發言）于是，鄧小平代表中共向民運敲響了警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時發起了中越自衛反擊戰來轉移國內政治危機。

中越戰爭對鄧小平來說是一箭多鵰的好事，它既可以藉口國家戰爭來收緊思想和言論自由，又可向西方政治家獻媚、警告了蘇、越同時調動了軍隊中的異己力量（幾乎沒有正牌的二野系統軍隊參戰），戰場上用的是舊槍舊炮，又試驗了新式武器，而面對虧空的國家財政預、決算，可另立一筆向國民交待的帳目，這一切除了個別頭腦清醒的中國年輕人之外，其他國民都是昏頭昏腦地慣聽中央的話。但魏京



一九八〇年，北京民運戰士在北京出售魏京生的審訊記錄。

生道破了一些「秘密」而且他公開地樹起了反對鄧小平新獨裁的旗幟，從此民運與鄧公開了它們之間的分歧——變革制度與不變大體的改良。

……「小圈子」層是這樣子認識中國現狀的。他們認為：鄧小平是一個實用的政治家，他重經驗而不重根本，在他認識中，「民主」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家來講都是手段，現代社會中沒有什麼「真正的民主」，西方世界的民主也不過是保障西方自由競爭優勝者利益的手段，而特權階層在任何國家都存在著。「……日本不是還有天皇嗎？」（鄧小平一九八〇年的講話），中國共產黨是個既成的統治機器，摧毀它是不可能的（短時間內），而你若不利用它勢必會有其他政治人物來利用它達到更壞的社會目的。而在小農意識佔主導的中國現實社會，「泛民主」激進主張只能誘導落後的群體意識來佔上風（他們是多數），給保守派提供時機重新用「平均主義」的空想來誘騙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而政治動亂的結果也只能給在軍隊和百姓中佔優勢的小農勢力提供新的獨裁。「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此時此刻，政治上的穩定就是發展社會經濟的最根本保障，只不過是政治家處於他的特定的政治地位不便說破而已。確定了這個前提，也確定了中國社會的改革只能是緩慢地、穩健地進行，既不能給傳統的共產主義僵死派抓到把柄，又不能造成經濟上的失敗，這也正是鄧小平一方面高喊「四個堅持」的口號，甚至還實用地利用那個死去了的毛老頭子的餘威；一方面堅持他的從生產方式的基礎變革開始的「經濟改革」。事實上「經濟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改革。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多元化的政治只可能建

立多元化經濟的基礎上，而民主運動也必須在需要民主政治的經濟力量支持下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激進的民主思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可能幫了他們自己理想的倒忙，「欲速則不達」就是這個道理。

他們又告訴我最近胡、鄧都派人找白樺談過話，告訴他目前的形勢。

批白樺是有很大的政治背景的，在所謂「自由化」思潮中，白樺的苦戀既不是走的最遠、也不是反體制最激烈的一篇，相反，其他幾部「傷痕文學」如《女賊》《巨矢》《在社會的檔案裡》遠比《苦戀》走的更遠，而保守派選中了白樺乃是因為：

第一白樺是軍人，軍隊是保守力量的大本營（各國軍隊基本都是扮演政治保守主義角色的）。因此保守派軍人從這裡發難。

第三白樺是擁鄧的。反鄧派就是要給鄧出點難題，中國有句不好聽的話叫做「打狗給主人看」。一九八〇年和八一年，反鄧派軍人氣焰甚大。五中全會前，鄧爲了推出改革派的接班人——胡耀邦出任黨的總書記，在軍隊做了很多工作，當時反鄧的軍官團體在會前非常活躍，張廷發、許世友、陳錫聯等常常碰頭，互相請客吃飯，又常去葉帥那裡「鼓搗」。軍委常委徵求意見時，雙方四比四相持于胡耀邦出任的問題上，「反鄧派」打的是「舉鄧倒胡」的旗幟，來反對鄧小平「舉胡」的策略。當然最後鄧是以「政治上的緊收」爲妥協條件，答應了批白樺和反自由化運動，表面上看是以「揮淚斬馬謖」來收場這次權力層交易的，事實上，白樺和民運青年們是爲中國社會的變革付出了犧牲。這一點鄧的心中是怎麼想的無從知道。但胡耀邦心中是有數的。

爲了證實胡耀邦與鄧小平有區別。「小圈子」中的幾個人又告知我一個內幕消息：

胡耀邦當選總書記之後，第一次視察北方六省時在東北遇刺，雖然暗殺沒有成功，但案件最終也未破獲。據他們說這是保守派軍、政集團做後盾的一次「警告性行爲」，按道理說，這暗殺是不可能不成功的，之所以沒有打中胡（耀邦），顯然是有意的。對立面並不想激化與「改革派」的矛盾，而只是想換取「改革派」在政策上的一點妥協。聽說事後圍繞破案權限，中調部與公安部有爭執，最後還是不了了之。當前，圍繞改革事業發生了極爲尖銳的矛盾，胡耀邦四處奔走，鼓吹改革事業，風險也不是沒有的。對於「小圈子」裡的想法，有一部份我是贊成的。但我認爲：「改革派」與「民主派」還是有很大差異的。雖然在現實政策和策略上「改革派」更爲實際些，但從制度上、從根本上，恐怕「改革派」一旦形成新的「統治團」之後是無力擺脫運動過程本身所造就的新桎梏的。此外，我有一個看法，認爲當前所存在的「反鄧」派力量有許多人并非反對中共的改革政策，而是不平于鄧、胡以己爲核心的「換馬運動」，難道一個新的、進步的政策體系必須由一個新的「一體化」的政治權力體系來貫徹嗎？如果仍是用「人治」來治國，我懷疑鄧小平有生之年怕根本無力進行什麼國制的改革，而黨內換人換馬就足夠他噲的了。毛澤東執政四十年，形成了一大套黨、政、軍體系幹部，重換朝臣恐怕樹敵太多，幾年之後被斥之衆又會與風作浪，這樣翻來覆去何時終了？中國現代化又指望何年何月？在這些方面，民主派所倡導的民主競選基層領導和人民代表制并不激進，通過競選（法律保障下）而產生的一批青年人才收在共產黨旗下，不是對黨，對國家事業都很有利嗎？

但鄧派的人們認爲：那樣做的結果可能出現兩個問題，第一群眾選舉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甚至兩派群眾的爭鬥動亂。文革兩派的矛盾并未消除。相反，經過鄧小平政變之後，「大清查」使原有的矛盾更加激化，儘管鄧小平口頭上說：「……文革兩派都是錯誤的……」，但事實上從揭批、查運動開始以來，各次政治、經濟整肅都是保劉少奇、鄧小平的「保皇派」（也有叫保守派）對保毛的和依附「四人幫」的造反派的大清算。幾個大的冤案和得以在新聞界揭露的大案，如張志新事件、河南「汽車大王」案件、劉賓雁所揭發的「人妖之間」案，人民日報所揭露的《渤海二號翻船事故》都是有極大的派爭背景的，（如「渤二」事件是新工業派對毛澤東培養的「石油集團」的進攻），而許多比上述案件大得多的，驚心動魄的大案却無從揭露與解決，（例如無派別根基的右派分子林希翎、譚天榮冤案、王申西冤案以及一些大的，但與現執政派要員有牽連的案件）。而在「幹部年青化」「知識化」口號掩護之下，得以提昇的「二梯隊」幹部有許多是文革中保過劉、鄧的派別組織頭頭（包括王兆國在內）和劉、鄧派體系幹部的子女。這種行爲勢必引起黨內黨外人心不平。而文革又是一場捲入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政治大浪潮，中共的奴化教育造就了絕大多數人盲從毛澤東的現象，那麼繼續清算文革帳目使很多人對鄧耿耿于懷。文革爲何出現？鄧并不是從思想和理論上攤開老底來從思想上總結文革，而是帶有很大個人報復成份的「秋後算帳」來清算人，那麼中國社會勢必埋伏下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而若把人們的這些看法當成「改革的阻力」來欺騙海內外不明真相的人士，那麼鄧的改革則必不能成功，并將在他死後給胡、趙等人留下一件甚爲麻煩和危險的攤子。

如此說來，我也決不把我們「民主派」平反的希望寄托在「二梯隊」將來政治需要的時候（像中共給右派平反，是爲了利于第二代知識分子爲其服務），也許非到那個時候才有可能給「民主派」平反，但「民主派」再不可能像紅衛兵和四·五運動青年那樣把中國社會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統治層中的「開明人物」身上，胡耀邦也好、趙紫陽也好、王兆國也好，都只能是他們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人物，中國未來新經濟勢力和新政治勢力將要靠自己，在未來發展中的實力，特別是經濟界的力量來與中共新階級對抗的，而且也只有到社會上產生了一個比較大規模的自由經濟力量時，共產黨才不得不接受「民主」的主張。我將要靠我們自己、靠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來給我們的歷史冤案平反。胡、鄧既不是「諸葛亮」，我們也決不當「馬謖」。算算中國的形勢，鄧的年齡和身體狀況起碼還能活五年（此時是一九八二年）在鄧有生之年，儘管他積怨疊疊，樹敵甚多，但反鄧派群龍無首，陣容不一，沒有可能形成與之抗衡的政治勢力。但鄧死之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會發起否定鄧小平的運動，無論這種否定的規模有多大。鄧在中國歷史上將會更多地扮演赫魯曉夫的角色，儘管他比赫魯曉夫聰明，沒有大規模、公開地否定毛澤東。

中國由於其革命的理論基礎（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基本方式（「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工農暴力革命）、政黨與政權的架構方式（少數幾個優秀革命家指導下的等級授職制）以及社會經濟運作方式（以「公」有制爲主幹的大計劃經濟）與蘇聯社會近似，因此中國社會近期的演變也會與先進了一歩的蘇聯社會相似，斯大林專制獨裁之後，權力移

交給無能的馬林科夫，而頗有心計的赫魯曉夫在軍界實力派的支持下借用「宮廷」軍頭貝利亞的手完成了政變，開始了蘇聯對西方開放的「新經濟政策」。同一時期，蘇聯也出現了被鎮壓下去的地下「小冊子」運動（民辦刊物）。中國社會由於其社會階級成份（農民數量之多）和生產力水平（幾乎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發展）與蘇聯有異，也許正是由於這一點，才可能使中國更容易地接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在短時期內，中國還不大可能擺脫蘇聯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慣性。因此，利用「宮廷大臣」汪東興和葉劍英的手而完成政變并推行「新經濟政策」的鄧小平，在其死後也必然部份地被「勃烈日涅夫」（無論是胡耀邦、趙紫陽還是其他什麼人）否定，而且在未來的否定和權力再組合過程中，中國的「勃烈日涅夫」也必然會再利用「民主思潮」來達到奪權的，而這種有限度的利用在權力鞏固之後仍會被壓制：。這一歷史階段將會持續十年左右。我怎樣安排這十年左右的生活呢？

南歸的火車在晃動，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被打成的右派們，經過二十幾年的洗磨波折，他們之中大多數人的才華被社會生活扼殺了，雖然他們一直不平井也會燃起過重新崛起的希望，但真正留下來并還保持了當年浩氣風骨的人的確不太多。當我回到了浩蕩東去的黃河岸畔時，矚目滾滾大河，想歷史激流洶沙，多少人物都隨波逐流而去，我既然被拋出了「柵欄」，也只能「走入山野，漸漸生出令老獵人也望而生畏的獠牙……」（魯迅《兩地書》）童年時期對社會美好的想像和美好理想的憧憬到這時已完全爲殘酷的現實所代替，人類社會很大程度上仍沒有擺脫其作爲動物的原始本性，首領靠強力維持他們在動物群中的地位，而「

二領」「三領」也盡力保護他們自己在這個體系中的利益，不甘受人統治的「小傢伙們」只有兩個出路（也可以說任何人都只有這兩條出路），或者競爭做首領，被咬死或屈服，或走出這群體去開拓新的疆野。而我那時候既然不可能走出中國社會，那只好蜷伏下來，讀書識世，等待時機。反正我是不要受別人支配的（我也決不想支配別人），于是我決定逃離家鄉，逃開政治警察們的監控，到「山野」裡去。從此，我離開了父母、離開了家鄉，開始了艱難的、曲折的流浪……

（完）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 _____

訂費（每年）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港、澳地區）

機關：60美元 200 港元

普通訂戶：24美元 72 港元

學生訂戶：18美元 60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第 _____ 期）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
好望角大廈21字樓3E2室

Room 3E2, 21/F,
612 Nathan Rd.,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贊助100美元或港澳地區500港元以上之訂戶爲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費：

航空：10 美元 平郵：5 美元

北京 的 改 革 在「降溫」？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黃嘉明

去年十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今年三月下旬，趙紫陽在六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了題為《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政府工作報告，總結了《決定》貫徹後的改革工作。

北京領導人重換毛裝 意味著什麼？

我們認為，趙紫陽在這個會議上的表現可歸納為「三個公開」和「一個轉變」。三個公開是：(1)本來由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率先倡導穿上西裝的中央領導，這次露面幾乎是清一色地改換了毛裝；(2)趙紫陽公開地談到了改革暴露的許多問題，並把這些問題歸咎於政策的失誤；(3)趙紫陽代表中共公開地承認，政策失誤的主要責任在於中央的決策機構。一個轉變是：本來提倡大胆解放思想，放手實行改革的趙紫陽，這次却提出了一「堅定不移，慎重初戰，務求必勝」的方針。趙紫陽的報告和一些其它的政策調整，引起了海外許多人的觀望與猜測，他們認為也許北京政府要改變初衷，重趨保守的道路。另外一些持樂觀態度的則認為，北京目前的這一舉動，恰好說明了他們的清醒和遠見。在對北京政府不同的反應中，我們不禁要問，中共的改革究竟要朝哪裡去？

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

中共的改革一開始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的改革有效地打破了集體經濟中為害多年的「大鍋飯」制度，建立了生產責任制，使停滯了多年的農業有了新的活力。城市經濟的改革是一項十分複雜的工作，在中央計劃經濟相對放鬆的情況下，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就會產生作用，使原來計劃經濟中的問題暴露出來。趙紫陽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原因是，固定資



趙紫陽在六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脫去喜愛的西裝，換上中山裝。這是對一大批反對改革元老派們的安撫嗎？

產投資規模過大，造成了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供應緊張。另外，許多的企業素質長期偏低虧損的比例不少，大量的財政補貼（以價格補貼為主），也加重了財政赤字。為了克服這種赤字，大陸去年的貨幣發行量比通常增加了八十億，貨幣額的猛增，幣值貶低，必然會引起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

基於此，趙紫陽指出，今年改革的重點是對價格系統和工資制度進行全面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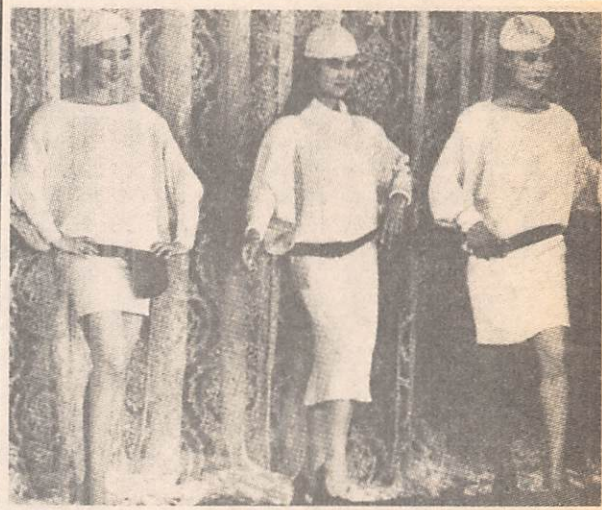
價格改革是關鍵

價格體系的調整直接關係到整個經濟結構內部的運轉和協調，同時價格問題又十分敏感，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北京領導人把這次價格體系的改革，看成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同時，北京領導人還提出了走小步，走一步，看一步的方針。他們提出，因經濟結構調整及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而造成成本增高，基本上應靠企業內部解決；不要轉嫁於廣大城鄉居民。爲了配合價格體系的改革和扭轉目前財政赤字，中共讓原外貿部長陳慕華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一職。陳慕華和財政部長王丙乾在檢討了銀行和財政部工作的失誤以後，立即在四月一日宣佈，提高存款和貸款的利息，加強貨幣回籠、抑制通貨膨脹。



雲南思茅地區打擊犯罪的街頭宣傳畫。北京領導認為，這樣可以保障經濟改革的進行。

——本刊記者攝



北京舉行的一次時裝展覽。

我們知道，中共把自己實施的改革，叫做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道路」。這就決定了，這場改革是一場體制內部的改革，其實質是在確保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原則下，運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手段來刺激生產。每當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等客觀因素與所有制的外壳不相容時，中共就設法找尋一種融和劑來化解矛盾。我們認爲，中共在改革出現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勇於承認領導失誤，並且採取相應的措施保證改革的繼續進行，這是難能可貴的一個進步。在處理重大的經濟問題時，共產黨放棄了採用政治運動，精神宣傳的老作風，這點我們也應該加以肯定。但是在對待另外一些改革所造成的新的社會問題時，共產黨却採用了不明智的態度。

胡耀邦在今年年初對黨校發表的一次談話中說到：經濟改革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不少的

不正之風，共產黨和國家幹部中的一部分人在利用這個機會，搞損害國家利益的事。胡耀邦當時毫不客氣地指出：「對於那些爲了個人和團體利益而嚴重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人，我主張嚴肅處理，要開除一些人，以儆效尤，否則不能利住歪風。」從那時以來，各地的報刊雜誌就紛紛發表文章評論，抨擊所謂的不正之風。鄧小平也爲此號召共產黨員在「向錢看」的潮流中，要保持理想和紀律。

這次在趙紫陽的報告中更明確地強調了要「採取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利住這些歪風」。那末，究竟這些歪風是指什麼呢？趙紫陽的說明是，有些幹部和單位，「亂發獎金，實物和補貼，亂漲價牟取高利，利用權力倒買倒賣緊缺物資，以及請客送禮，行賄受賄等，使不正之風有所滋長。」胡耀邦也談到，有些黨政機關套購物資，批來批去，「說是搞活，實爲『搞鬼。』」在中共領導人物的口誅筆伐之下，各地的幹部也競相開始攻擊地方小報，通俗小說之類的東西爲「精神污染」的尖兵。更有甚者，周海嬰（上海的人大代表）在人大會議上，指責在電視裡播放廣告也是資產階級的做法，應該加以取締。就這樣，在狠利不正之風的名義下，大陸又刮起了另一種的「否定風」。凡屬武俠誌怪，風花豔情的小說故事，凡屬招徠顧客的有獎銷售，彩票，凡屬衣着大膽的服裝表演和選美活動等，或是被斥爲低級趣味，或是被指責爲黃色腐朽。總之隨着經濟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非正統」的社會意識，觀念，道德和審美觀等一概被標以資產階級的頭銜。以此來看，國內的「帽子」和「棍子」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共產黨包括其最開放的改革派也無法抹去自己身上的那塊「左」的胎記。

我們認為，儘管中共沒有進行政體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但是，一場較深刻的經濟改革也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後果。比如，比較賺錢的街頭小報的出現，對通俗文學的傳播與繁榮很有好處。街頭小報雖然有俗淺之嫌，但是它也有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輕鬆活潑的特點。大報都有訓人的面孔，「純文學」的刊物又曲高和寡，相比之下，街頭小報顯然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對於這種情況，我們認為應該鼓勵，就是街頭小報中講了一些不適當的庸俗的東西，我們也應該用批評和討論的方法，而不應該像某些省市的領導那樣，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予以取締。據說廣西的黨委還為此專門舉辦了編輯人員的學習班，以端正黨的辦刊路線。真是不可思議！另外，有些黨政機關的領導，在一切「向錢看」的影響下，過多地發放了一部分獎金補貼，或者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開辦了一些公司，這些都是情有可原的。其中有一些事情和做法只是適應了西方的注重價值規律的準則，並沒有越出法律的範圍。對這些問題，北京政府現在馬後炮地實行全面禁止的做法並無益處。何況當時提出「向錢看」口號的，不是別人，正是鄧小平自己。

「收」不得人心

中共改革派現在的宣傳攻勢和加強控制的做法在國內並不得人心。很多人都擔心：糾正不正之風是否意味着搞活經濟要「剝車」了，已經規定的一些措施是否也將取消。北京一份報紙三月十六日的文章寫道：「最近有的同志議論，改革既然要創新，就難免會有差錯。出了一點問題，又說是搞新的不正之風，要嚴加



現在又要提抵制精神污染了。
——本刊記者攝於昆明

懲處。這樣一來，誰還敢再搞改革？」最近的世界經濟導報，也發表了一篇署名「利風不能亂風」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寫道：「要『利』風，不能『刮』風，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就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不要搞『一刀切』，尤其不能像以往搞政治運動、群眾運動那樣。特別是涉及群眾心理和社會效應的問題，更不能草率行事，以致影響好不容易形成的可貴的改革勢頭，甚至走回到老路上去。」

對於老百姓的這些疑慮，我們認為北京政府應該加以反省，停止對各方面的控制和干涉；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雖然大陸的領導人對這次改革有所突破，但是由於這場改革僅僅局限在部分的經濟領域，而沒有擴及到意識形態和更根本的制度問題上，因而，改革的不平衡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是必然的。如果共產黨只想改革經濟，而不願在其它方面作相應的改革，那麼這場改革的前景不會光明，即使以後的改革沒有出現深刻的危機和動亂，改革的結果也只能是蘇聯第二，現代的中國人有誰會接受這個結果呢？

走回頭路沒有出路

中國大陸的改革沒有可循的先例，因此北京政府採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穩妥政策是應該的。在舊的體制向新的體制轉軌和過渡中，中共面臨的是新問題，應該認真地加以研究和思考。矛盾的暴露和展開往往是解決問題的前提，也會給進一步深入改革提供課題乃至新的突破口。這次暴露的金融問題，不就為價格體系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認識和研究的基礎嗎？我們認為改革當前，中共對改革帶來的問題要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對某些的錯誤應加以引導，而不應再採取粗暴的行政命令和干涉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更不能走回頭路。

改革離不開法制的完善

我們希望北京領導在繼續進行改革的同時，要加強法制的完善工作。要把黨紀和國法嚴格區別開來。應該突出法律的仲裁作用。我們不反對在共產黨內部用黨紀來約束共產黨員，但是在公共生活的範圍內，任何人只要在法律的範圍內行事，就不應該受到其它的指控和威脅。歷史表明，一個僭越法律的政治團體，必然是壓迫個人，造成社會動亂和危機的根本因素。

我們還建議北京政府能夠進一步開放思想，容許老百姓有更多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並允許與共產黨不同的意見和團體存在。只有這樣，共產黨才能完成自己的改革，才能取信于民，國家的統一和興旺才有基本的保證。■

作協四大後的

震盪與反覆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李明珏

文學創作應該不應該自由，這恐怕是個不證自明的問題。人們的創作活動本身是一種智慧、想像力或者內心衝動的具體表現，這種表現是自由的，也是積極的。不自由的創作不叫創作，而叫編造。

在前不久召開的「作協四大」上，北京的領導人物重申了創作自由的問題。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胡啟立指出：「我們黨一貫重視文藝工作，毛澤東同志把文藝看作一個方面軍，社會主義文學的巨大成績，是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另外胡啟立也檢討了共產黨對文學創作的干涉，談到了「左傾」路線對文學創作的危害，並呼籲黨、政府、文藝團體以至全社會應該堅定地保證作家的創作自由。

當然，對共產黨這種認識上的改變，每個人都會肯定。但是共產黨所作出的承諾還沒涉及到創作自由的根本問題，共產黨在檢討中，也沒有承認，創作的不自自由是由黨造成的，現在共產黨以「改善和加強黨對文學事業的領導」作為保證，無疑是沒有觸及到制度的要害，因此文藝創作中的隱患，自由中潛伏的危機必將繼續存在。

巴金說他年青的時候創作很自由

今年二月廿八日，曾受到圍剿的「苦戀」作者白樺上門探訪了大病初癒的巴金。白樺告訴巴金，他為什麼選今天這個日子登門拜訪，因為這一天是陽曆的初九，九代表了臭老九，代表了知識份子，「初」除了和「臭」大致諧音之外，還有「開始」的意思，所以選擇這一天來串門，頗有些意味。

巴金這次雖然沒有出席作協四大，但仍被一致推選為作協的主席。白樺來看他，除了告訴巴金大會的情況之外，還給了巴金一篇自己撰寫的長文。在這篇文章裡，白樺描繪了自己近年來，所遭到的壓力，阻撓和內心的苦悶。巴金在讀了白樺的文章以後，十分感慨這些作家在近幾十年中經歷的坎坷和浮沉。他對白樺說，我很早就寫出了自己的那幾部大作品。我那時比現在要更自由，所以容易寫得出比較真實的東西。你（指白樺）寫出作品的時候也很年青，五十年代的情況還不錯，比現在的

自由還多一些，看看那麼多人以後的遭遇，那麼多的時間和才華都耗費了，真覺得可惜。

最後一次的黨管文藝

「作協四大」是近幾年來最成功的一次大會。這次大會的成功不啻與近年來經濟改革與開放有關，也和共產黨文藝政策的失敗與人心背向有關，但是這兩點還不是問題的關鍵，沒有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的聖旨，就是有了成功的條件，也不會有成功的現實。

在「四大」召開以前，中共中央書記處就專門開了定調子的會議。在這次會上，胡耀邦坦率地抨擊了「反精製污染」、「反自由化運動」是為新的大批判開路，是屁話。根據胡耀邦的講話和這次會議的精神，總結出了四點意見，作為對「作協四大」的指示。這四點意見是：(1)清除黨的「左傾」文藝路線；(2)會後不再提「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問題；(3)作家有創作的自由和評論的自由，作家不會因為失誤，而受到政治上的歧視和組織處理；(4)代表大會實行民主選舉，中央不干涉，不提供內定名單。正由於這四點意見，「作協四大」才演成了這齣好戲。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目前採取的這種做法比起原來的指手劃腳，親自出場坐陣，包辦民意的方法要有效的多。這種方法是以無為、不管來達到實際上的更有實效和靈活的領導。這種「不管之管」的政策，改變了過去的繁瑣的條條框框和複雜的審查系統，於是黨的工作就從過去的行政領導變成了意識形態的引導者。在共產黨這種改革措施下，文藝工作者減少了一些壓力，獲得了更多發表獨立意見的機會，文學創作也有了一個新的契機，另外，借著這個機會，作家根據自己的良知，通過民主

的投票，選出了一批敢冒天下大不韙的作家理事，並把那些已失人心的學閥和黨棍趕下了台。通過這次的選舉，民主權利得到了實現，真理得到了肯定，眾人的意志得到了伸張。這次選舉的成功，勢必會給社會其它階層以後的選舉，帶來深遠的影響。

但是，如果作家的創作自由僅僅只是來源於政府方面的明智和許諾，只是依賴於個別領袖人物的側隱之心和廉正，而不是基於政治制度之民主和法律制度的健全。那麼這種自由只是偶然的和有限的，它還會由於政治力量的改變，領袖人物的升遷而得而復失。現在誰能夠保證，黨對文藝的控制，黨對創作自由權利的剝奪永遠不會再發生了呢？

胡喬木說創作自由 不能不要黨的領導

很多人說：「作協四大」是胡耀邦等人發動的反「左」戰役，通過這次大會，胡派的路綫無疑大獲全勝，而且在作協的黨務領導方面，左派領導如賀敬之，夏征農、歐陽山等人都受到了排擠與冷落。借了這次大會，胡派公開否定了「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並為「傷痕文學」、「異化論」、「人道主義」等作了半公開的平反。

處於劣勢的保守派，雖然目前形勢不佳，但是這批人都是闖過大江大浪的人，深知勝敗乃兵家常事，何況現在並非大勢所趨，無可挽回。還有鄧小平採取的進進退退的路綫，時時改變政策，以維護兩派平衡的做法，也使這些人有可乘之機。因此「作協四大」在短兵相接時，胡派雖然告捷，但最終鹿死誰手，尚未定局。

最近，一位參加「作協四大」後出訪的作家談到：胡喬木對胡派提出的「創作自由」不

以為然，胡喬木說：創作自由總不能不要黨的領導。還有保守派另一員大將鄧力群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他說：提創作自由是可以的，但創作自由應該是黨領導下的創作自由。這位作家還談到了大陸領導層內部的矛盾很激烈，保守派雖然現在按兵不動，但實力仍然很強。陳雲等人對目前經濟改革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橫加批評，據這位作家估計，如果改革一旦遇到重大的失誤而擱淺，那麼保守派必將會再度掌權，到時候「作協四大」就可能是他們秋後要算的一筆新帳。

文學的天氣就是政治氣候

有一部份人認為，「作協四大」開完以後，將出現一個創作的黃金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中國會有希望出現像魯迅、茅盾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估計未免太樂觀了一些，雖然目前的局勢比以前有了好轉，但是仍存在許多不穩定的因素，中國大陸的作家並不是第一次聽到創作自由的許諾，在他們為此慶幸的同時，他們仍然保存着不少的顧慮。前面談到的這位作家對形勢的估計，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當代頗負盛名的中年作家陳文夫曾寫道：「文學的天氣就是政治氣候，凡是政治氣候好，文學創作就上，凡是政治氣候不好，就下。」現在政治形勢好轉，作家就有更多的發言權，明天形勢一變，作家也許又成了「臭老九」。

新聞獨立是創作自由的根本保證

自從「作協四大」以後，人人都在談創作自由的問題。實際上，創作自由這個提法如細細加以推敲的話，是很不嚴格的。創作自由是

不是意味着，放寬或者取消新聞檢查制度？作者有自由發表作品的權利？作者可以在作品中表現自己的政治觀點、人生態度的自由？衆所周知，在大陸，作家並不是沒有創作的自由，很多作家都有一大堆手稿積壓在抽屜裏，或者流傳在小圈子裏，這些東西是什麼？不就是自由創作的結果嗎？但是這些作品之所以不能被公開發表，往往是因為這些作品有這樣和那樣的問題，通不過黨的觀點和檢查制度。因此現在的根本問題不是創作自由的問題，而是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問題。

在一個國家中，新聞自由不應該是那一個政黨的政策問題，而應該是一個在法律上加以肯定的問題。如果沒有獨立的新聞自由，奢談創作自由是沒有意義的。三十年來中國作家碰到的根本問題就是，黨控制了全部的新聞部門和出版系統。有些作家的作品首先就通不過政治檢查，失去了發表作品的權利，另一部份作家雖然有機會發表了一些思想比較大膽的作品，但日後也因為作品與黨的政策有抵觸而遭到貶責。以此來看，當前所要解決的問題應是，建立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在法律上保證作家的言論自由。任何個人，任何政黨如果侵犯了這些自由，一律繩之以法。只有這樣，作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牢固的。

胡耀邦說黨的新聞 事業性質不能改

共產黨前不久雖然把「創作自由」的問題提高到了政策水平，但是政策和法律仍有所不同，政策是隨時可以變換的，法律則具有一定的長期性和穩定性。

胡耀邦最近公開指出：「文藝創作自由」的口號不能在新聞事業上機械地加以抄襲。一切報章雜誌應該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操作，遵循黨的路綫，原則和政策。胡耀邦還談到：「鄧

小平同志說：「思想戰綫上絕對不准有精神污染的政略是絕對正確的。」胡耀邦是二月八日在書記處發表這些演講的，而在不到三個月以前，胡則在書記處會議上反覆強調不要再提「精神污染」的口號。共產黨朝令夕改的政略，說明人們不能，也不應該對共產黨的政略抱太大的希望。

胡耀邦上述的發言說明，中共將在新聞方面嚴格控制，不容許有越軌之現象，並強調了黨對出版的領導，這就使作家的創作自由成了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作家可以有自由創作的權利，但無自由發表的權利，這樣的自由創作不是自欺欺人嗎？

前面我們曾指出，胡派是把「作協四大」當作一場戰役來打的，如果胡耀邦真是只想利用這個機會削弱對手的勢力，那麼我們不得不把他所提出的「創作自由」，當作一種權宜之計來理解。根據胡耀邦現在的觀點，我們看不出他和胡喬木、鄧力群有什麼原則性的差別，他們之間的不同僅僅在於策略上罷了。

作家應為自己的權利而鬭爭

胡耀邦重提「精神污染」一事，目前已引起海內外的反響與注目。不管胡耀邦講這番話，是出於內部鬥爭的壓力，還是別有其它的動機，他給新聞發展路綫設置的界限與框框，對早先提出的「創作自由」的政策無疑是一大大嘲諷，同時也對關心中國文學前途的廣大作家和讀者投下了陰影。事實證明，在一個沒有法治，只有政治統治的國家裏，作家的自由是沒有保障的。作家如果不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自己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而只寄望於一個政府中的某些人和某些開明的政策，那麼作家的自由只能是等待和祈禱的自由。

「猫病院」為何生意興隆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黎音

北京市動物園的附屬獸醫所於去年十月份曾對外開設一個為猫治病的門診部。據說開診兩個月就有九百只猫「患者」被送去求醫。門診掛號費五角（人民幣，下同）、注射費兩角、手術費二—十圓。儘管市民們埋怨這個醫療費價格定的過高，猫嘛，總不能與人相比呀！但猫「患者」仍是絡繹登門。於是，有人以此為話題，宣揚中國的人民生活水平已有顯著提高：看，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是有甚麼愛猫、愛犬、愛獸的動物病院、美容院嗎？現在我們中國也有了，而且生意興隆，你能否認這是人民生活向上的表現麼？甚至有的外國記者竟然好奇地前往採訪、報導；「猫病院」的許院長還煞有介事地發表談話等等，好不熱鬧。

然而事實究竟如何呢？原來北京市遍地都是老式住宅，多數居民仍然住在又破又舊的大雜院裡，一些明、清時代遺留下來的老屋，修修補補也要勉強住人。至今北京有二分之一的居民是在這樣千瘡百孔、破爛不堪的居住條件下生活。這樣的環境必然造成鼠患猖獗，傢俱、食物、服裝、用品無時不受到老鼠侵擾，甚至出現老鼠咬傷人的事。筆者的朋友說，他爲了



出國而新置的一套西裝，拿出來穿時，發現已被老鼠咬穿了三個小洞，真是心疼得要命；而他的鄰居在除夕之夜包的餃子，大年初一早晨發現竟被鼠寶們聚餐得一塌糊塗，直氣得要死。近年來，老鼠已開始進軍高樓大廈，現代化賓館、住宅，使首都居民甚為苦惱，因此，養猫驅鼠之風頗為盛行，「猫病院」便也隨之誕生。

北京人說得好：「外國人玩猫純粹是爲了消遣，我們養猫是爲了和老鼠做鬥爭。不然，自己還顧不過來，誰又有閒心去侍候猫先生？」

國內近聞三則

(美國加州華僑) 凝青光

真正的笑容—雲南省元江縣個體戶的麵攤。這
樣的笑容豈能在國營飯館見到?—本刊記者攝



一、個體經營戶

廣東省自一九八三年開始，小商小販（個體經營戶），如雨後春筍，到處出現。這是為了改善經濟、減少失業和改進治安而作出的決策。

但這些小商販在開始經營前，是十分困難的，往往是一場「生死搏鬥」的過程。首先，在劃定可以進行的營業範圍內，自己得先去找個出租給你做生意的地方，找到後，得找管轄這個地方的單位負責人去進行討價還價的幕後交易，在這過程中，多次的大宗請客、送禮是常規。有些單位負責人，還提出要在你生意中作一個股東，才同意租給你。這些股東，不出任何錢財，也不出什麼力氣，也不管你生意賺不賺錢，按月分得一份固定可觀的「紅利」而已。由於能出租地方很少，而在鬧市區的，更有「僧多粥少」的現象，所以，同一出租地方

長途販運引起交通擁擠，有人不得不睡在火車的座位下。——本刊記者攝于貴州。

，有很多小商販去爭、去搶，在這過程中，誰給事主甜頭大，誰就可以搶到手。因此，掌握出租地方的「實權」者，大可從中得利。為了取得這一出租地方，這些小商販往往是未見官已先打三十大板了。爭到了出租地方以後，要到四個「吃人不吐骨」的「老虎」嘴裏去辦手續。一要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去申請營業執照，二要到城市建設管理局申請改建或新建牌照，三要到公安局申請地方合法營業許可證，四要到稅務局申請審核稅收准報證。這四重關卡，往往又要花費一大筆錢財來請客送禮，才能得到主管人的批准，禮重的快批，禮輕的遲批，無禮物的則難得批。所以，經常出現租到地方三至四個月仍未能開業的現象。其中未送禮而僥倖得到批准開業的祇佔百分之五左右，他們日後的麻煩就多了。如說你違章建築啦，佔地面積太多妨礙交通啦，進貨銷售手續不合條例要求啦，偷稅漏稅瞞稅啦，不清潔衛生啦，統統要罰款，搞得你差不多要患上「精神分裂症



。爲了尋求較安全的地方長期營業，現在，很多小商販在找到地方後，就去找個「居民委員會」來作「後台老闆」。你不管生意好壞，每月給這個「後台老闆」一筆可觀的「管理費」，這個「老闆」就替你出頭去過「四關」。但這個店舖的名稱，不能用你的名字，祇能用「X×居委會X×店」的名字，什麼收據發票本、經濟合同書、店舖印章等等，全都要用「居委會」的名字。這些「後台老闆」比比皆是，真可謂是「無本得大利」的「公司」。而這些「居委會」的有關人員，不用出錢出力，除上交一部份錢財給稅務局和區政府外，全部作爲獎金，每月把「管理費」分得一乾二淨，這些「中間剝削者」比「工頭」還厲害，的確「人無橫財」不富！

爲什麼小商販要找「居委會」呢？因爲這些「居委會」是一個「小王國」，裏面除了「居委會」幹部外，還有「工商行政管理局」、「城市建設管理局」、「公安局」、「稅務局」、「銀行」等部門派到「基層」來協同工作的「幹部」。所以，「居委會」可一手替你辦理過「四關」的手續，并可保護你合法地經營，同時，短期內可替你貸到一筆低息的款項（從人民幣一萬元到十萬元的幅度），有這樣的條件，哪有不找「居委會」當「後台老闆」之理？所以，這種方法成了目前的「熱門貨」。

我有一個親戚，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塊鬧區路旁的空地（約三十平方米），每月租金人民幣五百元，找了「X×居委會」做「後台老闆」，就動工興建，專營「小百貨」、「小五金」，名爲「X×居委會綜合商店」，每月固定上繳「老闆」三百元人民幣，而「老闆」替他到銀行貸回人民幣五萬元，月息爲七厘二。（若個人去貸，則手續十分麻煩，時間要等一個月後才貸得到，月息是八厘。）

而他從租到地方到建好店舖（店舖是簡單的鐵架木板結構），已花費人民幣一萬兩千元。開張之日，請「後台老闆」及有關人員赴宴，又花費人民幣二千元左右。我問他本人，除了所有開支，每月個人能賺多少？他說：「大約五百元（人民幣）左右啦。」

二、計劃生育

廣東省由於計劃生育工作落了後，自一九八二年開始，「雷勵風行」以求趕上其它九省，完成上級交下來的任務，其所採用的辦法，可稱之爲「土政策」。但，遭「土政策」之殃的，往往是一般的「蟻民」，而有「後台老闆」撐腰的，往往能逃過此「劫難」，照生可也。

在農村裏，爲了防止農民聽到「計劃生育手術隊」來了就到處逃跑的現象，就突然地在半夜出動「武裝民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到預先調查落實要進行「手術」的農家家裏，「拉人」到集中地點，用汽車送到「手術隊」，在有關工作人員看管下，進行「絕育手術」（即「結紮」）。如你僥倖逃脫，則武裝民兵就到處搜查（包括附近山林石洞及你有關親友家裏等等），搜到後，這些武裝民兵在搜查時間的工資，飯菜錢，車費，全部由被捉的人家裏支付，沒錢的就取走家裏值錢的東西（如手錶、衣車、單車、收錄機、電視機、洗衣機、金銀首飾、貴重衣物、值錢傢俱、摩托車等等），全部搬到政府機關地點去「保管」起來，并封了你的家門，一直等你「自動」做了「絕育手術」回來，才把東西發還給你和「啟封」家門。



上海市計劃生育辦公室的宣傳牌。——本刊記者攝

在城市裏，若「絕育」或「計劃生育」的人跑了，那比農村更好辦——去找丈夫（或妻子），甚至夫婦各人的父母、兄弟、姊妹來進行「勸告」和「動員」，你工作的單位准你一個月不用上班，去動員他（她）回來進行「手術」，超過這個期限時，你的職業就「炒魷魚」了。所以，你不按期去動手術是不行的。假如你沒逃跑，仍在單位上班，就把你「停薪留職」，由單位負責「計劃生育」的幹部，反覆「勸告」你，好像「鬼上身」一樣，整日在你身旁反反覆覆講那幾句話：「以大局爲重」、「以身體爲重」、「以大家利益爲重」、「你不計劃，就是犯法，就要開除，……」。另外，單位還規定，那個科室需要「動手術」的人而不去「動手術」的，這個科室裏所有的工作人員，全部停發獎金，弄得科室的同事，紛紛埋怨你，連平時的老友，也不例外，指責你說：「最衰佢啦，唔做（絕育）手術，累到我咁連幾十蚊（元）獎金都無得發。」、「同呢個

人一個科室，真是行衰運。」「一個人累到咁多人無發獎金，真是前世唔修咯！」使你受到極其大的「群眾壓力」，不得不去「就範」，這是單位慣用的非常妙的「發動群眾幫助」的手段。

在祇准生一個的政策下，假如你想盡辦法偷偷去「超生」了一個，那麼，你的災難便會接踵而來。是共產黨員、共青团員的則開除黨籍、團籍。是領導幹部的，則免去領導職位。減發或停發若干月工資，免去一切職工福利待遇（如勞動保險、公費醫療、一切假期等）。調職、降職或停職。甚至開除出「革命隊伍」。你超生的小孩，不能入戶口、不能領取糧油及副食品證，稱之為非洲回來的——「黑人黑戶」。祇得與父母同吃份糧油，這個小孩長大後，入學讀書，求工結婚，全都有問題。我有一個親戚，由於「超生」了一個男孩（前面已生了一個女孩），夫婦兩人便被開除了。現在孩子二歲了，仍未能入戶，夫婦兩人在「個體經營戶」裏打「散工」過活。

但是，「後台」硬的，往往可逃過此難。某一單位有位作收錢工作的女職工，第一胎生了個女的，現在要生第二胎，希望是個男的，但她的單位今年沒有「生育指標」。由於她的丈夫是在軍分區工作的領導人物，就由丈夫以軍分區名義取得一個「生育指標」的證件回來，交給這個女職工的單位，就順利地生去了第二胎（誰知又是個女的，天曉得她會不會再去生第三胎了）。我去醫院探望一位患慢性婦科病的親戚，看見她隔壁房的一個孕婦（已七個月），由專人看護着，帶去手術室做「引產手術」。我聽親戚說，此孕婦在市裏糖菓餅乾廠工作，是第二胎，因無「生育指標」，在有三個月孕時，不上班，逃離本市，但終於給抓了回來，前二天入院，整日在病房裏哭訴說：「頭一胎生咗個女，已經三歲幾叻，想生番

一個男仔，又唔俾我，七個月啦，重要我落咗佢（即「引產」），真係無陰功咯！鳴……」。她丈夫在旁，一語不發，用雙手托着下頷，呆滯而悲憤的眼神，直望牆壁。而那些看護的人，却無動於衷，有的還說：「喊乜啫！鬼叫你超生咩！」。我親戚說完後，帶着同情心說：「人心肉做，點解有的人好似實咗咁，一點同情心都無嘍。」後來，聽這孕婦的丈夫說，引出來是個男嬰。而在該孕婦對面的病房裏，前天剛好有一產婦生下第三胎男嬰（聽說前二胎是女的），與高采烈，談笑風生，因這個產婦的丈夫是一位「大粒佬」（即「高級領導幹部」），有「生育指標」在手，可照生不誤也。相形之下，何其不平！

三、氣功

一九八三年開始，國內練習「氣功」之風盛行。

我今年四十多歲，但却長了一個大肚臍，為了減肥，也練習了四十多天的「減肥健美功」，哈！真的有些成效，原來大腹便便的（原穿褲子褲頭是四尺三寸），現在，減消了肚臍（褲頭縮少為三尺五寸），四肢軀體的肌肉，也結實多了，走路也靈活得多，身體各方面檢查的情況，很好！無問題。親戚朋友都說我健美多了。這減肥健美功，我現在還堅持做下去。因這種功，費時不多（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二十分鐘左右），動作簡單（祇有八個動作），易學效大，所以我也在教一些大腹便便的朋友練習此氣功，收益不淺。

聽教我練習氣功的老師介紹說，現在國內盛行的氣功（指由國家大力推廣的），大約有四種：一是郭林新氣功法，二是大雁氣功，三

是鶴翔椿功，四是無極式氣功。而廣東多了一個「五禽自發氣功」。而比較行之有效的和副作用少的，就首推「大雁氣功」和「無極式氣功」了。

在國內，作為知識份子階層，十分喜愛大雁氣功，因這種氣功，活動時佔地不多，不需要很嚴格的安靜環境，動作易學，功理易懂，有延年益壽，強身健骨的功用。對各種慢性疾患（如風濕關節炎、腰腿痛症、神經衰弱、肺氣腫、心血管疾患、慢性腸胃疾患、糖尿病、肥胖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治療效果。這種氣功，若持之有恒地練習三、四年，便能用「心來發放」外氣，替人治病了。而「無極式氣功」是靜站為主的氣功，相傳是「楊式太極拳」的內發秘功，簡單古樸，容易掌握，易通「大、小周天」，練之可防病治病，延遲衰老，久練可用「平氣」手法來「發射外氣」來治病，可應用於武功。

由於氣功有這麼好的功效，而國內離休、退休的幹部、職員、工人越來越多，藥物治療慢性病的效果很不理想，加上公費醫療的費用和範圍慢慢地減少和取消。所以，氣功適其時地在「四化」中大行其道，成為老百姓家喻戶曉，喜聞樂愛的寵物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上旬，在北京由中華全國中醫學會和全國氣功科學研究會舉辦的「第一屆全國氣功功法理論學習班」時，就有國內各著名氣功流派的派主和高手，現場表演氣功的特殊功能和遠距離發射外氣，另有具特異功能的人也作現場表演，場面十分精彩，使人大飽眼福，增廣見識。平時常見的什麼「赤身臥釘床」、「頭及手碎大石頭」、「一刀砍胸膛不損皮肉」等等表演的外硬氣功，在這裏一相比，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了。看了這次「氣功學習班」的表演，使我對氣功功能和對特異功能懷疑的想法「煙消雲散」了。

看到中共最近一系列對新聞政策的報導，再看今天在中國大陸、台灣甚至一般人心目中認為最崇尚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美國的華文新聞事業，就不難發現，現代的中國人從事新聞工作是件很辛苦的事。

先從中國大陸說起吧。「人民日報」四月十四日刊出的胡耀邦一篇一萬四千字的新聞政策講話，開宗明義的指出「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應作「黨的發言人」，要「強有力地宣傳中央的主張」。在這個前提下，胡耀邦說不能放寬新聞自由，根本就是多餘的。在一個舉國沒有一家民辦報紙，沒有一家民營電台和電視，只有共黨一言堂和政府御用工具的政權下，來談不應該濫用新聞自由，就叫一個三餐都不繼的人不應該浪費一樣的可笑。

中國人何時享受新聞自由

(美國) 周立仁

中共的新聞政策不但要所有報紙在「政治方向和政策問題上」要與黨中央一致，而且「新聞工作不能與創作自由相提並論」。中共既然對這個宣傳機器看得這麼重要，管制得這麼嚴密，照說應該十分看重這些宣傳機器，但從一些事實看來又不是這麼回事，甚至可以說中共的領導人是非常瞧不起自己的新聞從業員的。

如果不信，可以打開在美國所有的英文、華文報紙看看，那一件有關中國大陸或中國共產黨的大事，不是由中共的領導人先透過外國記者的口和筆，或外國訪客透露出來的。它的「喉舌」人民日報、新華社幹什麼去了？

滿清政府是「寧與外人，不給家奴」，一般百姓是崇洋媚外。想不到到了二十世紀末期，中共領導人在發佈新聞上，還不能免除「挾洋自重」的心態。例如中共決定在近期內，要在一百三十六個黨、政機構中更動百分之七十的高級人員，這在中共來說是何等重要的大事，但是却是由胡耀邦在與港、澳記者團晤談中透露。又如中共在三年的整黨運動中，去年有六萬人被開除黨籍或因其它原因喪失黨籍，以及政治局、軍委會暫時不會改組，八十歲的鄧小平還不會退休等重大消息，是胡耀邦對澳洲記者說的。

而中共今天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和當年「大家敬愛的周總理」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們可以和外國記者，那怕是三流記者侃侃而談，

甚至談笑風生，也不會接受新華社或人民日報記者的訪問。像美國記者在大庭廣眾或電視現場轉播中，對政府大員咄咄逼人，打破沙鍋式的盤問，甚至因為記者揭發水門事件使尼克松總統下台的事，對十億大陸人民和新華社、人民日報的記者來說，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事。

整個中國大陸，雖然報紙的銷數驚人，但它提供的並不是人們想看的新聞，而是讓人覺得枯燥的黨的宣傳。文革期間報上一公佈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要「傳達不漏人，宣傳不過夜」，兩報一刊一發表聯合社論，全國報紙要立刻轉載，全國人民要立刻展開學習，這種情形在古今中外的新聞史上，也是空前的，至於是否絕後，那就要看中共今後的作法了。

現在雖然暫時沒有了上述的現象，但誰都知道人民日報上那個「本報評論員」是誰。

在台灣有卅多份中、英文報紙，幾千份雜誌。有人說它沒有新聞自由，因為它仍有報禁，經常查禁刊物，國外的許多刊物不准進口，記者在工作時也不能暢所欲言充分報導或評論事實。但也有人说台灣的一些刊物在濫用新聞自由，不但揭人隱私，而且不顧新聞道德。這也說明了它仍然有一些不健康的現象，才會出現上述的情形。雖然比起中國大陸，台灣的新聞從業員能在一定的範圍內作激烈的競爭，和以獨立的意志與思想撰述和評論，而且在報導上很生動活潑，對國民黨和政府官員也可作某種程度的批評，但從某種角度看，它仍是一個不能充分享受新聞自由，但又的確有一些人在那裡濫用新聞自由的地區。因此，在台灣從事新聞工作也是件很辛苦的事。但是無論如何要比中國大陸好的多了。

美國的華文報紙又如何？只要一提起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人人皆稱美國，但在美國的華文報紙是否就一定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可以肯定的說，不見得。絕大部分報紙主持人本身的政治信仰、對兩個政權的認同，在在限制了他們的報導方針和評論內容，甚至還無法脫離為某一個政權服務，或根本就是在為某一個政權服務。

不但如此，美國的華文報紙還出現了主持者互相謾罵，大作人身攻擊，對另外的報紙指名批判的怪現象，這些都是不正常的現象。檢討一下近三、四十年來的華人新聞事業，可以發現儘管有許多名記者，但在現實的環境下，却難以產生權威的記者，這是所有從事新聞事業的中國人，應該感到極為遺憾的一件事。

● 本期專題

民族性、傳統文化與專制制度

繼承羣體主義 發展個體主義

——本刊編輯部

本期及下期中國之春雜誌集中篇幅討論民族性、傳統文化和專制制度的關係。要在中國拓展民主事業，必然涉及到現存的專制制度，以及與之相關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性問題。

中國人討論這一課題已數十年了。最近，它再度引起人們的注意，乃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中國大陸興起了現代化運動，而工業及科技現代化顯然是西方文明的產物。這就引發了國內思想界的深思：為什麼中國的傳統文化未曾產生現代化？在中國實行現代化，要不要掃除傳統文化中阻礙現代化的因素？要不要變革專制制度？國內新掀起的東西文化比較研究的熱潮，正是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二）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潛移默化的發展及民主思潮的深入傳播，已經觸及到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的深層結構。近百年來，民主思想未能在中國生根的教訓告訴了我們，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強大的專制制度，還有與之相關的傳統文化、民族性及經濟結構。

從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毛澤東的「破四舊、立四新」；從「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到最近中共修復孔廟的活動，幾十年來，中國思想界曾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借鑑西方文化的問題上，有過幾次大的較量。其間，自傲掩蓋着自卑，理性夾雜着感性，有時甚至達到血濺五步的地步。過去，大致出現過三種論調：（一）全盤西化論；（二）中學為體論；（三）兼容並蓄

論。兼容並蓄論較為客觀，但是，應該容什麼，應該蓄什麼，人們還在繼續討論。

我們在此提出「繼承羣體主義、發展個體主義」的論點，做為今後中國文化工作的方向，望大家發表意見。

羣體主義，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克制私慾、利人利公的「仁道」，無疑是一個崇高的境界，我們不能將原本儒家的這種精神統統揚棄。不幸的是，在中國文化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原本儒家的羣體主義觀念被統治階級所利用，並推到了絕對化的境地。結果，個體被徹底抹煞了，本來含有合理因素的強調「愛人」的羣體主義，被衍化為以消滅個體為前提的絕對羣體主義。我們在批判絕對羣體主義時，應注意不要將其起源——相對羣體主義完全拋掉。

然而，當前更為重要的，似乎不是應該繼承多少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傳統文化始終存在，不管多少，想主觀上清除它，它都將持續發揮作用，這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對中國來說，當前急需的，是發展個體主義文化。在引進西方文化的內涵之一——個體主義的問題上，我們呼籲傳統的衛道士們網開一面，給個體主義文化一席之地。羣體主義在中國畢竟歷史太悠久了，太強大了，相比之下，脆弱的個體主義，更需要被愛護、被扶植。

我們樂觀地預見，個體主義文化在中國廣為傳播之後，必將與中國傳統的羣體主義文化結緣，產生生命力強大的混體文化。

本刊專訪台灣著名作家柏楊先生談中國人的民族性

正視自己的醜陋面

編者按：

台灣著名作家柏楊先生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訪問美國，參加聶華珍女士主持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有關活動。柏楊先生生在紐約逗留期間，於十一月十二日在現任「北美日報」總編輯俞國基先生寓所，與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林樵清、李兆欽、黃仕中及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進行了

長時間的熱烈座談。柏楊先生在座談中，着重談了中國人的民族性的丑陋面及劣根性。他說，他走到哪裏都要講這個問題，以喚起中華民族對自身的反省。他認為，反省是走向進步的開始。

編輯部根據錄音對座談進行了整理，文稿并經柏楊先生親自修改。文中，「中」代表中國之春，「柏」代表柏楊。

柏楊接受中國之春採訪。
——本刊記者攝



對國共兩黨的失望

中：我知道您十分關心中國人的苦難，是不是在這方面告訴我們一些您的看法。

柏：你要看中國歷史，五千年歷史中，有幾天是好日子？我們當然可情緒化的高聲吶喊：「我們很快樂，我們沒有一天不快樂。」但是，如果仔細看古人歌頌的漢朝、唐朝是怎樣記載，就知道我們中國人的命運，早就如此悲慘。不斷的發生改朝換代型

的戰爭，不斷的遭遇到瓶頸時代的屠殺。不料邁過這兩關，朝代穩定時又有傾盆大雨般凶暴的貪官污吏，對人民百般虐待。

中：這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您的感受是什麼？
柏：我小時候親眼看到國民黨精彩的一面——那種熱情澎湃和充滿新希望的情況。我是河南人，國民黨北伐到我鄉時，連鄉下的農夫都不由的產生景仰、崇拜的心理。但是，後來希望都成了泡影。你說有什麼辦法？共產黨建國時你們都還小吧？

中：我們大都在共產黨建國前後時出生的。柏：那時我已三十歲，所以我至少比你們大三十歲。

中：您是那年離開大陸的？
柏：一九四九。所以比你們多了卅年的經歷。我親眼看到了共產黨同樣了不起的蓬勃的一面。那時，人人認為他們是中國的救星。但是，沒想到壞起來更可怕。大家都說共產黨在晚年的毛澤東手中墮落了。但我問問題恐怕不那麼簡單。我一直在想所有

這些毛病究竟出在那裏？

中：經您提醒，我們似乎聽到了中國人的哭聲！

柏：有一次，我在洛杉磯講演，有人問我：您是否以當一個中國人爲榮？我脫口而出說：我不以當一個中國人爲榮。請您告訴中國人的榮耀在那裏？是我們的國家強？是我們的文化高？是我們民族對人類整個文化有建設性的貢獻？是我們的音樂、繪畫、文學出類拔萃？我們到底有什麼？請隨便講出來一個榮耀，我們國家有而其他國家沒有，或是我們可以和其他國家共享的。舉得出來嗎？

近五百年來中國人

對世界沒有貢獻

中：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對世界也有貢獻嘛。

柏：當然，我們有貢獻，但我們不能吹牛自滿，至少，我們最近五百年來，我真不知道有什麼貢獻。五百年來，我們的文化產物却是專制、廷杖、內鬪和奴性的養成。

中：不是有很多外國人崇拜孔老夫子嗎？

柏：中國人崇拜釋迦牟尼的更多，崇拜耶穌的更多。現在還有很多人崇拜馬克思，崇拜林肯。

中：您認爲有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柏：洋大人去了一趟台北、北京，就被形容爲崇拜中國文化。可是有這麼多中國人跑到美國不肯回去，以當美國人爲榮，是誰崇拜誰的文化？

中：您覺得哪個民族對全人類的貢獻最大？

柏：我認爲是英國昂格魯沙克遜。第一、議會

政治制度，現在那個國家不效法？第二、陪審團制度，使司法走上清明。凡是英國的屬地，獲得獨立之後，都用英國遺留下來的法治。英國一小撮人控制那麼多的殖民地，就靠它的法治，你說這個民族是不是有貢獻？你說，我們中華民族在最近五百年來，貢獻出什麼？你說中國人有美德。請問，中國人的美德在哪裡？都在書上。中國人呈現出的特徵是粗野、說謊、不誠實、心胸狹窄。

中：中國人有句話說：不要以最壞的想法去猜測別人，但在實踐上，偏偏以最壞的想法去猜測別人。我們應該透視自己、認識自己民族性的問題。

柏：我們民族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自己的醜陋，所以沒辦法進取，永遠覺得自己好，永遠覺得什麼都是中國好，結果越來越不好。

中：所以，這是文化方面的原因。

柏：是的，你們從大陸出來，對共產黨不滿意，搞起了民主運動。我想，這不是爲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是爲了自己的利益，回國起碼有飯可吃。尤其你們留美回去，更有飯吃，不但有飯可吃，而且飯碗還會特別大！我們這些在臺灣爭取人權、法治、自由、民主的人，還不是爲了同一個理想？我十八歲起就加入國民黨，一帆風順，現在起碼可以有個小官可做。但是，爲了這個理想，不但小官沒幹成，倒弄進了牢房裏去了。因此我想，爲什麼我們追求的一直追求不到？政權不好要它改革，但它不改革怎麼辦？只好革命，只有這條路可走。可是，革不成功，頭就割掉；革成功了

，他又和他一樣。

中：柏楊先生，你說你是國民黨，可是國民黨却開除了你？

柏：人的心歷路程在不停的變。抗戰初期，我曾參加戰時工作幹部訓練，我們那時年青，只知道國，不知道黨。如果沒有國，那有黨？流行的所謂「黨國」，實在是天下最大的荒謬。我從小對蔣介石忠心耿耿。後來，他把國家治理成那個樣子，使人痛心。但是，我想他是身不由己，他何嘗不願意國家好？他何嘗不願意民族好？毛澤東也是一樣，他何嘗不願意國家好？他何嘗不願意民族好？是什麼原因使他們身不由己？我想應該在中國文化中探本求源。

逾淮而枳的文化普紅

中：您是否作了這方面的探本求源工作？

柏：做了一些。目前，在物質方面，美國有什麼，中國立刻也有什麼。你有憲法，我也有憲法。但是，中國憲法好像戲院門口的海報，誰上一次台，就變一次憲法，那又何必必要憲法？又如何使人相信憲法？這就跟我們的文化有關係。中國古時的故事說淮河兩岸的橘子，拿到淮河北邊，就成了枳子。我們的文化就是淮河北的文化，逾淮而枳，好像是一個美國蘋果，只要搬到中國，結果就變成了乾屎橛！醬缸的侵蝕力很強。你們在美國留學，學會了解此地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當你們把這些帶回國之後，恐怕只要短短幾年時間，它就會被淹滅。

中：所以您說中國文化是個醬缸。台灣的孫觀



中國人應正視自己的醜陋面。

漢先生寫過幾本書，他也是在抨擊您所指的醬缸文化。請問，您所指的文化及您所說的民族性弱點（劣根性）是否是同一個東西？同一個問題？

柏：我先要有個聲明，我不是學院派，關於「定義」這東西，無法給予精密的說明。我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到現在未寫的原因，是沒有時間。但我受到「醜陋的美國人」、「醜陋的日本人」兩書的影響。這些書都是作者對自己民族醜陋面的一種感觸，一種觀察，一種檢討。不是純學術性的一種分析。我也聽過許多專家談到民族性的問題，實在是術語太多，行話太多，而不是我原來的想法。但是我可

以籠統的說，中國人的品質並不壞。例如在美國，學校考第一名的，很多都是華人，顯示中國人的智商並不低。而這種智商在單槍匹馬時尤其顯著，可是三個智商加在一起就起了很大的變化，互相抵消。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問題——醬缸可以消滅智商。至於醬缸如何形成？我認為形成原因並不很重要，因為到目前為止，我還不敢肯定出於某一個因素。但就我個人認為，這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所致。儒家思想從定於一尊之後，經過三百多年到了東漢，成了一個模式。那個時候規定，凡是知識份子，不論他的思想、講學、辯論，都不可超過「師承」。學生只可圍繞着老師所說的話團團轉。如果講得太多，超過老師，那就無效，而且有罪。不過漢朝時的罪並不嚴重，但到明朝、清朝，如果官方規定用朱熹的話解釋，就決不可用王陽明的話解釋，根本不允許知識份子思考，他們已完全替您思考好了。時間一久，知識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由於沒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沒有想像能力；由於沒有想像能力，因之也沒有鑑賞能力。

中：德國納粹時代，希特勒對人民說：你們什麼都不必想了，元首一切都為你們想好了現在則是共產黨宣稱，黨考慮的比大家都要週到。

柏：這是專制、封建的愚民政策。專制封建頭子都堅持一種想法：他比任何人都聰明。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是危險的，任何專制封建頭子都不准許有思考能力的人存在。

中：回顧中國歷來統治者的政策，很多是愚民政策。

柏：可是，思考力、想像力是創作發明的淵源。沒有這種能力，便無法創作發明。甚至時間一久，連模倣力也會跟著衰退。因為模倣力中多少也要有一點創作發明能力。

中：到底是中國的文化造成了這樣的民族性呢，還是中國民族性造成了這樣的文化？或是兩者都是學生兄弟？

柏：你這問題太大，我想這是雞生蛋、蛋生雞問題。

中：還是將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民族性合起來談吧，它們是不可分的。我一直有這樣幾個問題，希望獲得解答：

- 一、中國文化及民族性的弱點顯現在哪些方面？
- 二、其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 三、民族性的劣根性與中國不能產生民主政治是否有關係？我們如何面對這一問題而使之改變？

我有一體會，認為中國人缺少法治觀念。這大概也屬於民族性的問題。有一位來自台灣，在美受過教育的朋友曾對我講過一段經歷：一次，他驅車帶他從台灣來的父親外出遊玩。回來時，天色已晚，車遇紅燈，他就停車。他父親說：「開過去算了，現在四周沒人，何必等綠燈？」這反映了兩個人觀念的不同。

按美國的思想不論何時都該遵守紅燈，但中國人認為破壞了它沒有影響。中國人缺少法治觀念。你剛才又提到中國人難以合作，僅從智商觀點，一個中國人可以打敗一個外國人，但三個人加起來就完了，這的確是很大的問題——中國人不能合作。

柏：到底是中國文化產生民族性？還是民族性造成如此文化？我看應是互相循環。文化發展的方向，有時是非理性的，就像電動玩具，遇到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沙粒，它就自動轉換了方向。還好好像在山上踢石頭，你有力量踢石頭，但是當它滾下去時，你無法阻止它不滾下去。

中國人善於窩裏鬥

中：就如搞文化大革命一樣，把蓋子一掀，根本就控制不住了。

柏：所謂文化大革命，不過一場大窩裡鬥。

中：您要寫醜陋的中國人，我看先寫醜陋的中國之春吧。中國之春窩裡反已經有兩次了。

柏：這件事不稀奇！中國人天生的不團結。你們中國之春沒有窩裡鬥，就不是中國人搞的。窩裡鬥的觀念如果不改的話，這個民族不但不強大，而且絕對沒有幸福。中國人同時沒有開放的心靈，五千年的歷史，一直封閉。

中：對的，夜郎自大只是表面現象。

柏：中國人內心很複雜，恐怕舉世無雙。不要說政治問題各有主見，就連幾個小流氓在一起，動不動就看不順眼，打起來。實在是心胸狹窄到可厭的程度。

中：美國總統候選人蒙代爾落選後，立刻表示雷根是我們的總統，我們慶幸有如此的民主制度。

柏：中國人重視面子問題，所以死不認輸，死不認錯。凡人都有錯，我想只有牲畜沒有錯。中國人輸了，唯一的反應就是咒咀、罵大街。要達到蒙代爾的境界，恐怕還要三百年。

中國人的奴性

中：是不是中國統治者爭權爭迷了心竅？

柏：權力可使一個人腐化、愚蠢，比豬還蠢。一些封建專制頭子，難道真不知道他所聽到的一片阿諛和遍地萬歲，只不過是一種噪音，全是假的？絕對權力產生腐化作用，使人愚不可及。

中：是不是中國人太喜歡政治，永不敢放棄？

柏：中國人在一起最喜歡談政治，可是每個人又都怕政治。中國人有這種神經質的恐懼，對不應該恐懼的也恐懼。一般人都是得過且過，自己的權力自己不會把握，必須由有權的大老爺恩賜一點，才敢接受。

中：中國人認識不到自己的權利，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對此印象很深。在國內，共產黨當權者把很多人無緣無故地整了，關了。後來，另一派掌權後爲他平了反，放了他。平反之後，一些人還要感謝共產黨，說這是黨的英明！我們中國之春有次在洛杉磯開講演會，一位曾在國內被打成右派份子的訪問學者質問中國之春：共產黨現在給我平了反，還允許我出國，你們還要求怎麼樣？面對這種人士，我們還說什麼呢？他根本不知道，出國本來就是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力。他似乎認爲，他能出國完全是共產黨的恩賜。

柏：奴性養成之後，他自己都無法掙脫。有些華人入了美國籍，竟然不去投票。他沒想到這是保護自己利益的最好辦法。一位住在愛荷華的華人朋友，他的孩子被鄰居的狗咬了，主人又凶巴巴的，這位朋友認爲

沒有咬傷就算了。後來，被孩子的老師知道，就說不可以「算了」，不能讓別人認爲亞裔的人可以隨便欺侮，一定要提出控訴。結果，判決對方賠錢道歉。這件事不是幾十元問題，而是權利問題。中國人認爲要忍讓，這是美德。其實那是長期屈辱的結果，而用忍讓兩字來使自己平衡。很少中國人會據理力爭。

中：那是爲什麼？

柏：那就是中國人神經性恐懼心理，怕到時候吃虧。

中國人的空話、假話、毒話

中：這是不是中國人對自己的一種不誠實？

柏：中國說空話、假話、大話、毒話，脫口而出，從來不打草稿。我常想，美國有心理醫生，中國絕不會有心理醫生。因爲見心理醫生一定要說實話，中國人見了誰都不會說實話，明明是屁股痛，他要說耳朵痛。明明是女人不要他，偏偏對醫生說是他不要女人。心理醫生如何診治？

中：有個笑話，中國從前有位軍閥在開會時，有人送了一籃香蕉。他不知道先剝皮，於是帶着皮吃了。結果其餘的人也立刻把香蕉連皮吃了。

柏：這只是一群搖尾系統的拍馬術。現代的專制封建頭子則把連皮吃香蕉改成美麗的政治口號。

中：還有，林彪會說：如果不講假話就成不了大事。

柏：這真是敗壞中國人的品質，把說謊當作最高榮譽。可怕！

中：中國古訓云：君若愚民，民必愚君，有相互作用。

柏：也有報應作用，如果是個人，也就沒大關係。但是專制封建頭子這種作法，影響可大了，報應會落到全國人民身上。

中：中國人有人情味，美國人沒有人情味。

柏：中國人對「朋友」才有人情味，對陌生人不但沒有人情味，有時候簡直冷酷、殘忍，而且一旦厭惡，毒話就如雨後春筍。愛荷華一位華裔女作家，接到一封華文的恐嚇信，譯成英文後，被她的美國助理小姐看見，霎時嚇得尖叫。女作家的美籍丈夫也認為事態嚴重，就向FBI報案。後來拿給我看，發現使她們尖叫的是一句：
Hope you will suffer the result.
Wish you having no burial place for your body when you die。但我保證這封信不過是舊的廁所文學，沒有特別意義，因為中文原文是「死無葬身之地！」中國人說毒話說慣了，不過是肌肉的自然反應而已。

中：中國農村有種人叫做「罵大街」的，專門罵人，從街頭罵到街那頭。文革中，強迫「壞人」自己打着鑼自己罵自己：「我是反革命，我是壞份子！」

柏：這自我污蔑，猶如鳳姐叫奴才自己打自己的臉，傷害自尊，毀滅人格。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榮耀感，叫什麼民族！豈不成了一群禽獸！

中：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吹牛，沒有釣到魚還要到市場上買兩條回家吹牛，說是他釣的，結果買的兩條一樣大！

柏：這次我在愛荷華與其他國家的作家接觸，

包括共產國家，如保加利亞、東德等，感到他們可愛，因為他們平實、肯講實話。

中：常聽到中國人說老美好笨，好容易騙。其實，這種說法反應的不是老美笨，而是中國人壞。

柏：這種心理很卑劣，把善良當作傻瓜，中國就被這種人埋葬。想到這裡我覺得滿臉羞愧。

中：自己沒有高尚情操，還不相信別人有高尚情操。

柏：一位朋友在愛荷華開了一間很大酒店，是韓國華僑。美國人總稱讚他很能幹，很努力。只有中國人對他妒火中燒。有次我講演時，有人批評我崇拜，我說我是崇拜，身為一個現代的中國人，誰不崇拜？否則為何頭髮理這樣短？太太不纏小腳？有人又批評我侮辱祖先，事實上我是更愛護祖先，才講實話、直話。

中：請您談談這種情形是如何演變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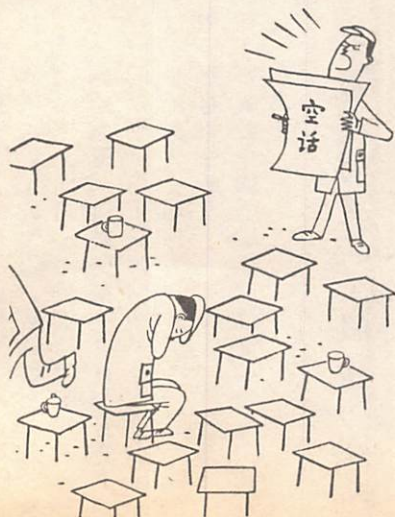
柏：我認為這是由於傳統的不准思想，和傳統的封建思想。此外，國民黨和共產黨受蘇聯的影響很大，而蘇聯又受東正教的影響很大。東正教跟天主教一樣，有一種「告解」制度。這制度引進之後，成爲「坦白」「檢查」制度，跟東方的貧窮愚昧結合，形成一種強大的力量。

中：五十年代時，中國大陸曾實施「向黨交心」，即「忠誠老實」運動。當時，大家都相信共產黨。於是，凡在思想上、行爲上有過過失的，都向黨忠誠地坦白了。共產黨起初也說得很好聽：既往不咎，凡向黨坦白了的，今後永不再提。可是，黨食言了。坦白的材料放在檔案中，人事部門控

制着，做爲把柄。在以後的運動中把它拿出來，做爲整人的材料。如此制度，使中國人學乖了，不敢再講真話，以保護自己。大家只有說謊。

還有一個笑話，文革時很多人要寫「檢查」。後來，大街上有人掛出牌子：「代寫『檢查』一元。」其實，檢查就是說違心話，就是說謊，騙自己、騙領導。代寫「檢查」，實爲代「說謊」。代「說謊」成了一種生意，還有價錢，說小謊小價，說大謊大價。

柏：說謊竟然成爲「美德」、「生意」，不可思議，你所說的代寫檢查，是在城市還是鄉下？



▲這是大躍進農產虛報浮誇的著名照片之一。

中：都有。很多家長的檢查都是小孩代寫的。
柏：共產黨不管？

中：不管，連黨的幹部也要找人代寫檢查。寫
檢查成了一套公式，先寫自己的「問題」

——錯誤，然後上網。寫
柏：什麼是上網？

中：上網，就是要上到階級鬥爭的綱，上得很
高。例如我拿了你一支筆，演變下去，就
會成爲貪污的資產階級份子，成爲階級敵
人，就會被階級敵人利用，造成千百人頭
落地。上網，就是上到路線鬥爭的綱，說
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
。然後還要挖根源，挖思想根源、家庭根
源、社會根源、挖祖宗三代。上級看你自
己侮辱自己越厲害，才准你「檢查過關」
。那時鄧小平過了幾次關，他曾向華國
鋒寫了兩次。這種情況已形成一種政治權
術的利用，毫無意義，上下相騙。

柏：這豈不就是鼓勵人民恬不知恥！

中：上網後，就放入檔案中。共產黨講求
辯證法，整人時，想要那方面就抽出那方
面的材料，形成一種高級的統治藝術。我
有種體會，共產黨統治三十多年，把以往
中國人最惡劣的品德，統統發揚光大。
柏：有人問：文化大革命是否把中國以往文化
中黑暗面清洗了？我想可能是黑暗的層次
更發揚了。

中：共產黨反對什麼，什麼反而蓬勃。反對白
樺，結果更多人去看白樺作品。我有個體
會，一個制度和民族性之間，能形成交互
作用，在惡劣制度下，把黑暗一面充分發
揮，反過來也培植了這種制度。

柏：我們從小聽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鼓勵
誠實。如果他誠實而打他一頓，以後他
就不會誠實了。

中國人的友情

中：中國人爲什麼對自己文化的落後面沒有感
覺？有人認爲是因中國太窮，在吃飯穿衣
均不能滿足需要情況之下，任何寡廉鮮耻
的事都做得出。可是，中國一向鼓勵大家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柏：這是人生境界的最高標準，不是每個人都
做得到。

中：你認爲中國民族優點在那裡？

柏：好比：中國人比較重視友情，而外國人之
間的關係比較淡薄。他們習慣於單獨作戰
。中國人這點比西方要好。中國人爲什麼
重視友情？因爲中國社會需要朋友。俗話
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在家有父
母保護，出外就靠朋友保護。而洋人並不
需要朋友保護，他有政府保護，所以朋友
對他的意義不同。例如，中途車子壞了，
美國人就會自動幫忙，中國人若非朋友，
恐怕沒人理你。我在愛荷華的朋友，大
雪天車子打滑，兩位黑人停車下來，消耗
了三、四個小時幫忙，他很感激，請他們
留下名字，準備回報，兩位幫忙人覺得很
奇怪，說：如果你遇到別人這種情況，也
會幫忙的，並非有任何企圖。朋友受到很
大感動。有一次，他遇到一位老太太車子
發不動，很遠就跑去幫忙。人情味是要發
生在彼此不認識的人之間，那才是真正的

人情味。人情味是不分等級，不分親疏。
中：聖經上說你要愛你的仇敵，中國人只對朋
友有感情。美國人在平常沒有人情味，但
在需要幫助時，他就會幫助。這可能是受
到聖經影響。

柏：其實他們平常對陌生人說「哈囉」，這就
是人情味。中國人陌生人見面，怒目相視。

中：外國人平常好像不愛國，但有需要時都出
來了。

柏：恰恰相反，中國人平常愛國愛得不像話，
每一件事都要愛國，結果把國愛成如此，
我常想不要再愛國了，或者，用剩下來
精力，先把自己愛好、先把自己的品質提
高就夠了。自愛就是愛國。

中：有人說，中國大陸值得驕傲的是原子彈和
氫彈。

柏：我認爲值得驕傲的應是人民的幸福——高
水準的軟體文化，一個乞丐托着金飯碗討
飯，跟一個衣暖食飽，受到良好教育的普
通人，那一個值得驕傲？

中：中國有些地方人民生活太苦了。例如甘肅
，真是又「乾」又「肅」，只見黃土高原
一片。比如用水，每家挖一個坑，下雨下
雪都存起來。從洗臉、吃水、餵豬全靠坑
中的水，一點不敢浪費。

柏：我痛心的是，中國人爲什麼沒有能力建立
一個現代國家？

中：毛澤東有很多錯誤，國民黨、共產黨都有
很多錯誤。但他們都是中國人，到底是誰
培育了這些人，還不是我們中華民族！否
則他們怎可長期生存？當然，美國人也有
自己的問題。

我們要敢於面對自己的問題

柏：我們想承擔美國目前問題的煩惱，還不夠資格。最近有一位大學教授，在北京演講說：美國的大選都是兒戲！說這種話，不是無知，便是無恥。劉少奇以元首之尊，慘死開封囚室，可不是兒戲！有人說，美國浪費金錢，我認為浪費金錢比浪費人頭好！所以我們必須反省。有的人一輩子都不知道那裏有問題，需要提醒。我太太便是我家的警察，她會常提醒我的錯誤。耶穌釘十字架時說：「原諒他們，他們所做的不知道。」年輕時，我認為這是屁話。中年時認為這句話雖然有理，却沒力量；

柏楊：全世界中國城都是藏污納垢的地方。這是紐約的唐人街（中國城）。



現在年紀大了，認為這句話非常沉痛。好像紅衛兵，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錯事，還以為他是對的。所以我認為有些話先從海外談起，再把它傳回國去。當然剛開始時大家無法接受，就如我在愛荷華大學講演「醜陋的中國人」，有人就批評我沒有看過某一本書。我認為他們可以說我講得不好，不能批評我沒有看過某一本書。中國人永遠抓不到問題重心；却精於和稀泥。我們該如何克服我們的弱點？

中：我常抨擊在台灣的中國人太粗野。後來才知道大陸上的中國人更粗野，使人沮喪。我覺得我們先從說話開始。多說「謝謝」，多說「對不起」，多說「我不能幫忙」。全世界所有的中國城真是藏污納垢的地方。再看看意大利城，看看日本城，他們的社區清潔整齊，中國人真是無地自容。中國文化中難道沒有一點民主？

柏：中國當然有民主，過去中國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

中：你怎樣展望中華民族和整個中國的未來？

柏：這要看我們這些人是否都能覺醒？是否知道我們的缺點是什麼？這是文化層面，不是政治層面。

中：你今天所說的，在台灣是不是也可以說？

柏：我說的話，人前人後，從官方到民間，從台北到紐約，都是一樣。如果能去大陸，我也是這個意見。

中：中國要建立一個民主制度，確實需要從改造我們的民族性，從醬缸中跳出來。如果多數中國人都不自覺，推動也相當困難。目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所處奴隸地位，少數人自覺也無能為力。

形成批評壓力，形成民主潮流

柏：我們現在就要告訴人民，「黨」在國家之下，人民與政府之間，是權力義務的關係。共產黨以前宣揚：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現在又宣傳「五講、四美、三熱愛」，「三熱愛」中，有一條就是熱愛共產黨。

柏：這是典型的唯心論和愚民政策。問題是，事實上並愚不了民，反而會被民所愚。這種政治手法，只能自己玩弄自己。我不相信這種現象永遠存在於中國。

中：我認為，制度與民族性、人性之間有很大依附關係。改造民族性是長期的過程，並非要等改造好了再建立民主制度。也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以有利於民族性的改造。

柏：所以我們爭一時，也爭千秋，有千秋的計劃，但能改變一點就改變一點。這種壓力一旦形成，會有很大效果。只看我們是否能加上壓力，形成一種非民主不可的潮流。

中：中國人太聰明，但中國人的小聰明太多，沒有大智慧。美國人看起來笨笨的，但他們却有大智慧。就長程來說，小聰明顯不過大智慧。

柏：中國人太聰明了，聰明得成了白癡。自己從八十層高樓跌下來，經過五十層窗口外，還在譏笑裡面喝咖啡的夫婦，竟然不知道不久就會被咖啡噎死！

中：時間不短了，我們先談到這裡。但願將來有一天能到台灣拜訪您。可惜，目前我們的雜誌還不能在台灣發行。

柏：歡迎你們到台灣去看看，到台灣後，住在我那裡，我招待。

中：謝謝！

「母胎化」與「枕墊」

—訪孫隆基博士談中國人的人格成長

作者介紹：孫隆基，香港公民，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明尼蘇達大學俄國史碩士，史丹福大學中國現代史博士。曾赴上海復旦大學從事研究工作，現任教於坎薩斯大學歷史系，目前從事用心理史（PSYCHO HISTORY）的角度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等書。

編者按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國之春代表黃仕中、王炳章、林樵清、李兆欽、等人在出席了費城的亞洲學術研討會之後，訪問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的作者孫隆基博士。孫博士侃侃而談，旁徵博引，立論新穎，言前人所未言，吸引了在座每一位人士的深深注意。以下是訪問內容。中代表中國之春，孫代表孫隆基博士。

一、在七十年代對港、台留美學生的見聞

孫：孫博士，您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在留學生及海外人士中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大家對您書中的觀點頗感興趣，請問您寫此書的動機是什麼？

孫：七十年代早期，海外興起了保釣運動，後來演變成統一運動，我也曾捲入過。在這個運動中，我看到某些行為，像年輕一代怎樣反叛老一輩的方式等。我發現，大部份參加運動的人，他們的反叛行為，往往必須要藉著集體的方式來表現。

在美國我同時也看到七十年代早期的反戰運動，美國的年輕一代反對上一代的

方式，是與上一代斷裂的；而台灣、香港來的留學生的保釣運動，他們的反抗方式是藉某種口號，例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之類，將自己的行動放在整體利益上，他們必須藉一個比本身更大的力量來運作。鬭爭的方式也不完全是對抗性的，而是標榜著爲了更大的團結才作出此對抗。這跟我在美國校園裏看到的美國年輕一代反抗的方式，大有不同。所以我後來想這裏面可能存在著某種不同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當初我只想就「政治文化」這個問題來寫。在一九七〇年代，我在美國看到了各種各式的左派政治運動。相較之下，國人很多的做法令人失望，當時的留學生圈子都是台灣、香港來的。在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像這樣在青春階段離開自己生長的環境，來到陌生的國度，除了必須去適應新的環境之外，個人內在也需要作出許多調整，才能真正說是過渡到成人階段。港、台留學生的政治運動也可以說是跟上一代的一種斷裂形式，而有的人也實現了一種實質上的斷裂：例如父母是國民黨，而他們來到美國後，轉向北京政權。但是大



多數人在這個運動中，是在找一個新的依託，以便在其中重新安放自己，這種新的依託，就是八億人口的祖國。在當時來講，這似乎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那時就是在搞回歸、認同運動，當然需要一個依託，否則就變成在搞個人主義了。但是我在這種名曰激進運動（Radical Movement）的背後看到一種逃避情緒，即個人爲了避免面對美國社會這個無邊際的「曠野」，已身感到不安全，需要再找一個熟悉的、溫暖的東西。這個東西可以是抽象的祖國，或由她所代表的一個理想的政治目標。如果以他們在校園中的最近身環境（Immediate environment）來講，則是由同類的人共同組成一個母胎。因而，即使是「反叛」，即使是與上一代斷裂，仍然是借助了自己之外的一個龐然大物，這樣是否真的是「成長」也大有問題。

中：您是否可以爲我們說一些實際上看到的情況？

孫：在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明尼蘇達校園所看到的情況：那裏有一些第三世界的左派，例如來自非洲埃塞俄比亞的毛派，這種外國毛派是表裏合一地公開打出旗幟，宣稱他們是馬克斯列寧主義者，並且已成功地將他們的同學會三分之一成員轉變成馬列主義者，同時也很具有國際主義精神。另外也有一批來自香港與台灣的自命左派、毛派者，在當地搞了一個合作社。照理說，中國人的毛派比起非洲人毛派來應該是更進一步，更能掌握到社會主義的精神，而實際上却正相反。在這些外國毛派想像中，這個正統中國毛派，一定是三頭六臂，殊不知這批人從沒去過大陸

。不過當時正當文革後，毛澤東聲望達到最高峯的時期，因此是「借了光」。當有些美國毛派想與這些中國毛派接觸時，後者，看不是自己人，就敷衍他們，背後還叫他們「鬼」。

他們這種團體，口頭上講得很正式的左派理論，而其實如果沒有政治運動，這些人也會結合在一起，那時，大概就變成一種大吃會，藉著吃喝社交來相聚相濡。而實際上，這些「馬列主義者們」，後來也越變越不像了。政治運動提供他們一個結社的藉口，來共同面對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出現斷裂的關鍵期，也可以說是藉結社來集體治療（Group therapy）。所以會產生這種特殊的需求，也許是中國人感情上的不容易獨立自主而導致的。而由於這個弱點，一遇到外來的接觸，就產生了這種閉鎖的心態，在國際社會中貽笑大方。

二、在大陸的見聞

中：您也曾去過大陸，大陸上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孫：八〇年至八一年，我在中國大陸住了一段時期。在大陸上，共產黨公開自比是母親。把黨當做母親來推崇，連蘇聯都沒有這樣。接著，我發現整個社會的體制也有類似的情況。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包容在一個集體的形制裏面，我開始用人格成長的角度來看這種情形。

在大陸這個社會裏，一個人不是單獨去面對各種情況，他是包在一個感情交流的網絡裏面。在這個網絡中，個人可以很

文明，相互禮讓，因爲在這個圈子裏面，相互的感情可達到對方身上，是一種熟悉的交流；而個人也迫切依恃著這種東西，所以在必要時個人也必須有所節制與犧牲。但一出了這個圈子，又是另外一種感情交流方式，是負面的（Negative）。就是很容易產生敵意，爆發戾氣，以至於互相吵鬧打架，因此，感情似乎沒有一種中間狀態。說到這裏，好像對中國人而言，自我控制的方式似乎很有問題，而問題的重心又在那裏呢？

在文明社會裏，每個人都是需要有所控制的，否則就像動物一樣。如果是在西方重視個人主義的社會裏，大多需要自我控制，若自我控制不了，可能在精神上就出問題。在美國有一些長期停留在童年心態的精神病患。在中國表面上好像比較少有這種情形，其實不然。中國社會個人受控制的方式是著重在與對方的關係上。如果彼此的感情交流能夠達到對方身上，則將彼此控制住；一旦沒有這種交流，就變成沒有管制。情緒的表現很難持平中立。一旦脫離那種溫暖熟悉，如胞胎一樣的環境的管束，就沒有安全感而產生敵意及粗暴的反應。因此，在強調個人自我控制的美國社會裏少數人出現的病態，在中國在雙方都控制不了對方的情形下則以常態出現。

三、「幸福情緒」與「危急情緒」

中：在心理學上有沒有這方面的解釋？
孫：若以心理學的名詞來講，在自己人圈

子裏的情緒是一種幸福情緒 (Welfare emotions)；一旦出了這個圈子，那種感情就變化成爲一種危急情緒 (Emergency emotion)。就是因爲越出了自己人圈子，就變成隨時要應付危機，遂有不安定的情緒產生。不過提出這兩個概念的心理學者並沒有像我這樣，把這兩種名詞應用在這樣具體的情形上。

如果再說得更具體一些，中國的個人在不熟悉、不受管制的環境裏，甚至對身體的衛生與禮貌也不去注意。例如隨地吐痰、擤鼻涕、走路橫衝直撞不顧禮貌、動輒發生磨擦等等。這種失控現象在五〇年代應該比較好一點，大概在文革以後才惡化，五〇年代據說上下車還互相禮讓。大概當時剛好建國，好像全國都是一家人，那種幸福情緒普及至五億人身上。文革以後，感情的交流就達不到那麼遠了，又退縮至各自的一個小圈子。這種小圈子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在明尼蘇達的政治團體，可以是六、七個，可以是十幾個爲單位。有時，甚至也可延伸至八億人的一個國家，但總不可能達到全人類的人道主義。中國對外政策不是常常高喊支援盟邦、講國際主義、指定國際歌要人民唱嗎？而實際上它的外交却是長期的鎖國政策，怯於與外面的圈子打交道，只是口頭上的國際主義。

相對於這種鎖國政策，國內的一個個小圈子，也是處處本位主義。舉個例子，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受官方委派，編一部黨史，需要向上海圖書館借資料，却要市委寫介紹函才辦成。在一個國營單位裏，如此好像把資料私有化了。這種現象有時

是體制問題，但是有時體制不過是加強了已經在那裏的閉鎖心態。

我在國內與國外看到的兩種情形，表面上似乎沒有連繫，其實背後有著共同的結構。等我從大陸回到香港，開始動手寫這本書，大概花了七個多月，可以說是倉促成書，現在看起來不太滿意。在書中，我試著以結構主義的方法來對中國文化加以分析討論。我對結構主義的定義是：有一共同的結構，而在不同的領域中擴散 (dispersions)。如果不是以結構主義來分析，則各領域中的這些現象看起來就好像毫不相干。

政治行爲也是同一個文化結構在政治領域中的一種擴散。在七十年代港、台留學生的「統一運動」中，強調民族團結，骨子裏即使是搞鬭爭、分裂，公開都不能講自己是代表局部利益的行爲，必定自封是代表整體，將對方說成是局部。個人的伸張若沒有集體作護符，就好像沒有合法性，個人就是不敢確立自己的立場。

四、「個體化」與人生階段的斷裂性

中：以您的觀點，中國人的個體獨立並沒有發展的很好，是否中國文化傳統裏沒有個體主義？而您這本書的主題是否即在論述這一點？在這個論點上，您是否受到佛洛伊德學說的影響？

孫：我是運用到一些佛洛伊德的理論，由他成立的心理學派強調個體化 (Individualism)。在西方社會裏，一個人一生的各階段之間講求的是斷裂 (break)，因

爲成長過程就是意味一個人不能被困陷在人生的早期階段裏，須從對父母的依賴中脫離出來，也就是說要有成功的斷裂。美國現代社會尤其講求這點，以我在明尼蘇達州看到的一個例子來看，有一個在圖書館中干擾女生的美國暴露狂精神病患者，四十一歲還與父母住在一起。很明顯的是一種無法斷裂，不能適應美國社會產生的一個極端的個案。

一般來說，人到成年後，如果尚不能擺脫理想化了的父母形象，常會把這個形象轉移至師長或當權者身上，這種人的情感依賴性較強，他們不太能夠運用理性的態度來面對所處的社會，也不常冷靜的去分析事物。缺乏一種自我反省的基地，也就是與面臨的對象之間沒有保持一種疏離的態度。西方社會的疏離感較普遍，他們即使對親如父母者，也可以從感情中跳脫出來，能以一種批判的態度來審視；相形之下，東方人在這方面就比較欠缺，感情的放置非常絕對化，對所愛的人往往認爲他（她）是世上最好的，對權威者無條件服從，認同於統一的思想等等，這種感情可歸類爲感情主義 (emotionalism) 的人格。

由於這種感情主義的人格，中國人成長過程的斷裂情況常常不很明顯，社會也並不積極向個人施予這種壓力。從兒童期至成年之間的青少年期就是一次斷裂，這個年紀的青少年在美國有的相信邪教，自殺率也高。中國社會裏青少年不常面臨這種抉擇，比較少有這方面的問題。但相對的是一生都包容在相似的環境裏，人格較不易成長。

從青年到老年的過渡時期，則容易出現中年危機，必須面對青春的消失。最後一個危機是老年，面對死亡與老化。東方人一生中這些轉折點很不明朗，或甚至沒有。階段之間斷裂性沒有美國社會來得尖銳。在西方人眼中這些轉折點是必須由個人自己去面對的困難與危機關頭；在東方人身上却可以拿別人來枕墊，而由於這種枕墊作用，從兒童至成年的各種過渡與斷裂，常常沒有完成。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中國人對排泄物的處理、暴戾氣質的控制不成功的原因。

這種枕墊作用常使東方的個人不易確立自己，所以對權威的依賴與要求性極大。即使在現代化了的日本，會社員工對公司仍存有一種家庭式情感：穿公司制服、戴公司徽章、唱公司歌等。這是東方式資本主義社會裏的依賴，將個人全部包在公司裏面。大陸上則是社會主義制度底下仍保持東方式的依賴人格。這種情形與母胎化有關。

五、中國人成年之後仍在感情上 依賴理想化了的父母意象

在大陸上四人幫時代有部電影叫「決裂」，劇中主角不願意穿媽媽千里迢迢為他送來的布鞋。失望的媽媽認為他讀了大學就不要媽媽了。這種指控變成了當時認為的「修正主義」的內容之一，這是四人幫極左思潮下所譴責的「修正主義」，而後來王若水講的「異化論」，則認為人民是母親，共產黨是兒子，異化則是兒子長

大後，不受媽媽控制。這種母子關係的比喻，已不是馬克斯的異化論，而是異化論的中國化。像這種依賴母親的情緒也可上溯至方志敏、瞿秋白、蔣光慈這些早期的共產黨人士，他們也有這種引伸，將祖國喻為母親。父親比較不常被用來比喻。

但中國人童年期對一個理想化了的「父親」依賴之情，也往往在一生未化解掉，反而是轉移到師長或當權者身上。不是大陸這樣，新加坡人對李光耀的擁戴與維護也反映出同樣的心態；香港人甚至將此情結投射在港督麥理浩身上，稱他「愛民如子」。英式政治當然沒有這種口號，是中國人自己將這種孺慕之情投射在英國人身上；台灣的前總統蔣介石却是常以「愛民如子」來自勉。被統治者好像認為這是應該的；在上面的人就應該好好照顧人民嘛，兩者之間不應該是一種冰冷的法權關係。如果講究法權或人格平等的爭取，則被統治者反而不高興，因為他覺得上面應有一個主動保護他的「青天」。像這種個人的感情比較被動的情形，照佛洛伊德的觀念則被稱為是一種「被動的愛」(Passive Love)，亦即是期待有一股比自己更強的力量達到自己身上，自身是承受這股力量的對象。在佛洛伊德理論裏沒有我所用的「母胎化」這個名詞，他將這種感情歸在「被動的愛」(Passive love) 這個範疇中。

六、被動的愛

佛洛伊德這種「被動的愛」概念，很奇怪的是往往與同性戀相關連。一個人若

在成長期間，人生早期階段沒有完全擺脫掉，男性 (malehood)、女性 (womanhood) 的覺醒狀況與氣質就不容易全面盛開，因而產生性別的混淆與曖昧。在西方是過份強調個人這方面的成長與表現，所以有的人雖然還沒有達到這種心理狀態，也要勉強跟隨人家。所以他們對男與女或女與女這種同性之間的勾肩搭背，過份接近的行為會大驚小怪。我聽聞一個在西德長大的華人回到大陸，到天安門前一看，覺得天安門前面手拉著手，肩搭著肩的都是「同性戀」。在佛氏理論中，人格成長至最高峯，應該是生殖器主導 (Genital Pinnacy) 階段，是以追求男女關係為主要導向，這是西方社會的主流模式，有的人達不到而去搞同性戀，就變成了反主流。在美國同性戀者好像是公開與這種主流對抗。

在中國與日本的東方社會，這種傾向是潛伏的，不應叫 Homosexual，應該叫做 Homosocial，亦即是說，到了青春階段往往還是以男男關係或女女關係佔主導。仍然不肯棄同性圈子，似乎東方人到了青春階段，成長的步調比人家慢了一步。停留在同性關係為主導的階段；反而看到搞男女關係會大驚小怪。大陸上幹部整人時所列的罪狀中，往往有一條是「搞男女關係」，這種指控好像是在說「吃飯」也是罪惡一樣。即使是在海外的中國人圈子裏，一男一女多談兩句，不關他事的第三者即神情古怪，事後還會對男女任何一方或雙方都予以盤問刺探。在美國社會則是對男男關係或女女關係才會神情古怪。一位到中國工作的美國專家，看到手拉手的

同性解放軍戰士，就想要拍照下來。中國人一般的情形是：對不是爲了婚姻的男女關係就大驚小怪。

中國傳統一貫的男性形象，從京戲、崑曲到紹興戲，小生的扮相都是唇紅齒白，以小嗓來唱。而他對女性的感情往往是一種「被動的愛」(passive love)，像白蛇傳裏許仙碰到白娘娘，就覺得對方是一股比自己強大的母性力量，於是他只會哀哭、求饒、跌倒在地，這種愛情對男方來說，是一面倒式的、被動的。在今日港、台的武俠小說中，男主角多半是介於開竅與未開竅之間的「超齡兒童」，他的被動氣質往往引來了三、四位以上的理想化了的女俠的倒追。對這種安排，作者與讀者都不引以爲怪，反而是引起共鳴，產生代入感，大陸在不久以前製作的「牧馬人」這部電影，就描寫一位被下放到內蒙古的青年，一位大娘好心端了兩碗麪給他吃，他就覺得在群眾中「找到了母親」；後來結婚了，也是由「群眾」幫忙，連新娘帶證書主動給他送上門；但洞房却是無法由別人代勞的，那位男主角却躺到了地上單獨去睡。待女的早上醒來一看，以爲男的嫌她醜，就哭，男的急了，就說自己是「右派」，不想連累對方；女的說她不管這些，兩人才進入狀況。在這裏，其實是男方要女方作出「你再不行我也要你」的表態，才能安心地去「表演」(performance)。這樣的劇情其實是很寫實的，問題在於編與導都沒有疏離效果，沒有讓人看出這是某種具體條件下人格局限之表現，反而將主角美化，當作是抗拒外來精神污染的正面教材，是「民族美德」的模範。

中國中國傳統戲曲中的年輕男性，大多為唇紅齒白的扮相。如「白蛇傳」中的許仙(右)。



七、「國王必死」與精神上的斷奶

爲了擺脫依賴感，在西方文化中常常強調象徵性的「殺父」，希望在心中祛除父親意象的壓力，保持與任何一個個體平起平坐的心理形勢。我最近留意到在很多西方電影、小說中強調的一個主題，我將它名之爲「國王必死」(The king must die)，這是從伊底帕斯(Oedipus)神話演繹而來：即國王不死，王子就沒有辦法變成國王。老的不能總是霸佔住位置。如在一部電影「星際戰爭」中(Star war)中，青年英雄 Skywalker 有一個成人典

禮，他背後有一個導師 Obi-wan-kanobi

，在第一集裏假意死去，從他身邊消失，以免阻礙他的成長。「女超人」(Super girl)這部電影中也出現同樣的主題。

中：您的這種母胎化或 passive love 的理論與書中所提到的口腔化是否有關係？

我在書中所提到的口腔化傾向，說到中國人比較強調吃，因爲口腔的滿足是屬於人生的早期階段，所以口腔化與母胎化當然有關連。因爲母親是照顧吃的一方，所以在大陸上共產黨歷來自比母親。他們保證每個人有個「鐵飯碗」，然而人在吃以上的階段則完全被抹煞，一生交給黨安排，沒有自我。另一方面他們認爲人應該是「無私」的：革命時共產黨烈士爲人民犧牲，現在輪到人民交心出來——因爲我是先爲你而存在，現在你也要爲我存在，這是一種母子關係的典型(model)。而談「異化論」的王若水想將這個邏輯倒過來，不過他還是沒有跳出這個模式。

我在書中提到，中國人的人際關係可能是一種母胎化的替代。我也提到中國人際關係的名詞百分之八十與吃有關。我前面提到過，在自己人也就是「熟人」圈中，個人是被對方管束的，而他也必須將自己交給對方，因此在「熟人」圈中大家好說話，這個「熟」字，就是煮熟了的「熟」字。「生人面前不易開口」、「熟人中間吃得開」、「生人不吃你這一套」、「吃裏扒外爲人不齒」等等字句都與吃有關。另外人情味這個「味」字與烹調也有關，「熟人」味道當然比較對，如果他不懂憐的話，就是寒酸，是冷的、沒煮過的。這一切聽起來相當的口腔化。

中： 這種口腔化傾向與形成的原因是什麼？

孫： 我是以人格成長的過程來解釋這個原因，但並不是說中國人停留在口腔化這個階段，而是成長後口腔化的遺留特別嚴重。另一方面也相當的身體化，中國人常把人格誤解為人身，「人格攻擊」到了中文裏變成「人身攻擊」(physical assault)，其實前者是指污辱其人格，而後者照字義是身體上的受攻擊。中國人稱「自我」為「本身」，即身體，而不是提到人格。又例如「安身」，在一個安穩的環境將自己放進去，是靜態的；英文中的 career，其法文字源的動詞用法有「全速前進」的意思，因此是動態的。另外如「身體力行」、「身教」等。這種身體化的傾向可能也近於人生早期階段，即與嬰兒時期身體受照顧而「自我」仍未萌長的感受有關連。

至於困陷於人生早期階段的人格發展，究竟是好是壞，則屬於另一種價值判斷。如西方有些思想家覺得現在社會中的這種理性化文明並不好，因為它將人感情的完整性破壞了，因此，人生早期階段才是失去的樂園。法國一些結構主義心理分析學派的拉坎(Jacques Lacan)，認為人生最美好的階段即是母胎階段，他稱為鏡子(imaginary)階段，有如鏡中反射，主客體未分化的狀態；到了象徵(symbolic)階段，則人生就隔了一層了，開始使用符號，並非直接反映自己。在鏡子階段，個人與母胎，即人我界限並不明朗，從別人身上只是看到自己而已，是一種最沒有異化的狀態。這以後，都是一種異化

，例如斷奶過程，即是一種異化過程。人生早期是包在一個熟悉安全的環境裏，經歷異化，好像是經歷一種失樂園的過程。至於認為個人必須在精神上斷奶的這種價值判斷跟現代化有否關係，我覺得其關係並不大。所以有人問過我是否將「個體化」的好處絕對化，即認為不管如何，個體化都是好的，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寫這本書並不是要提出一個什麼救國方案，只是一種個人論述(Personal statement)。至於日本式的現代化，帶來各方面的成就，但它可能沒有達到個體化。因為他們也有同性關係壓倒異性關係的導向。例如結了婚的男人下班後並不急著回家，與同僚出去，好像還是初中學生那種「不接受女生參加進來玩」的心態，但這樣才有集體主義。如果他們也有生殖器主導性，著重男女關係，就不喜群體而強調私生活(privacy)了。我在前面提到的港、台留學生之鈞運、統運小團體成員，都是青春階段身赴異國，遠離了爸爸媽媽的控制，本來是可以搞男女關係的，却一頭栽倒在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圈子中，彼此施以泛道德主義的制約，由此可以看出，個體到了青春階段追求私生活的衝動並不強烈，反而是兒童式的「母胎化」需求壓倒一切。但是，正如前所說，日本人有同類傾向也可以現代化，因此我認為這類傾向與現代化並沒有什麼關係。

八、中國人的人格發展缺乏超越意向

中： 如果你要重新修正這本書，你有什麼其他的觀點想加進去的？

孫： 到目前為止，就是剛才講的這些。其實也是以前觀點再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則更偏重人格成長階段理論，這種觀念已不算是一種結構主義的方法。但若涉及這樣的人格在不同領域的擴散，也還是需用到一些結構主義式的操作。

中： 你認為中國文化中的人格發展跟中國長期的集權主義社會，或集權專制社會有什麼關係？

孫： 我大概不會用「集權」這兩個字，而是代以「超穩定」這個名詞。幾千年來中國好像不太有變化，這與剛才講的人格成長過程的階段不明朗有一種共同點，亦即兩者的發展過程都缺乏一種超越(transcendental)意向。前面講到個體每個階段需要斷裂，往更高階段進發。如果以人生早期階段為滿足的話，即缺少一種超越意向。幾千年下來的中國歷史也就是這樣，似乎也在每個中國人身上體驗到。以西方人的成長方式來看，成長就是不安，每一次突破都是去面臨重新變成陌生的客觀世界。中國人的人格成長就比較拖泥帶水，按照某一派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觀點，中國社會發展到了奴隸社會時，原始社會還有些許遺留，到了封建社會，前面兩階段遺留也未清算掉。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時期，早期階段都仍有些存留下來，社會發展過程中斷裂感不夠強烈。因此在中國整個文化中最強調的一點是「安」：希望安定團結、天下大治，不願意亂。所以「動」與「亂」兩字常連在一起，因為平常只要「安」，「動」起來也不知道如何動法，以至流於亂攪，「越亂越好」。譬如文革就是一次這種表現，它本來

就是要實施一種黑格爾式的，由鬪爭與對立導致進化。鬪爭、對立照馬克思從西洋史總結的經驗來說，是推動歷史的力量，但一旦用到中國就變成了「天下大亂」——連當時最高當局也用這個名詞。演變下來，「亂」已不成為動力的來源，而是「動亂」。因此中國人比較要求安，認為成長過程就是一種不安，而有上述那種不求成長的心態。因此當個體本身的存在，面對人生各階段危機時，在西方人的眼中比較嚴重，成了西方存在主義者的難題。但對中國人來講，「愛」與「死」這兩個概念，在人生中都不是很特出。在西方，大概也是自佛氏以後比較強調起來，「愛」就是性愛，乃青春階段追求的高峯；「死」就是面對整個個體的存在將要消失的恐懼。在西方，不管是在人的意識裏面，或大眾文化媒體、小說中，都很強調這些概念。這些問題對中國人來說，則因為自我不太發達，所以從自我身上發出的性愛，或自我面對死亡、消失的感覺都不是很強烈。這些問題可以藉別人來當枕墊而消失掉。

九、中國人的人格內容 ——外礫性壓倒內在性

所以中國人在面對現實時，都比較軟心腸，往往不願意看到人生的實際狀況（human condition）。無法體認到人可能歸根到底，都是寂寞的。大部份中國人覺得這種存在主義的境界是很遙遠的，它只出現在少數知識份子紙上談兵式的高層次

的思想中。但是，事實上，在中國人的文藝與電影中，對人的實際存在狀況就很少挖掘得很深刻，可以說連文藝意識也因為與現實之間枕墊太多而造成心靈堵塞症。此外，在中國人的語言中，敘述人的行為常慣用一種泛道德主義的名詞，規範（normative）語氣也常勝於陳述（descriptive）語氣。就是以外的規範來衡量人的行為，而不以心理學的名詞來描述個體行為，不去關心個體心理操作的機制（mechanism）那裏失調？失調狀況如何？這種泛道德主義語言變成一種社會控制，要人有羞恥感，要在別人的眼中受規範約束。每個人的觀點沒有疏離化，只有絕對化，總把自己的觀點看成是全體的觀點。對別人有異點則沒有安全感，因而缺乏容忍的雅量。總是要限制別人與自己一樣；反之，也容易跟隨別人，去附和多數人的觀點。

在西方人格成長過程中，兒童期到青年期之階段多受外力塑造，是由父母傳授社會的觀點，因為那時自我的反省能力還不發達。「自我」還未完全建立。到青少年期，則出現一個「認同危機」，他與以前的父母教導的外礫的規範決裂，必須再去找屬於由自己決定的原則，例如在宗教、性各方面的原則。當原則由自己決定後，就須遵守（不能遵守即是脫離自己的原則），它的後果也必須完全由自己負責。這種自己負責後果的要求對於中國人是比較困難的，他們總想要求別人分擔一些。所以，在大陸上，個人將事情辦錯了，他就總是說「上面規定」的，希望把責任拋出去。如果由兒童到成人的過渡完成了

，青春期以後的成人階段，「道德」就變成了是經過內省的，即使是父母教導的，也要再經過一遍，由自身決定保留下來與否，因此與兒童期來自外礫的社會道德有所不同。但是在中國人社群裏，道德永遠是外礫的「社會道德」。中國人一講起道德，都是社會道德，要用眾人來壓倒個人，大家都不做的事情個人就不能去做。

十、人格形態與 社會、經濟的關係

中：您方才談到的中國人性發展與整個中國的社會調節有沒有關係？您說到中國是要求安定的，而實際上有一大動亂，則比西方還要嚴重，這種社會調節方式與中國人本身的性格之間有無關係？

孫：中國社會調節方式其目標就在求安定，認為不安定是一種變態，所以沒辦法造成進步，社會發展只能巡迴地原地打轉。至於團結，中國有十億人，是幾個洲人口之總數，只香港人口就比丹麥多，到舊金山唐人街一看，兩條街就擠了五萬人。這種人口密度不可能有個人主義的存在，可以說連個人主義的空間都沒有。中國幾千年來一方面要求安定，一方面也喜歡這樣很多人擠在一起。在這種擁擠的型態裏，個人必須有不同程度的犧牲，才可能維持這種型態。這種歷史發展的型態，在歐洲

就看不到，他們頂多達到一個「共同體」而已，他們同屬一個基督教的文化，但沒有辦法做到定於一統。中國這種定於一的代價極大，就像西方個人主義也是付出很大的代價一樣——個人須單獨面對生命危機，而有許多心理問題的產生。

中國這種文化的特點，您認為與中國的生產方式有沒有一定的連繫？

孫：若以經濟還原主義來解釋文化，中國的經濟是分散的小農經濟，一方面是一盤散沙；以前是農村中的各小農戶，現代是公社的生產大隊（目前又有回復到小農戶的傾向。每一個小單位的個人講求安身於本單位中，單位彼此之間的連繫不夠，而由上面一個「大一統」連繫住。在它下面就是「小國寡民」，這兩種傾向互相補充。長期下來，就形成了對個人的權利不夠尊重，因為個人要靠身處其中的那個母胎似的東西來依賴，不能與之爭權，因為它是養傷的來源，不能與它切斷，或將界限劃得很清。另一方面，既然那些小單位沒辦法組成一個大一統，同時文化的模式又強調整個國家應該在一起，在交通還不發達的時候，整個國家的模式就以家庭為模式。中國的國與家是連在一起的，叫國家，整個國就是一個大家。儒家的修齊治平政治哲學，就是要從家推展出去，以家為國，而至於以國為家。明顯的例子，如台灣的政權，已快傳到第三代了，其他的東方文化也有共同現象：北朝鮮的金日成、新加坡的李光耀，都想把政權傳到自己的下一代。家庭的成員彼此錢財、利益不能分得太清楚，不能見外，這種觀念延伸到國家，則治國講究的不是法權，是要求政

府親民。用現在的名詞講是要求「為人民服務」，而這種服務的代價是要求你交心，一生交給黨來安排作為回報，基本上這是一種親子關係。共產黨所實行的方式，至少在文革前，他們那種親民的方式可以說是成功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個問題，只是親得太厲害，就把十億人都吞沒了。

十一、感情壓倒理性 ——缺乏疏離效果

美國社會是最反對母親情結的文化。譬如有部電影 Psycho，描寫一個心理變態者，因為心理上沒有脫離依賴母親的童年狀態，所以在青春時期不能進行異性關係，以致演變成殺害每個挑起他性慾的女性。



，這種故事在中國人眼中很難想像，也很難理解這種對母親的態度。還有一個電影是由一本自傳改編而來，叫 Runaway Deariest，是一女子寫的罵她母親的書。這種感情就是疏離效果而引發，整個跳出親情外，以理性或自認為理性的態度，來批判感情。當一個以感情為主導的話，這種疏離的能力就不發達，就是不會批評，甚至連一點念頭都不敢動，任由感情將理性淹沒。因為以理性來分析各種親密的關係，才會產生異化效果。這種異化、疏離感、陌生化是現在西方文化的一種主流，滲透於人際關係、社會及家庭關係各領域。因此他們比較有冷嘲、批判的能力。中國人能夠將共產黨當做爹娘，就完全缺乏冷嘲的態度，是無限的信賴，不能以一種冷靜的態度來懷疑別人對自己的殷勤及好處。一個人個性若不獨立的話，整個人依附在對方身上，那還有批判的能力！因此，一般中國人與世界之間往往是枕頭太多，有些現實不會也不想去體認。然而，人之間的感情關係往往也是一種權力關係，是誰控制誰的關係。中國人却往往將感情關係美化、絕對化，西方人却可以在感情關係中看到它的陰暗面，即使是母子關係，他們也以功能化角度來解釋母愛，並沒有將它理想化而成為人類情操的最高峯，所以不會有中國的方志敏、王若水那樣的情懷或觀點出現。

西方人認為母愛是兒童階段不可缺少的東西，過了這個階段就要與之斷裂，這是很功能化與理性化的，也是冷嘲式的。中國人則是對感情無限信賴，所以一旦失望，一旦被無限信賴的感情所傷害，就會

有過分的反應，變成比西方人還要極端的冷嘲，什麼都不信了，懷疑一切，覺得天下烏鴉一般黑。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出家、李宗吾的講面厚心黑的厚黑學。完全信賴與過分冷嘲，是兩種極端，一種是感通，一種是反感，都是比較感情化的態度，這樣的感情並沒有經過理性的批判。很多中國人往往第一次戀愛失敗即終身遺恨，連以後的婚姻都是草草收場，就是因為他的理智不能凌駕於感情之上。

中：中國人和西方人對婚姻問題的觀感，據你的了解是怎樣的？

孫：還是可以用異化來解釋，一個人感情若獨立，分離也無所謂。婚姻中依賴感去掉，剩下的東西就很少了。中國人的個人主義不發達，男女關係也常以兩代之間的親子角色表達。女方以一種母性的態度來對待男方，成爲一種母子的不平衡的關係。東方的男性比較有這方面的傾向，傾向於兒童化。女性本身也有兒童化的一面，她在碰到某一種男性時，顯現出來的是母性化，到了另一種男性面前又可能撒嬌，因此也有傾向兒童化的一面。兩性的結合傾向於照顧式的，照顧則多及於身體方面。這種兩性結合現象，並非兩個平等人格之間的互相欣賞與強性的性愛。相互的欣賞與強烈的性愛其實很容易消失，會因年老、熟悉而消失。若兩性間沒有依賴感的維繫，就很容易像西方人那樣動輒一拍兩散。中國的男性很容易有上面第六節中所述的被動式的感情，而有些女性也喜歡找這種類型的男性，易於控制，以便依托終身。我這種分析也相當冷嘲，是不是人際關係要持久，必須有這種依賴感呢？我並

不是提倡這種關係，只是一種分析而已。事實上，每個人不管東西人，總或多或少有「長」與「幼」這兩面。有些人面對權威，身不由主總會潛意識地將自己放在兒女的角色上——不管是服從或反叛，都是把對象看成父母的形象；在另一些場合則將自己放在父母師長的位置上，這種角色的規律性在西方甚至可利用到商業推銷心理上。大致上，東方的男女關係較常以兩代之間的對應關係出現，仍然是比較外際的角色，壓倒個體化內容，西方人較少這樣，所以他們的婚姻關係比較不穩定。可是不穩定是否就是不好，這又是另一種價值判斷了。

十二、儒家學說的地位

中：

最後再請教一個問題，上面所說的中國人這些特點與儒家學說的關係又如何呢？

孫：

儒家我覺得它比較是表層的東西。中國人的內外有別的觀念，以及一出了他熟悉受制的環境後，就不易控制自己，比較容易發作。這些情形，我認爲即使沒有儒家文化，它也會存在。當然幾千年兩者也有互爲因果的因素存在。儒家提倡親疏有別，劃了小圈子，限制個人感情投射的層次，運用在外交事務上，以往也是層次有別，例如清代對西北蠻夷、對日本、朝鮮，到後來對洋人，都分別各用一套，亦即是將世界整齊地劃出同心圓圈。

中：

提到儒家的影響，有很多人從小受西方教育，譬如李光耀，最後爲什麼又回到儒家？

孫：

我想是他基本內在因素並沒有受到西方教育的改變，而且李光耀引用儒家，利用的成份很大，利用儒家便於他的東方方式統治。

十三、結束語

我在前面曾指出：「個體化」與現代化之間並不一定存在一種必然的關係。雖然，不能否認：像現代專業主義的內在邏輯本身，港、台、新加坡的資本主義發展，以及大陸目前進行的經濟改革，都不免或多或少地會增長「個人」的因素，但若認爲勢必導致「個體化」之被確立爲最高文化價值，則又未必。

曾多次有人問我：「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有否包含一種「救國方案」？這種問法其實仍然是集體主義思考方式的（自然也無可厚非）。我的答覆總是：該書是一個個人論述（Personal statement），不過是一個「個人」敢於說「我並不欣賞這十億人」而已。因此，出發點是個人主義。在今日的西方就有不少這樣的著作。例如 Christopher Lasch 對美國「自戀狂文化」之批判，就是一個人將二億多人當作狗屎之舉。這自然也不是什麼「救國方案」。事實上，在越來越精密化與複雜化的現代社會中，已經排除對所有問題作出一整套體系的通盤的終極答案。但是能夠產生這類著作的意識構造，也必然是一個多元化的文化媒介之產品。自然，這類著作也不排除在具有同感的人身上引發共鳴的可能性。

打破民族性、

傳統文化和專制制度間的惡性循環

—在康州華社座談會上的發言

王炳章

編者按：一九八五年元月十三日，中國民聯王炳章、李奕茶、黃仕中和劉剛四人，赴美國康州溫澤爾鎮，應邀與當地的華僑團體——華社的多名人士座談。座談會由華社負責人李世玲女士主持。王炳章在座談會上做了發言。編輯部根據當時的錄音，對其發言做了整理。整理稿經王炳章先生本人修改、刪節及補充，發表如下。

各位朋友：

很高興來到康州，與大家共同討論我們中國自己的問題。今天座談的題目是「中國傳統文化、民族性與現代化」，這個題目太大了，而我又不是學人文學科的，只能談談個人感受，可能會講出很多歪理和外行話。盡管如此，我還是願談一點自己的體會。投身中國之春運動已兩年了，自己深深體會到，要爭取中國海峽兩岸的民主，就必然觸及民族性與傳統文化，觸及它們與專制制度的關係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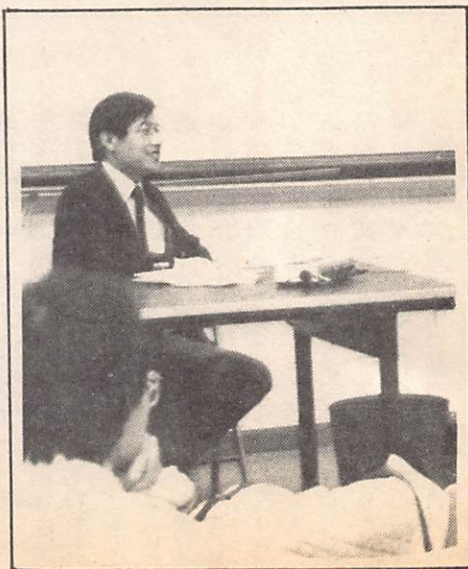
我首先願說明幾點：

第一，今天我談的，多是揭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瘡疤。但是，這并不意味着全盤否定我們自己、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就像美國電視播放一個反映社會犯罪問題的專題節目，并不意味着否定美國的民主制度一樣；

第二，我們民族的一些缺陷，其他民族可能也有。但是，我認為，他人的缺點，絕不能構成維護自己相同缺點的理由；

第三，既然是談民族性的缺陷，而我本人也屬於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那麼，這些缺陷也會或多或少地體現在我自己身上，我是和大家一道來進行反省的；

王炳章博士在康州華社座談會上發言。



第四，下面所談，不是什麼研究報告，多為一些個人感受，因此，想到哪就說到哪，凌亂之處，非邏輯之處，請各位原諒。

中國民族性的某些缺陷

民族性是一個民族長期形成、并較穩定而普遍存在的行為和思想活動特徵。傳統文化則指一個民族在過去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又特指精神，如文學、藝術、科學、宗教等。從定義即可看出，民族性和傳統文化是關聯的。一個問題有時可以歸到民族性中談，也可以歸到傳統文化中談。下面我談的一些問題，也會有這種情況。

一、虛偽、愛面子、兩面派

虛偽、愛面子、兩面派，這幾個字很刺眼，但一些親身經驗，使我常把這幾個字與我們中國人聯繫在一起。

比如說，很多人說不出「不」(不)字，沒有勇氣、沒有辦法說出「不」字，盡管心裏是想說「不」的。試舉幾個例子：

有人向你借照像機，你心裏往往不願意，可口頭上不說「不」，而是編造一些藉口迴避掉「不」字。你或者說：「我的像機讓別人借去了，湊巧不在家」；或者說：「上次讓孩子弄壞了，還沒修好」；或者說：「明天剛好我也要，不然就借給你了」。結果，借者知難而退。本來，這件事也就完了，可是雙方在家裏還要互相攻擊一下。未借成相機的人會說：「不借就不借，幹嘛還編造那麼多藉口？」被借的人則說：「真不懂事，借人家的相機——這麼貴重的東西，怎麼開得出口？」

我曾問過外國朋友如何處理這種場面，他們告訴我：「或者借给对方，或者就會講得很抱歉，你可能不熟悉它的性能。」外國朋友說，他們有時也不直接拒絕，而是說：「我要考慮一下。」但一般較少編理由敷衍對方。外國朋友還告訴我，在美國不常發生借方和被借方之間的矛盾，因為知道什麼該向別人借，什麼不該向別人借，能夠掌握分寸。我們中國人，常掌握不了這個分寸，也沒有這種默契。

我們民族的一些缺陷，其他民族可能也有。但是，他人的缺點，絕不能構成維護自己相同缺點的理由。

別人向你有所求時，心裏不願而口頭說不出「不」，還容易理解；可是，有時在遇到別人的「好意」和「盛情」時，盡管心裏不想接受，却往往「盛情難却」，也說不出拒絕的話。一位華僑說，他回中國省親時，一位鄉下親戚在集上買了肉包子，用很髒的手巾包起來，送給他吃。他對那髒手巾實在感到可怕，一陣陣噁心。可是，他無法說那手巾太髒，只能說自己不餓。最後，在親戚的堅持之下，還是閉着眼睛吃了兩個，鬧得一下午不舒服。

虛偽還表現在不敢直接表達個人的慾望和要求上。



例如，去人家串門時碰上了用飯，主人會隨口說：「坐下吃點吧！」客人則答：「吃了，不餓。」其實，雙方都是假的：主人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並未真正給客人讓出位子；客人呢？他肚子很餓，但不好意思一進門就吃人家的，為了維護一下「尊嚴」，挨着餓也要嘴上硬。再如要求漲工資，西方公司的雇員一般都直接向老板提出來。中國人則是託人向老板「反映」、「講情」，或者勇敢一點，向老板哭窮，列出一大筆開銷，實際上是要求加薪，所幸的是，中國老板也能心領神會。

不敢面對現實，是我們中國人的另一個特點。記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的某期上，曾討論判斷「健康家庭」的標準。美國人認為，夫妻雙方能夠正確處理爭執，是「健康家庭」的最重要標準之一。如果讓中國人討論這個題目，一定會說，夫妻相敬如賓、互相體貼、從不吵嘴，才是模範家庭。區別在於，美國人正視夫妻常會發生爭執的現實，而中國人過分追求完美，不願或不面對夫妻必然會發生爭執的現實。

對於虛偽、愛面子，魯迅曾有過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可惜，讀他的書時，我還很小，很多涵義，今天才理解。魯迅曾舉過幾個生動的例子，令我至今不能忘懷。他說，如果濶小姐在大街上看到有人褲子突然掉下來，一定會用手立即捂住雙眼，以示「文明」。其實，她正在手指縫中津津有味地窺視呢！魯迅還指出，中國人家裏生了個胖兒子，過周歲時，鄰居

、親戚一定會恭維說，這小子有出息，將來做大官，長命百歲。小孩子的父母聽到恭維話，照例很高興。但是，如果有人說，這小子無論活多久都會死，一定會被主人趕出去。實際上後面這個人說的是實話，一定會兌現；前面的人說的是虛話、恭維話，難以兌現。可是，大多數人就是願聽這種話。

這些毛病，也充分體現在領袖人物及政治舞台上。老百姓有點虛偽、愛面子、兩面派，影響是局部的、小範圍的，權力架構上的人搞這些東西，就害國害民了。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就會犯過愛面子、打腫臉充胖子的虧，自己的老百姓吃不飽，還去「無私」地援助第三世界。林彪的兩面派，曾玩弄過毛澤東，還振振有詞曰：「政治上無誠實可言」，將「虛偽」加以政治理論化了。

國民黨也犯這個毛病。他們認為，「三通」是共產黨提出來的，國民黨絕不能接受，一定要保住這個面子。我和很多台灣老百姓接觸過，大多認為「三通」對台灣是有利的。反過來，如果國民黨先提出「三通」，喊得響響的，共產黨說不定也會拒絕。

二、知足、忍耐、奴性、順民

「知足者常樂」是中國人的哲學，「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很多人的座右銘。中國人的忍

耐是世界上出名的。「忍」字，就是把刀子攔在心上。在美國，只要有兩天喝不上牛奶，吃不上麪包，人們準要上街抗議。看看我們中國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數千萬人，仍沒有大規模的反抗事件。今天，農業政策放鬆了一些，農民生活有了好轉，一部份人更是心滿意足了。當前，香港人就是在忍，無可奈何地等着一九九七的到來。儘管香港人不滿意自己的命運被英國和北京兩方面決定，但是，在條約簽訂前，沒有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的群眾遊行，來顯示群眾的意願和力量，以便讓中英雙方尊重民意。相反，很多人在政治的壓力下左轉了，得了軟骨病，一味地討好北京領導人。

忍耐與容忍不同。容忍有包容、尊重對方的意思，有民主精神的元素。忍耐則是一種不滿情緒的自我壓抑，最終仍不容異己的存在。

奴性是心甘情願的被人欺壓，比忍耐更可悲。如「紅樓夢」裏的賈桂，他站慣了，別人叫他坐下都不習慣。由於長期生活在專制制度的高壓下，一部份人也習慣了「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不知道人可以改造屋簷，而不再繼續低頭。

某些對上級奴性十足、阿諛奉承的人，對下屬却盛氣凌人、擺官老爺作風，這是一種屬性的兩極表現形式。中國人民喜看包公戲、崇拜包公，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充滿着不公平的待遇，於是寄望明天可以出現青天、出現包公來拯救他們，而不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包公戲

在中國的流行，是與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奴性分不開的。

我們從小就唱「東方紅」，歌頌毛澤東是大救星。現在，一些人又在感謝「鄧青天」。這些，不是共產黨的創造，而是中國文化及中國民族性的必然產物。我真正認識到這一點，還是在發起中國之春運動之後。有一次我講演完，一位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握着我的手，熱淚盈眶地對我說：「王博士，你要救救我們啊！」我頓時感到，民主運動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專制制度，還有一個永遠等待救星的民族。而一個期待救星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

三、缺乏團隊精神

中國人「一盤散沙」、不團結、難合作的問題，人人都知道。有人說，三個中國人至少可以分成六派：甲和乙、甲和丙、乙和丙，還有甲、乙、丙個人。也有人開玩笑說，四個英國人可以組成政黨，四個日本人可以組成軍隊，四個美國人可以開辦公司，四個中國人則在一起打麻將，打來打去，鬧翻了事。

自投身中國民運以來，我深深體會，我們不少人，有九件事意見一致，一件事意見不合，就要分道揚鑣。反觀日本人，九件事意見不合，一件事意見一致，就可齊心合力辦成這件事。難怪許多人感慨：我們一個中國人應對一個日本人，可以取勝；三個中國人應對一個日本人，有可能失敗；如果三個中國人應對三個日本人，就必然失敗。這是為什麼？因為中國人在一起時，力量互相抵消，而不是互相加在一起。

民主運動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專制制度，還有一個永遠等待救星的民族。

四、不尊重他人隱私

我們出國留學前，都被告知：「到了外國，不要問女孩子的年齡，不要問人家的工資，因為這是人家的隱私，在外國要尊重隱私。」這種「出國前教育」，本身就說明國內不尊重他人隱私。

有的中國人就是愛當「警察」，一見面，就把你的家世問得清清楚楚，上至祖輩，下至兒女，外至社交，內至夫妻關係，都要了解一番。似乎是關心你，但事實上只是滿足他自己的好奇心。

有的人喜歡竊取別人的秘密，到別人家裏，乘主人不在，東翻翻，西翻翻。聽到朋友和第三者談話，總是想法偷聽上幾句。

在國內時，我們單位的一個朋友最津津樂道的故事，是他參加過的一次「捉姦」。那次，單位領導動員策劃，找了些可靠的「積極份子」。參與的人個個磨拳擦掌，恨不得一下子窺測到人家的「最高機密」。半夜裏，他們架起梯子，堵住窗口，一網成擒。任務完成後，領導嘉獎一番，大家還吃了頓慶功宴。這件事，在美國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在他們眼裏，「捉姦」本身就是侵犯了他人的隱私。

保護隱私，是美國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特點。在美國，如果警察私闖到某人家裏，發現了違法品，如毒品，是不能做為罪證的，因為警察取得罪證的手段本身是違法的——他侵犯了人家的隱私權。像這樣的概念，是應該介紹給中國人民。說到這裏，想起前幾年國內開庭審判貴州民運人士楊再行時，審判員當眾拿出的罪證，竟是別人給楊的信件！這些信未到楊手中就被公安局截獲了，如果有罪，是公安局先犯了罪。

五、對人不對事

中國人在談論政治時，常避開該人的政治觀點，專去揭人家的老底，然後，用這個人的「人品」，「擊敗」他的論點。加州論壇報採訪中國駐美大使章文晉時，問他對中國之春的看法。他一味的攻擊中國之春這些人過去是如何如何。好像這樣，就把中國之春駁倒了。章大使不敢面對中國之春的主張，也不想面對中國之春的主張。在美國人眼裏，就算一個人過去是個江湖大盜，他今天的正確主張還是要尊重。前年芝加哥選上的市長華盛頓，以前有過犯罪記錄，並受過法律制裁。但芝加哥市民還是選了他，因為他今天代表了選民的利益。選民們說，他過去雖然犯過罪，但已受到了應得的懲罰，沒有理由再為過去的錯誤永遠受罰。我們常看到兩個美國人昨天發生爭執，今

天又一起去喝酒了。這是因為他們對事不對人。昨天因為某件事發生了爭執，今天，那件事已經結束，就可以和好，沒有必要將事件和人總是扯在一起。一些中國人的爭執往往不是局限於某一特定的事情，而是吵來吵去，就罵起人家的人品來了，甚至罵起人家的祖宗來了。因此，中國人一爭執，很容情就傷感情，建立仇恨。一位朋友曾向我說：「你為別人做十件好事，別人也記不住你；但如果你做過一件損傷了別人的事，別人會記你一輩子。」不能「對事不對人」，就容易記仇，產生報復心理，而「有仇不報非君子」，就成了中國人的名言。

六、不鼓勵強者

嫉妬心本來不是完全有害的，但是中國人的嫉妬具有特殊的毀滅力。這種嫉妬的特點是，發現強者時，不是設法趕上別人，而是設法去破壞別人，將別人與己拉平。

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批判個人英雄主義」、「不要出風頭」，因為這些是「資產階級」的東西。長大後，聽老人家講，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類似的格言。比如，「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樹大招風」、「人怕出名豬怕肥」等等，都是阻止人們去做強者。在評論幹部時，有很多人認為「藏鋒匿露」式的幹部是好的，而「鋒芒畢露」者，往往遭到淘汰。

中國人的嫉妬具有特殊的毀滅力。這種嫉妬的特點是，發現強者時，不是設法趕上別人，而是設法去破壞別人，將別人與己拉平。

七、胆小怕事、明哲保身

從小讀歷史，我們被告知：「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我們從來也是以此為榮的。可是，多年的經歷使我感嘆：個別中國人是勇敢的，整個中華民族並不勇敢。

林希翎曾深有體會地說，五七年整風運動初期，她被群眾歡呼為英雄。後來，她挨了批，沒幾個人敢為她說話，反而落井下石者不少。我們中國之春求過不少人幫忙，得到的答覆常是「你們的事業我支持，但我不能具體幫助什麼，因我和大陸和台灣還有聯繫。」這種狀況還情有可原，可是，有些識時務的俊傑，竟然昧着良心吹捧共產黨的錯誤政策。難怪有人說：「怕共產黨就保持沉默好了，用不着去拍嘛！」

八、不守法

我在西方生活了一段時間，覺得西方人做什麼都有一個章法、一個規矩。

中國人自古有訓：「沒有規矩，成不了方圓。」可見中國人了解規矩的重要性。那麼，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不守規矩、沒有法治觀念呢？其原因很多，我體會較深的有兩點：一是我們的「法」、我們的規矩不完全；二是訂了法不遵守，使法律喪失了尊嚴。當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的文化中強調禮治、強調泛道德觀，缺少法治觀念。

從寫信這件小事談起吧。中國民聯每週都接到大批世界各地的來信，這些信大部份是中

文的。從信封到信紙，參差不齊，長短不一，有的甚至寫在影印紙或電腦紙背後，折疊的方式多種多樣，郵票貼得到處都是。為什麼會這樣？我想除了節省之外，主要是中國人還未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統一的寫信規矩。我們收到的外文來信，大都規規矩矩，一紙三疊，易讀易存。

剛開始用外國人規矩回信時，也曾覺得外國人的這一套死板，認為「老外」很笨，總想，為什麼要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地址都打在信紙上呢，這不是麻煩嗎？時間久了，才知道這個規矩有其科學性。每次我拆信時總怕把信封及信紙放錯或把信封遺失，萬一這樣的意外發生，就無法回信。而我寫給朋友的信件復本上若是寫上對方的地址，不但存放時方便，找起來也省時。每次寫信雖麻煩一點，但方便了以後的工作，從整體上節省了時間。

既便有了現成的法，甚至是自己制訂的法，中國人也沒有遵守的習慣，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亦不例外。去年十二月，候寶林來紐約說相聲，我們也去聽了。節目開始後，後面觀眾一看二十五元一張票的前排座位空缺甚多，便大規模地向前移位，顯得浩浩蕩蕩。這種場面是我在外國人的場合裡從未見過的，因為在外國對號入座是「法」，大多數人都遵守。

總之，中國人不守法、取巧的小聰明特別多，但缺少大智慧。美國人辦事「死心眼」，集合起來，却成了大智慧。

至於國內領導人執法違法，無視憲法的事就更多了，鄧小平一聲令下，要從嚴、從快、從重打擊犯罪份子，原來的刑法便成了一紙空文。

我們中國人，從老百姓到領導人，都缺少法治觀念，這是民主不能生根的原因之一。

中國傳統文化的若干特點

一、成長的教育

中國人有一套教育人、評定人的標準，這個標準，從一個人的生到他的死，是一致的。幼兒時，我們教他要「乖」。人家誇你的小孩，也說：「這孩子好乖！」乖，無非就是順服。

上小學了，家長教兒女要聽話，要守紀律。上中學了，父母開始向兒女灌輸「孝順」的觀念。別人也起用「孝順」、「孝敬」稱讚你的小孩。

上大學之後，領導便強化「組織觀念」的教育，即要求大家靠攏和參加共青團和共產黨（此教育開始於中學，強化於大學）。據說，解放前（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青春期教育，則重在「仁義」，也是教你恪守現成的社會規範。成年後，則特別強調「忠」，以前是忠於君主，文革時是忠於毛澤東，現在是忠於黨。這一套教育及評定標準，效果有二：一是維持既成秩序，二是抑制個體的發展。看一下中國人的成長過程，也是蠻有意思的。

人一生下來，就被摟在媽媽的懷裡，還有受寵於父親，被父親摟着睡覺。西方的習慣截然不同，小孩子一生下來，就被單獨放在一個房間裡過夜，培養獨立性。

孩子剛懂事，母親就會對他們展開教育：

「你是娘身上的一塊肉。」「你們是媽媽的兩個手指頭，咬哪個都痛。」這種教育，反映了父母將孩子視為私有財產的心理。在西方國家，父母與子女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們認為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父母有撫養兒子的義務，但不擁有他們。

到了十幾歲時，接受的格言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確，我們有些家庭中，孩子到了十幾歲，甚至廿來歲，穿什麼樣的衣服鞋子，還由父母管。

在共產黨領導下，個人的自主程度降至最低點。「把一生交給黨安排」、「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做一顆永不生鏽的革命螺絲釘」，這些口號，是從小就被灌輸的。樹立雷鋒式的樣板，就是為了讓你聽話。

雷鋒最喜歡的一首詩是「唱支山歌給黨聽」，開頭兩句為：「唱支山歌給母親，我把黨來比母親」。大陸還風行過「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曲。這種把黨、把領袖當成長輩的「母胎化」傾向，和自古以來把官叫做「父母官」的文化傳統，是完全吻合的。這似乎表明，中國人永遠長不大，個體永遠成熟不起來。

由於上述傳統，中國人一般不相信個人是能夠獨立的。比如，中國之春宣佈創刊時，一些人還沒研究她的觀點，就發出疑問：「中國之春的後台是誰？是中共的某一派？是台灣國民黨？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是某個大財團？」在他們眼裡，中國之春不可能獨立講話，而是後面有個人人在指使她講話。有這種判斷并不稀奇，因為，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個人是不能獨立的。做這種判斷的人，可能從來沒有獨立發言的習慣，并以此推斷別人。



中國人從小到大一直被牽着走。

二、限制、消滅個體的文化

我認為，Individualism 這個字，翻成個人主義不大妥當，應翻成個體主義，以和群體主義或集體主義一詞相對應。

在中國大陸，個體主義一直被認為是最壞的東西，一直與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從我記事起，就一直批判資產階級個人（體）主義，批判個人英雄主義，批判風頭主義。我們還被恐嚇道：「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

所以，我覺得，在以前，中國文化傳統中忽視個體主義，只是一個不自覺的傾向，一個

潛移默化的過程。到了共產黨掌權時期，情況轉變為利用政權力量限制個體發展，把中國文化中僅存的一點點個體主義也消滅乾淨了。的確，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壓抑個體的。從孔子的「克己復禮」，到後來的「存天理、滅私慾」，到毛澤東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其主線是壓抑和消滅個體。共產黨消滅個體的口號花樣很多，如「破私立公」、「大公無私」、「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和「奪頭腦中私字的權」等等。

三、人的物化傾向

中國話把人稱為「人物」——人與物的結合，如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典型人物和「三開」人物等。將有生命的人與無生命的物結合起來，這大概是樸素唯物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再加擴大，便成了「天人合一」觀念。

中國話有時還直接把人稱為「東西」，如老東西、壞東西，罵人時甚至說：「這人真不是東西」，其實，人本來就不是「東西」。

在稱讚人時，則用棟樑之材、中流砥柱等辭語，都是將人加以「物化」。用物體形容人行為的例子也很多，如「像臘燭一樣，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共產黨把人的物化傾向提升到赤裸裸的程度，公開號召人們「做黨的馴服工具」、「做革命事業的螺絲釘，黨把你擰到哪裡，就在哪裡發光」。

將人物化，是中國文化中缺乏人權觀念的一種反映。從上面的幾個例子還可以看出，共產黨具有提升中國文化中某些缺陷的特殊能力，它把馬列主義中與中國傳統文化吻合的因素大大強化了。

羣體主義——中國文化的主流

一、傳統文化的核心——仁

如果用最簡練的語言概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那便是「仁」。

何為「仁」？歷代儒家各有其解。

許重叔在「說文解字」中云：「仁親也，從人二」，意即「仁」為二人、多人之意，講求人與人親善。

孔子對「仁」的解釋很多。他對顏淵講：「克己復禮為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外，「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漢儒董仲舒說：「仁之為言人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

宋儒程伊川對「仁」的說明是：「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就是說，仁近似天下為公，但公又不能完全涵蓋仁。與程伊川齊名的程明道把「仁」定義得更寬廣，他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大概是「仁」即為「天理」的意思。「仁」的進一步發展，便是「存天理、滅私慾。」

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儒家學說的精髓「仁」，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二個內涵。其一，強調二人及多人間的互愛關係，即以公字為體現的羣體主義；其二，抑制個體，後來發展到抹煞個體。



中國大兵團作戰——羣體主義的表現？這是深圳友誼餐館服務員集體擦玻璃。——本刊記者攝

二、儒道互補

中國傳統文化結構有一個特點，即「儒道互補」，儒家為主，道家為輔，形成名對立、

實統一的超穩定體。在這超穩定體中，知識份子得意為儒（做官），失意從道（隱退）。儒道皆榮，絲毫沒有反抗之意，一反抗，便「大逆不道」。

儒家的貴賤有序、三綱五常，基調是尊重傳統和維護現有秩序，在其著作中，找不到造反、革新的詞句。按着傳統，儒生得意了，可以做官，成為維護現有秩序的一員；失意了，隱退山林，修身養性，不再過問現實。這兩者，都是穩定現存秩序所須的，缺一不可。儒道之間，沒有改革現實的餘地。

上述傳統一直延續至今。我們看到，不知有多少知識份子，在受盡共產黨極權專制的迫害之後，都直言不再過問政治。孰不知，這種「隱退山林」的道家作法，正是專制制度得以持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儒權互利

數千年來，從孔子開始，知識份子都想按着自己的世界觀改造當政者，勸當政者實施仁政，愛民如子，這種理想可稱為「政治儒家化」。但是，可悲的結果却是，知識份子反被當政者利用和改造，即造成「儒家政治化」的局面。

知識份子得意為儒（做官），失意從道（隱退）。儒道皆榮。

爲何出現這一局面，衆說紛紛。我的見解是：(一)儒家尊重傳統及維護現有秩序的精神，符合當政者的既得利益；故爲當政者歡迎；(二)知識份子也是人，其人性的某些弱點在專制制度下充分發揮，使他們樂於依附當權者，并認爲依附當權者才能施展其救世的抱負。

儒權互相利用、互相獲利，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官方利用權力推廣儒學，儒生研究學問爲了做官……這一教訓，特別值得那些準備進入共產黨內部進行改革的民主派們警惕。

四、重視宏觀與群體 輕視微觀與個體

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重要特點是重視宏觀、重視綜合，但輕視微觀、輕視分析。這是與重視群體、輕視個體一脈相承的。

中醫理論系統非常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中醫的營衛氣血理論及臟腑學說，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整體性，給人無所不包、無懈可擊之感。這種大一統的理論，竟然維繫了幾千年。中醫不重視解剖學——一門分析的科學，故使其停滯不前。至今，中醫還視數千年前的「黃帝內經」爲其最高準繩的教科書，爲中醫學生所必讀。這和西方醫學教科書幾年一換的情況形成了多麼鮮明的對照！在政治領域內，中國政治家崇尚「半部論語治天下」，這與中醫崇尚「黃帝內經」包治百病又何其相似乃爾！

中國傳統文化及民族性中輕視個體、重視群體的特點幾乎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表一僅是列出幾項而已。

表一、東西方文化、民族性若干表現比較

項 目	中 華 民 族	西 方 民 族
姓名排列	首先爲祖宗姓氏（例如王），然後爲輩份稱呼（例如炳），最後爲自己名字（例如章）。	首先爲自己的名字（James），然後爲父名（Frank），最後爲族姓（Hart）。
地址順序	從國到省市，到縣區，到村莊、街道，最後爲門牌號。	從門牌號到街道，到縣區，到省市，最後爲國名。
時間表達	順序爲年、月、日。	順序爲日、月、年。
語言的某些結構	(1)形容詞放在修飾詞的前面。 (2)主、謂、賓、補有序化。	(1)形容詞及修飾語常放在後面。 (2)倒裝句、被動句爲其特點。
文字結構	整體象形文字。	個體字母組成拼音文字。
飲食習慣	菜放中間，大家合吃，互相關照。	每人一份，互不干涉。
倫理觀	(1)天下、國家爲重，民族爲重，鄉里爲重，家庭爲重。樹高千丈，落葉歸根。 (2)追求盡善盡美，聖人完人。	(1)個人爲重，四海爲家。 (2)一得之見，廣爲交流。
做學問的態度	多想創建一整套救世、救國、救民的大道理。	以鑽研某一特定小課題爲興趣。
意識形態	大一統，提倡萬世不變的學說及主義。	多元化各種學說並存。
道德規範	天下爲公；存天理，滅私慾。	尊重個體及他人隱私。
政 權	中央集權下的金字塔式結構。	分權。
文化主流	群體主義。	個體主義。

▲此表參考劉吉著「民族性格：一個可供思索的因素」一文附表製成。該文刊載於「科學傳統與文化」，陝西科技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五、大一統與排它性

孔子原始的儒家學說是否具有排它性，意見尚不統一。但毋庸置疑的是，儒家學說發展至漢朝董仲舒階段，成了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時，被賦予了很強的排它性。董仲舒公開宣稱：「廢黜百家，獨尊儒術。」

從古代帝王至國民黨執政，再到共產黨奪權，都提倡大一統的意識形態：或儒家學說，或三民主義，或馬列主義。尤其到了近代，在社會發展面前，官方只能說發展三民主義、豐富馬列主義，從來不敢接納別的新學說，讓新學說與官方欽定的「主義」有平等競爭的機會。他們似乎不知道，世界上最富足國家的人民，並不曉得什麼是三民主義，也並沒有生活在馬列主義之下。

綜上所述，我認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是群體主義意識，後來發展到極端形式，便抹煞了個體主義，抹煞了個體的價值，甚至抹煞了個體的存在。為什麼東方發展出群體主義文化，學術界還在探討。有人認為，可能與小農經濟下，人們需要集體抗災、集體興修水利、全家合力耕作等群體主義觀念有關。

傳統文化與民族性的關係

到底是傳統文化培養了民族性，還是民族性創造了傳統文化？這恐怕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先後順序及決定關係難以斷定，但互相關聯、互相促進，是毫無疑問的。

我一開始時所列舉的一些民族性的缺點，與傳統文化有什麼聯繫呢？下面，我嘗試着解釋一下，不一定貼切。

醫學知識告訴我們，人體的一切機能都是爲了兩個目的：（一）維護個體的存在和發展；（二）繁殖後代，延續種族。人不可能沒有私而存在。在某種意義上講，人們對群體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需求，也是爲了增強個人的安全感、提高個體生存的能力。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後來，竟然一味強調群體主義，視「私」爲醜，視「私」爲惡。在人們沒「私」不可能生存的情況下，自然要用口頭的「公」、表面的「

公」，掩蓋其必須的、但又不被接受的「私」，這就產生了虛偽、兩面派的行爲。群體主義強調過了頭，在有約束力的場合，個性、私心受到過份壓抑，於是，它們便會盡量利用其它無約束力的場合用反彈的形式發洩出來，這就是爲什麼有時中國人表現得比西方人還要自私的原因。

在以消滅個體爲前提的群體主義文化的包圍下，人人都用最大的可能保護脆弱的自我個體，防犯別人，生怕自己的個體受到傷害。這種狀況極易產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忌心理。

虛偽、在無約束條件下的自私反彈及猜忌心理等，都是破壞團隊精神的大敵。簡言之，中國人難以合作，就是極端群體主義文化下個性的過份反彈所致。

中國人在家庭中對父母的依賴，在社會上對朋友和官長的依賴，導致了個體的發育不全，好像永遠長不大一樣。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所列舉的中國文化的「口腔化」傾向，也是旨在說明中國人的個體發育始終停留在幼稚階段。我們平時總是指責別人「不懂事」，就是說人家幼稚，其實，這次你指責別人「不懂事」，下次人家也認爲你「不懂事」。因此，應該說，整個中華民族是幼稚的，人家的社會已進入到民權階段，我們還被君權、黨權的思想束縛着。

由於我們傳統文化一直是壓抑個體的，消滅強者的「槍打出頭鳥」政策，也就不難理解了。中國人喜歡挖別人隱私的習慣，對人不對事的態度，都是文化傳統中抹煞個體價值的表象。奴性的養成，除了三綱五常的等級教育之外，個體發育不全而導致過份依賴，顯然也是重要的原因。



這是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內堂。儒學在漢朝後被定為一尊。

馬列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

馬列主義爲什麼能在中國傳播？這個問題始終像謎一樣吸引了很多人去探討。乍看起來，中國大一統、排它性的傳統竟然接納了舶來品——馬列主義，簡直不可思議，但仔細想一下就會發現，馬列主義中有很多和中國傳統文化相吻合的因素，中國所接受的，大概就是這些因素，而非全套的馬列主義。

比如，馬克思鼓吹消滅私有觀念、建立公有制，主張「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強調人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等論述，實質上是一種抑制個體的群體主義意識，與中國傳統的「存天理、滅私慾」、「天下爲公」，是不謀而合的。

列寧的組黨理論：無產階級——最先進的階級、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領袖——共產黨中的傑出者，與中國傳統的「上智下愚」觀念及士大夫——貴族——皇族的等級觀念，有類似之處。

列寧及斯大林給共產黨訂的紀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與中國傳統的三綱：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有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爲了穩定上層的權力。

至於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藍圖，在禮運大同篇中似乎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大一統及排它性傾向，又適合了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需要：拆下了儒家的招牌，必須立即換上一個功能類似的招牌。

總之，馬列主義的某些成份與中國傳統文化確有它的一拍即合之處。

民族性、傳統文化與 專制制度的關係

一、相互作用、惡性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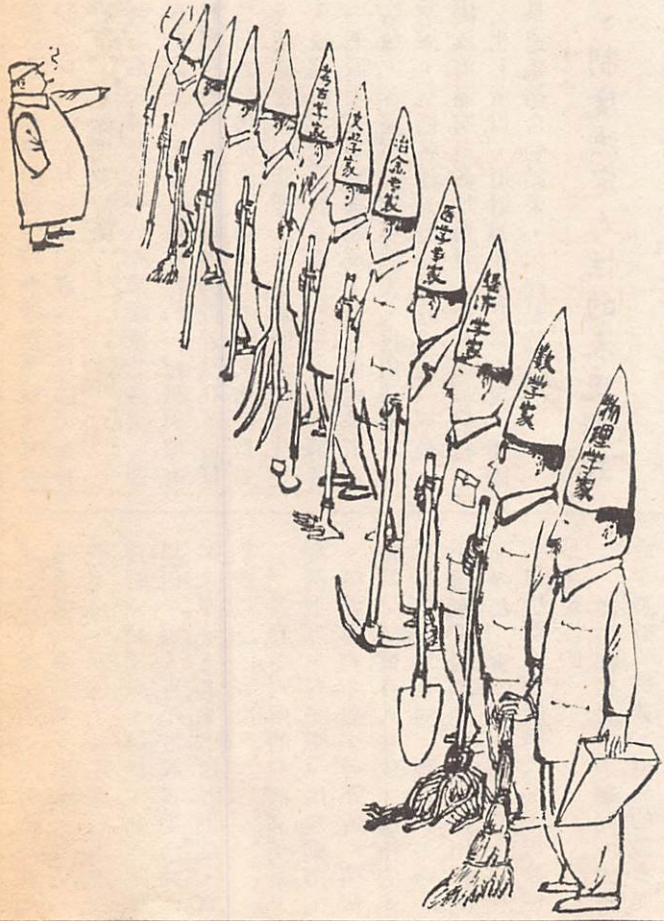
中國的官僚專制制度持續了數千年，至今仍壓在中國人的頭上。是我們傳統文化及民族性培育了專制制度呢？還是專制制度締造了傳統文化和特有的民族性呢？這恐怕又是一個雞和蛋的問題。

一些學者認爲，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一統觀念、維護傳統秩序的精神、缺乏法治的禮治及泛道德論、以過份壓抑、甚至消滅個體爲前提的群體主義主流，都是促成超穩定性專制制度的因素。

也有人認爲，專制制度本身阻礙了文化的發展及多元趨向，也敗壞了我們的民族性。我是相信它們是相互促進的。傳統文化、民族性、專制制度，三者間相互促進，形成惡性循環。

下面，我想就專制制度阻抑文化發展及敗壞民族性的問題，談一下個人感受，我想，凡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都有相似的感受。

共產黨繼承的大一統專制制度，對不合己願的西方文化的排斥性是空前的。黨的領導把



共產黨將專制制度提到最高峰，把知識份子統打成牛鬼蛇神，而且株連九族。

西方的當代學說，輕率地冠以「資產階級思潮」的帽子，不用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沙特的存在主義，連歐洲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新成果，也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而阻止進入。對於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傳入，則斥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這種狀況，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當代文化的發展。那些傳播當代思想的知識份子，百分之百地受到批判，甚至折磨至死。最近，情況改善不少，但專制的大棒仍在那些被當政者認為是「異端」的知識份子頭上飛來舞去，連給當前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的王若水等人，還在繼續受到壓抑。

專制主義者不但排斥外來文化，連傳統文化中不合自己口味的東西也排斥。毛澤東批判水滸，就是一例。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專制制度并不完全拒絕外國的東西進入中國，像阿爾巴尼亞的霍查著作，就曾大量輸入，當然，現在又把這些書從書店中清除了。馬、恩、列、斯著作（純粹是外國貨）的引進，又是專制主義者主動介紹外國思潮的例子，他們會爭辯說：「怎麼能說我們排外呢？」

二、過篩系統·近親結合

為解釋上述矛盾的現象，我把專制制度比喻成一個「篩子」，一個過篩系統。一切古今

中外的文化，都必須經過這個過篩系統，凡合於專制本身口味，并能加強專制自身的，都被允許放行，其餘則被篩除。

過篩系統導致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即過篩後的文化，都是相當純淨的，都是與原有文化有親合力的，都是專制的近親文化。這樣，在長期的文化世代延續中，中國文化總是處於「近親結合」的狀態，而近親的後代往往是先天缺陷的、衰弱的。這或許是近代中國積弱的一個原因。美國則相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大熔爐，各種文化都可進入，自由傳播，由人民選擇，包括各種其他國家認為的「邪教」。美國政府還有計劃地撥款，使各民族發揚自己的文化。所以，用遺傳學的語言來說，美國文化是遠親結合的結果，因此是強壯的。

三、制度決定人性的表現形式

雖然中國人忍耐、順從的民族性應對專制制度的穩定存在負有責任，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專制制度也敗壞了我們的民族性。

記得共產黨建國初期，曾搞過一次「忠誠老實」運動，叫大家把過去的醜事、錯事統統向黨組織交待，并許諾：只要交待清楚，一定既往不咎；如果不交待而被組織查出來，則從嚴處理。運動開始後，很多人都主動交待，以

求放下包袱，有的老幹部連在延安時偷別人一塊手錶的事都講了出來。可是，這些材料裝入檔案後，就成了共產黨整人的把柄，以後一有運動便抖出來。這樣，共產黨便失掉了信用。以後，別人再不敢誠實地向共產黨講真話了。共產黨建立起來的這種制度，實際上是鼓勵人們說假話的制度。

最容易理解的一個例子是，共產黨以前的經濟制度，竟把中華民族勤勞的民族性消滅了。絕對平均主義，幹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使很多人養成了懶惰的習慣，這種習慣甚至帶到了外國。現在，美國的華人餐館甚至不願意雇用剛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農村經濟改革後，實行了包產到戶，農民又勤勞起來了。這說明，制度對人性、民族性的影響，有時是決定性的。

從小就在課本上學到，中華民族是一個勇敢、勤勞的民族。但我的體會是，中華民族既不勇敢，又不勤勞。剛才說過，勤勞被共產黨的經濟制度消滅了（現在正在恢復），勇氣呢？則被專制的懲罰制度吞噬了。現在，我們中華民族變成了最怯懦的民族之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制度的問題。共產黨過去的政策是，一人出「問題」，則株連妻子兒女，甚至株連親戚朋友。在這種制度下，還會有什麼勇氣呢？就算你個人有勇氣，也不忍心看到旁人因自己的勇氣而受到連累。很多人秘密地支持中國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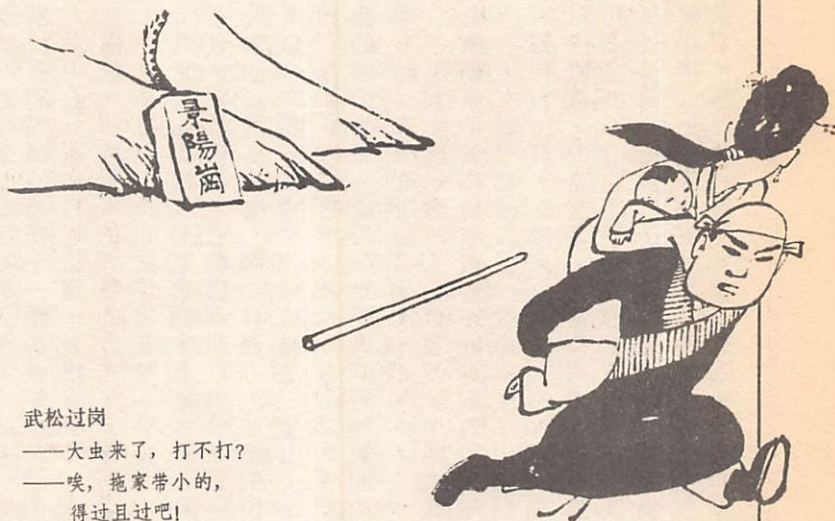
我把專制制度比喻成一個「篩子」，一個過篩系統。一切古今中外文化，都必須經過這個過篩系統，凡合於專制本身口味，並能加強專制自身的，都被允許放行，其餘則被篩除。

聯而不願公開，就是因為他們怕國內的家人受牽連。所以有人說，共產黨是最會利用人的弱點而加強專制的統治者。

再如高考制度，對人性的影響也是十分顯著的。四人幫時代，吹捧白卷英雄，上大學不憑成績，只憑群眾推薦（形式）加後門（實質）。在這種制度下，勤奮讀書的人是不多的。恢復按分數錄取的高考制度後，情況驟然改觀，中學生學習的勁頭大多了。

還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可以說明制度對人性和民族性的作用。前幾年，紐約有一次大停電。全城一片漆黑。在「黑暗」制度下，相當多的人一下子變成了強盜，大家都搶起東西來。因為，你的財產和店舖裡的東西一旦被人搶走，你也起了當強盜的心，否則，不去搶別家店的東西，你就無法生活下去。可是，停電結束，全城恢復光明之後，搶劫現象立即停止了。這說明，很多人有做小人和君子的兩重性，在黑暗制度下，小人面表現了出來；在光明制度下，小人面受到壓抑，而表現出來的是君子面。為什麼要建立民主制度，原因之一，就是抑制人的獨裁性。人人都具有獨裁的傾向，都願意別人聽自己的；人人也都有妥協、包容的一面，否則無法立足於社會。建立民主制度，就是抑制前者、發揚後者。

我認為，人性是複雜的、是多重的。人類尋求建立合理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把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提升起來，而把醜惡的一面最大限度地壓抑下去。在這方面，截至目前，民主制度還是最成功的一個。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性的表現形式，久而久之，還可以改造人性和民族性。剛才提到，中國大陸的人剛到西方比較懶惰，但經過二、三年，競爭制度就使他變得較勤奮了。



武松過崗

——大虫來了，打不打？
——唉，拖家帶小的，
得過且過吧！

打破惡性循環

囉囉嗦嗦講了一堆，有人要問，我們中國該怎麼辦呢？答案當然應該由大家共同尋找。我個人之見是，一定要設法打破傳統文化——民族性——專制制度間的惡性循環。打破惡性循環，可以從任何一個環節着手，不見得規定工作的先後，如「先改造文化，才能建立民主制度」，或「先建立民主制度，才能改變民族

性」等論點，都各有道理，各人應根據自己的所長，進行選擇。民主運動的政治色彩濃一些，自然會強調改變制度的重要性，但我認為，文化運動具有至少相同的重要地位。在當前，有幾項實際的工作值得特別提倡：

第一，反省的工作，要敢於揭露、面對我們傳統文化、民族性及制度的缺陷面，不要「護短」，不要怕否定了我們自己的長處，長處是否定不了的；

第二，要批判「大一統」及「排它性」意識，要利用一切機會給西方個體主義文化在中國傳播創造條件。我們不是否定群體主義，這是值得繼承的，西方在積極介紹和引進東方文化，他們需要群體主義。但是，我們反對以消滅個體為前提的群體主義，反對排它性的群體主義。我們要求中國當局允許個體主義文化的引進，給它一個空間，讓它發展一下，與群體主義競爭一番。現在，中國青年學者做了很多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工作，這是有深遠意義的；

第三，推動經濟領域的多元趨向；

第四，壯大民主運動的力量；

第五，推動國內的立法工作。

談到這裡，我想起了日本成功的例子。日本為什麼成功？說法不一，依我之見，有一點必須肯定，那就是日本文化沒有排它性，它首先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群體主義（卻沒有將它推到極端的程度），十九世紀之後，日本又吸收了西方的個體主義文化，兩種文化并存。日本是否兼容並蓄了東西文化的長處而變為第一流強國呢？這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

我樂觀地預言，如果中華民族繼承了自己傳統文化的合理內涵，又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華，中國是有希望的。

中國政治轉型

的困難所在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李 椿

出國進修已近兩年，對中國的社會改革有不少新的認識，現簡述如下。

一、中國哲學思想是

中國政治轉型的一個障礙

衆所週知，西方民主社會的哲學思想發展與東方(中國)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從古希臘哲學思想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近代的英法，哲學家培根、羅克、荷布、米勒、孟德斯鳩爾和美國的湯姆士、傑佛遜等都是強調以人爲中心，服從自然法律，去建立社會，去創造國家，用啟發人的智慧的方式，去創造未來，尤其是羅克、荷布兩位思想家，早在十七、十八世紀就提出人類社會國家應該按照自然法(包括宗教信仰，道德倫理和社會公正法)和民衆的意願來建立。而今日西方，北美的民主社會也是根據法國思想家盧梭的三權分立的思想和理論而建立起來。因此，今日西方美國社會的繁榮昌盛，政府穩定是與其哲學思想的發展，民主政治的形成不可分割的。

反觀中國社會，人們會發現，中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的哲學倫理對於中國專制政體，統治方法的獨特的性質。舉例來說，儒家的哲理一貫以封建禮教，中庸之道，來禁錮約束人的行爲。孔子提出「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以及「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等。儒家哲學倫理使中國人形成了樂天知命，不辨是非，敬畏官僚，甘爲奴隸的習性。也正是這種東方哲學思

想的獨特性，給歷代的中國統治者樹立了治理國家的政治哲學理論，爲社會規範了行爲道德標準。因此，中國的政治民主改革的速度不僅依賴於目前中國改革派的開放政策改革。而且還有待中國改革派對西歐民主政體，哲學理論的理解和吸收。一些西方現代社會學家曾說過：「一個社會的改變不僅依賴其文化技術的基礎，而且還有待於這個特定的社會對其他社會的文化(包括政治、哲學、經濟、倫理價值觀點)的態度；是排斥，抑或吸收等等。」

二、中國長期的文化專制

形成了政治轉型的困難

自從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後，完全採納的是馬列主義，甚至還把馬列主義寫入國家憲法，奉爲國教。這樣，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爲唯一正確的思想理論，而排斥一切西方非馬列主義的哲學思想，從一年多前的排斥改革派，和清除資本主義精神污染，都是不斷地強迫人們去學習和接納馬列主義。尤其是十月份某日的人民日報強調，要求大專院校學生努力學習馬列主義，不准對馬列主義提出質疑。反觀美國，由於學術上的研究是絕對自由的，因此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十分普遍深入，研究的學者也不計其數。如果中共能把西方的哲學思想搬入教室加以比較學習，也會有助於中國政治的改革。遺憾的是，中國共產黨已習慣了文化專制，從而把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當作最正確、最科學的哲學理論。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文

化專制的趨向。衆所周知，馬列主義唯物辯證法是哲學中一個流派，即使它被中國認為是唯一正確的理论，但它並非科學，無助於科技的發展和民生的改善。沒有一種固有的主義學說會是永恆正確的。堅持此說者，只證明其思想已僵化，或爲了鞏固其已得利益的死硬派作用。近百年來，人類的科學文化發展日新月異，新的理論學說層出不窮，人類對世界的探索永遠不會停留在一個階段上。用專制手段來治國是一定不會成功的。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可爲鐵證。如果中國想要徹底改革，應該實行「真正」的「百家爭鳴」，應觀摩和學習外國先進國家的法治精神，廣爲介紹及翻譯外國教科書及有關文獻，才可收到實效。

三、社會傳統習慣的困難

在中國，其文化思想、傳統習慣與很多鄰近國家不同。因此，用政治學的說法，中國在現代化中，並沒有認同的問題。相對的，認同危機却明顯呈現在東南亞許多開發中的政治體系。

其次，中國在面臨西方挑戰、政府權威逐漸喪失時，一般中國人並不像其他國家人民對政府權威採取疏離、嘲諷的態度，動輒以罷工、示威等方式來表達其不滿。相反的是希望加強政府的權威。中國人民將政府視爲「父親」，內心迫切希望有位強而有力的「父親」來領導，幫助「子民」渡過難關。反觀，歐美民主社會人民對政府的態度剛好相反，希望政府下台，更新領導者。在這之中，政府中的反對黨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因爲反對黨可以起到監督

統治者一直宣傳他們的統治是一片慈雲，可老百姓何時享受過「一片慈雲」？



的作用。而在中國，反對黨不允許存在。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人民不斷期望出現一位權威、有力的領袖，成爲政治體系的主導力量。若一旦更易領袖，人民就會感到無所適從，這造成了中國近代政治始終跟着政治領袖打轉。然而，政治領袖並不一定能克服現代化的問題，因而人民產生不滿，對現存的政府生了懷疑。目前，中國大陸仍然面臨權威危機的困境。目前不少人對鄧小平路線抱希望，是因爲對「

文革」時期造成的混亂後，期望能建立比較穩定的局面，但是，人們應該和了解，中國的經濟問題並不能單憑幾位領導階層的變更而有奇蹟式的變化。而是靠民衆的努力。

四、對外來批評的抗拒心態

另外，由於中國過去近百年受西方列強的侵犯，形成了對外人的抗拒的心理。因此，中國在外交事務中，有相當強的自我防衛心理，對外人的批評建議均有排斥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會發現，中國人似乎很不願意面對批評，縱使是善意的建議都相當排斥。這種心態將使中國無法真正面對自己的問題，從事徹底改革。毫無疑問，這也會形成中國政治轉型的障礙，這也是中國改革派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

的確，中國走向民主還要有一段漫長艱苦的道路。可是，反觀日本，情況就很不同，日本形成民主政治有一定優先的條件，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是個封建國家，換言之，類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發展民主政治有相似的社會基礎。相對的，中國很早就形成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有相當集中的政治權力結構，也造成了中國人有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這似乎有利於建立權威政治，却可能不利於多元民主政治。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縱觀東南亞國家，新加坡、台灣等都是中國人爲主的社會，而且近年來已逐漸朝向開放的、多元的民主政治發展，並且成果輝煌。因此，筆者相信，如果中國認真學習先進民主國家的治理國家的經驗，堅持好的，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絕對可以走向民主之路。

文化背景與科學技術結構

的演變

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上)

(國內) 金觀濤、樊洪業、劉青峯

本文的作者簡介如下：

金觀濤：男，一九七〇年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副研究員、大型「未來叢書」副總編輯。

樊洪業：男，一九六五年吉林大學化學系畢業，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副研究員。

劉青峯：女，一九六九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編輯。

編者按

本刊十七期曾刊出金觀濤、劉青峯二人的力作：『歷史的沉思』，引起各界的矚目。本期，我們再發表金觀濤等人的另一篇探討中國近代科學落後原因的論文。金文的兩個觀點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作者認為，以儒道互補為特點的中國文化背景，以及以這種文化為背景的大一統、封閉式政治形態，阻礙了中國科學的發展；

第二，作者論斷：「近代科學結構必須有與其相應的社會結構。」否則，近代科學結構即使在外形上形成沖擊，如社會形態本身不發生改變，也不可能發揮作用。

今天，在鄧小平倡導新洋務運動，大力引進西方先進科技而不主張社會的變革的形勢下，金觀濤等人撰寫該文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金文的技巧在於，它用探討歷史的手法，來觸及當今敏感的問題，這是在言論不自由的國度裏特有的現象。

可惜的是，金觀濤等人的這篇文章，並未引起北京當局及國內輿論界的足夠注意，可能是其學術性太强了。該文有一句話說：「最可怕的是社會對它不感興趣。」中國之春發表金文的目的，就是為了擊破「社會對它不感興趣」的局面。鑒于當前北京政府對中國之春的特殊態度，文章

在中國之春上一登，意義便會不同。這也許是「否定性放大原理」吧！

需要一提的是，金觀濤等人與北京之春和中國之春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都屬於中國的年輕一代。金文體現了這一代人的自覺反省精神。徹底的反省，是建立新制度的起點。

最後，我們應該聲明，本刊刊載金文，與原作者無關，請北京當局注意此點。中國之春常轉載國內的作品，包括趙紫陽總理的文章與鄧小平主任的講話等。

由于金文較長，本刊分兩期刊完。金文的副題「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為本刊編輯所加。

一、問題的提出

人們對科學技術史研究的興趣，往往是由科學技術史本身向人們提出的嚴肅而富有挑戰性的問題引起的。今天，任何稍具有科學史常識而又不帶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歷史上長達千餘年的時期內，中國科學技術曾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並對整個人類文明作出了許多有決定性影響的貢獻；但在近三、四百年中，西方科學技術飛速發展，遠遠超過了中國。這個歷史事實迫使人們要思考：近代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就曾明確指出，無論是在以前的千餘年，還是近五百年來，中國的科學技術「事實上沒有退步」，「一直在穩緩地前進」；而西方在經歷了「幾乎沒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樹」的黑暗中世紀之後，「文藝復興來了，發生了科學大革命」。這樣，問題就巧妙地轉變為：「為什麼這種科學的大振興或大革命，不在中國或印度發生，而是在西方發生？」（註，見後）

為了證明提出這一論點的正確性，李約瑟「非常審慎」地畫了一張中西科學技術發展對照的示意圖，見圖1。（2）

這張圖給我們一個啟示：把中西科學技術發展作些數量化的分析，對我們從歷史發展全過程和總趨勢上討論科學史上的某些重要理論問題，將可能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

為了從整體上把握中西方在科學技術發展中所體現的不同特點，為了顯示中西方科學技術各自在不同歷史時期發展情況的差異，我們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第一，統計了從公元前6世紀到19世紀末這兩千五百年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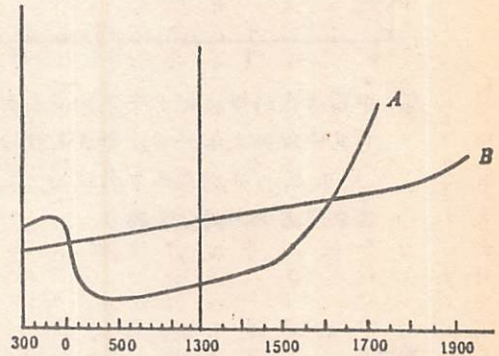


圖1 中國與西方科學發展示意圖
A, 西方 B, 中國

間內的近兩千項科學技術成果，分為科學理論、科學實驗和技術三部分，根據各項成果在學科範圍內的地位及其對社會影響程度的大小，制定不同的計分標準，作出中國和西方的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線（圖2、圖3，其中○—○表示總和，●—●表示理論，●—●表示實驗，○—○表示技術，以下各圖同此示例，圖中曲線是取對數值繪出的）※。第二，以不同的時間尺度，對中西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裏科學技術成果的淨增長（絕對增長）作出統計（圖4、圖9）。下面，我們將依次對這些曲線做具體分析討論。

二、兩組曲線的啟示

圖2、圖3（3）中最上面一條曲線分別代表中西方科學技術總發展趨勢。我們可以分四階段來對照這兩條曲線。

第一階段，公元前4世紀前後（西方是希臘文化時期，中國是戰國時期），中西方處於大致相同的水平。第二階段，公元4—11世紀

，中國的曲線呈平緩上升的趨勢，而西方的曲線則出現一個大跌落。第三個階段，12—15世紀，中國的曲線依然平緩上升，西方則經過大翻譯、文藝復興等而蘊育着科學技術革命的風暴，曲線雖仍居於中國之下，但明顯可見它是

※每項成果的計分標準根據成果在學科領域中的地位和對社會影響的大小來確定，劃分為四個等級：在科學史上僅有記載者打一；對本學科有較大影響者打一〇分；對科學技術的廣泛領域有影響者打一〇〇分；對整個科技革命具有劃時代貢獻或對社會發展具有巨大影響者打一〇〇〇分。處於中間狀態的成果，酌情計為五〇〇、五〇〇。這種數量化方法是初步的，有待於進一步改進。我們認為，用科學對社會影響的數量級作為統計權重進行數量分析，對研究科學發展的規律及其和社會的關係是有益的。當然，計分標準難免帶有主觀性，但它不會妨害宏觀分析與統計規律的展示。

計分舉例：

一〇〇〇 牛頓「自然哲學數學原理」（理論），瓦特蒸汽機（技術），發明活字印刷術（技術）；

五〇〇 哈維發現血液循環（理論，實驗），拉瓦錫確立新燃燒理論（理論）；

一〇〇 林奈「自然體系」（理論），伏打電堆（實驗）；

五〇 康德星云說（理論），張衡的候風地動儀（實驗）；

一〇 蓋·呂薩克氣體膨脹定律（理論），洪堡的高層大氣氣溫遞減定律（理論）；

五 發現（實驗），確定哈雷彗星周期（理論）；

一 制取鉛白（實驗），恩培多克勒關於發現耳蝸的記載（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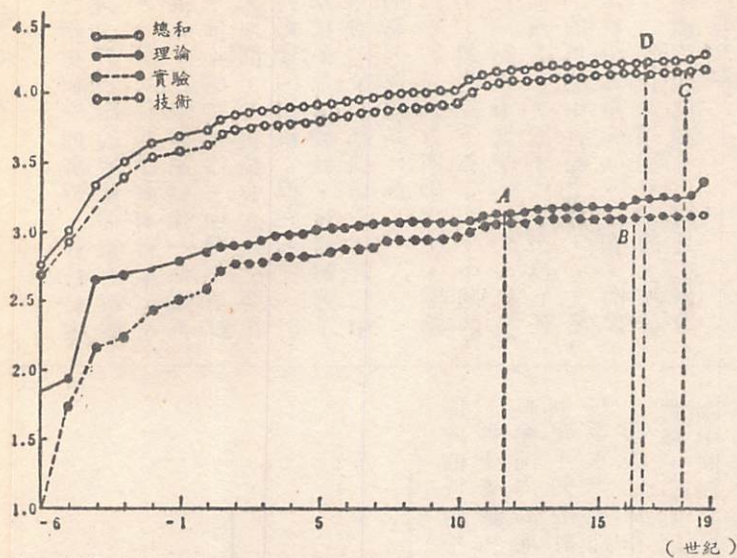


圖2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綫

(其中縱軸表示科學技術成果積分對數值。

A、B、C、D分別為西方的理論、實驗、技術和總分趕上中國的交叉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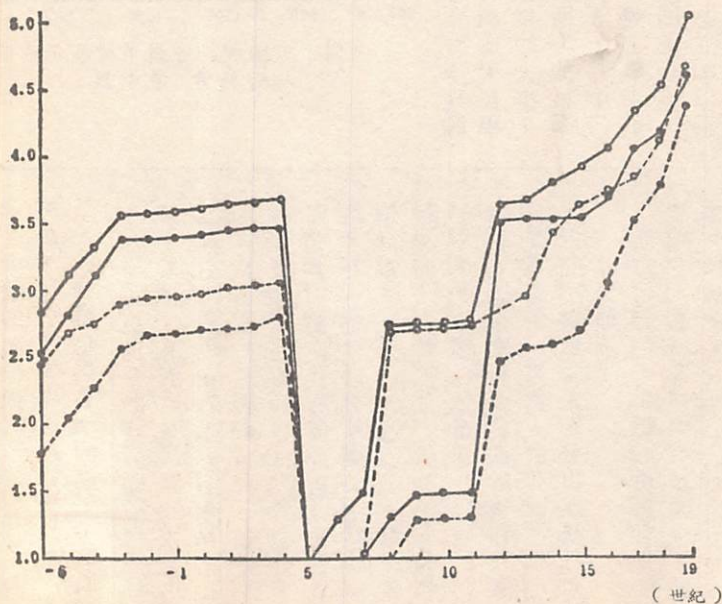


圖3 西方科學技術水平累加增長曲綫

(縱軸表示科學技術成果積分對數值)

在上升且趨於逼近。第四個階段，16—19世紀，從整個趨勢看來中國仍然是平緩前進，而西方則發生了科學技術革命，曲綫高度超過中國（在圖2中始於D點），并以迅猛的勢頭陡直上升。

由此，我們可以從圖2、圖3中看出中西方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顯著不同的特點：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是連續穩步的緩慢增長過程；而西方則是中間有個大跌落，15、16世紀後呈

加速發展的過程。

我們繼續對照圖2、圖3，馬上會注意到另一個更為明顯的特點，即中國和西方的科學理論、實驗、技術三條曲綫的關係也是大不相同的。圖2顯示中國的三條曲綫相互分離，其中技術綫與理論、實驗綫間的分離尤為突出，技術綫遠遠高於理論綫和實驗綫。這種相互分離的關係貫徹始終，三者似乎是各自獨立地發展着。再從中國科學技術成果的總分中算一算

，技術成果的積累計分高達八〇%，理論成果積分佔一三%，而實驗成果積分僅佔七%。這表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主要是以技術水平來體現的。這一特點在圖2中表現為技術綫與總分綫極為接近而又平行。

西方的三條曲綫分佈則不是這樣。古希臘時期科學理論水平比實驗與技術都高。經過6至10世紀大跌落後，大翻譯運動又恢復了理論領先地位，到13—14世紀，技術一躍居上。16

世紀後，實驗曲綫急劇上升，理論、實驗和技術三條曲綫趨於一致，整個科學技術呈你追我趕加速發展的局而。

人們自然會問，為什麼中國的理论、實驗、技術三條曲綫是離散的，平行的？它和中國科學技術水平兩千年來緩慢上升以及近代趨於飽和有沒有關係？西方16世紀後加速發展的原因又是什麼？我們認為，從統計曲綫的宏觀分析出發，特別是從分析西方科學技術在16世紀後加速的原因開始，可以找到解決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最先產生這一歷史之謎的鑰匙。

三、近代科學技術的循環加速機制

我們來看西方科學技術淨增長變化曲綫（圖4E）。由於西方科學技術淨增長計分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相差懸殊，我們不得不把它們畫為四個圖（圖4A, B, C, D）。圖4確實證明西方自16世紀以後，科學技術出現了亘古未有的加速增長。我們發現，如果僅僅從科學技術內部來分析，這種加速發展是因為科學理論、實驗和技術三者之間逐步確立了一種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循環。

第一個循環加速過程是理論——實驗——理論。我們知道，科學理論和實驗的發展有兩條綫索。一條是它們各自內部的繼承發展，即理論科學家在前人理論成果的基礎上發展新理論，實驗科學家繼承和改造、創新實驗儀器和方法。如果僅僅只有一條理論和實驗分離的發展綫索，整個科學發展速度必定是緩慢的。而在近代科學中，理論對實驗起着指導和設計作用，實驗則對理論起着鑒別作用。這兩種效應使實驗從盲目走向自覺、嚴格；也使理論從含混趨於清晰、嚴密。它們構成了一個强有力的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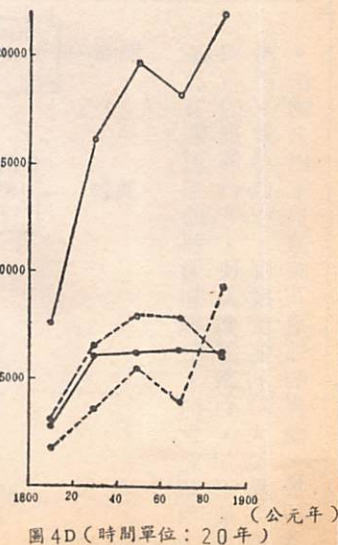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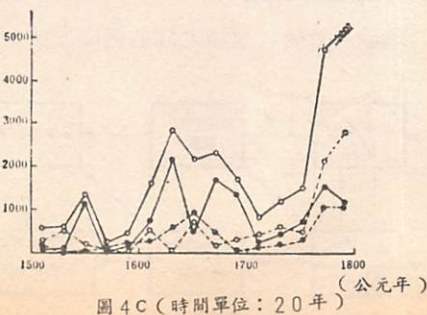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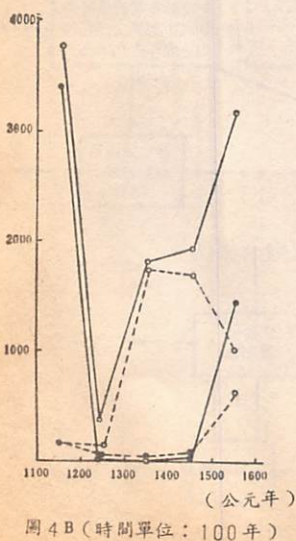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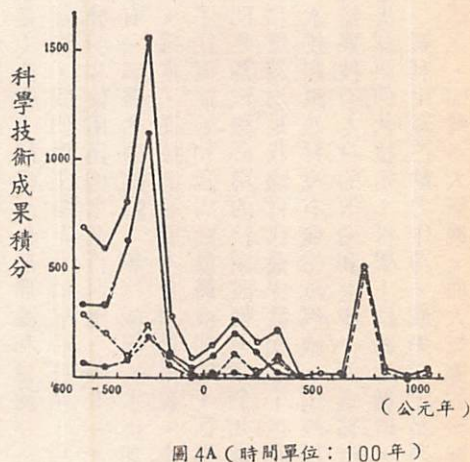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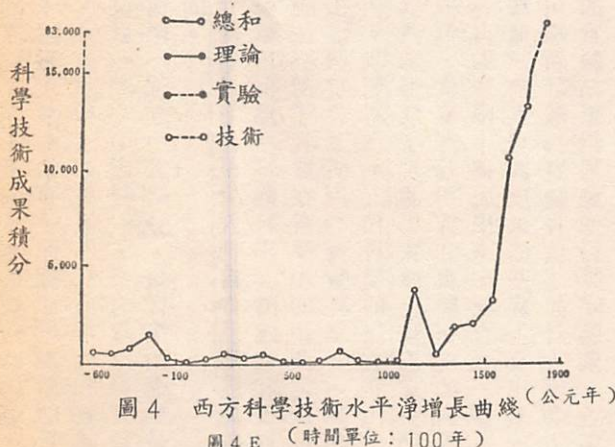


表1 西方理論、實驗、技術在各世紀中積分中所佔比重(%)

時間 (世紀)	-6	-5	-4	-3	-2	-1	1	2	3	4	...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理論	49	57	77	72	38	51	70	60	75	18	/	90	21	2	5	47	61	31	33
實驗	9	8	11	12	37	25	13	6	6	46	/	5	23	1	6	20	22	20	29
技術	42	35	12	16	25	24	17	34	19	36	/	5	56	97	89	33	17	49	38

表2 中國歷代理論、實驗、技術在該朝代總積分中所佔比重(%)

朝代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魏、西晉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北宋	南宋	元	明	清
理論	12	23	0	6	10	13	15	2	8	/	4	19	8	16	40
實驗	2	8	0	9	14	1	13	0	11	/	6	7	12	3	1
技術	86	69	100	85	76	86	72	98	81	/	90	74	80	81	59

。圖5是一個實例，它證明了這種循環加速機制對建立近代電磁理論的作用。從一八二〇年奧斯特發現磁針被電流偏轉，到赫茲證實電磁

波的存在，在不到七十年的短短時間裏，就揭示了電磁現象的本質，開掘了電磁學的巨大寶庫。可以想像，如果僅僅只有理論和實驗獨立的發展（圖5中虛綫），沒有理論與實驗之間的循環（圖5中實綫），這樣快的進展是不可能的。

科學史上，不少人把自伽利略開始的近代科學革命稱為「實驗科學」的建立和發展。這個說法強調了實驗在科學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實驗科學」一詞并不很確切。我們認為，近代科學的建立是由于科學結構內部形成了理論—實驗—理論這一循環加速機制，從事理論研究和實驗研究的科學家們從各自的局限中擺脫出來，結合為一體。科學家在繼承前人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提出新的學說，這種新理論為實驗提供了設計方案和方向，新的實驗結果對理論進行審定鑒別，否定其錯誤，強化和明確其正確的因素，使假說得以成長為理論，同時實驗也由粗放簡單趨於精密複雜。

促使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的第二循環是：技術—科學（包括理論和實驗）—技術。這裏，我們以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為例來進行討論（圖6）。李約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蒸汽機等於水排加上風箱。確實，從技術發展本身環節來說，水排解決了往復運動和圓周運動轉換問題，而風箱的閥門是蒸汽機必備的技術設備。我們知道，水排和風箱均是我國古代最先發明的，但在中國，水排和風箱並沒有產生蒸汽機。蒸汽機的發明需要技術本身的改造和進步，而這種改造和進步却要仰仗技術—科學—技術的循環。要利用蒸汽動力作功，最先必定是利用低壓蒸汽，即製造大氣機，而大氣機的研製必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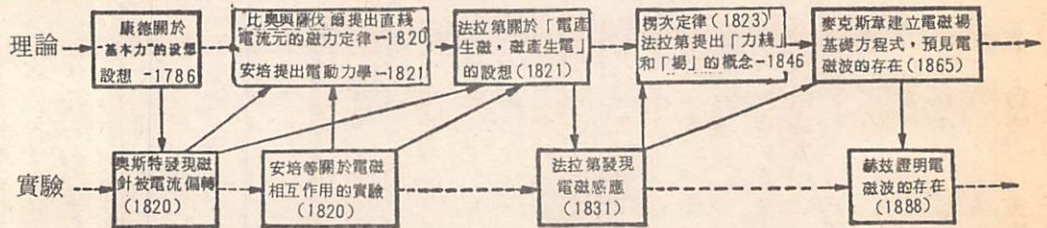


圖5 理論—實驗—理論之間的循環加速（以電磁理論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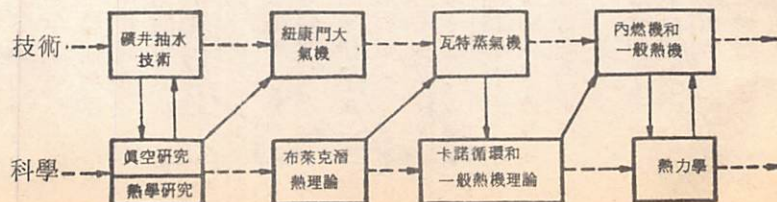


圖6 技術—科學—技術之間的循環加速（以蒸汽機為例）

基於有關真空的理論和實驗。17世紀時西方對真空的理論研究，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使蒸汽冷凝來獲得真空，那麼就能利用大氣壓來做功。法國人巴本根據萊布尼茲的提議，於一六九

○年制成第一台大氣機。一六九八年，美國礦山技師塞維利也利用真空原理製成能在礦井中抽水的大氣機。一七一二年，紐康門終於製成較完備的大氣機。如果僅僅有礦井抽水技術內部的發展，而沒有真空理論的研究，那麼紐康門大氣機是不可能出現的。衆所周知，瓦特對大氣機所做的革命性的改進，是發明了冷凝器，而這項發明則是利用了科學對潛熱研究的理論成果。瓦特蒸汽機出現以後，又促進了科學家們對熱機效率的研究，科學家卡諾提出了相當於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卡諾循環，奠定了一般熱機理論。這一理論成果以及後來的熱力學理論，又成爲一股熱機如蒸汽輪機、內燃機等的設計基礎。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科學研究爲新技術開闢道路，新技術的興起又向科學研究提出新課題（包括理論和實驗），同時，新技術所代表的生產水平和能力也爲科學研究提供新的實驗材料和儀器，促使更完備的理論和實驗成果誕生。這些科學研究的新成果又反過來促進新技術的開發，新的實驗產品和儀器也不斷地社會化成爲技術產品和工具。如此循環不已，相互促進，便形成了強大的加速發展機制。翻開近代科學技術史，在化學工業、無線電工業、計算機工業、原子能、激光、空間技術等等領域，無一不經歷了這樣的循環加速過程，而且20世紀以後，這種循環加速的周期大大縮短了。

這兩種循環加速機制可以綜合表示爲圖7，科學理論、實驗和技術三足鼎立，形成互相獨立又互相促進的結構，這是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的內在條件。表1和表2又給出了西方和中國各個時期理論、實驗和技術三者各佔總分的百分比。從中明顯可見，西方16世紀科學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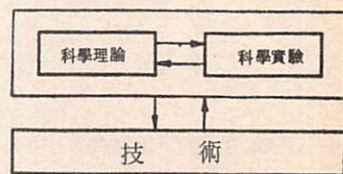


圖7 近代科學技術循環加速機制示意圖

的加速和這三項數值的趨近一致這一點是密切而相關的。而中國古代並沒有形成三足鼎立的結構，實驗的比重一直很低，出現循環加速是不可能的。西方科學技術正是在形成三足鼎立結構、出現循環加速之後才在總體上急速超過中國的（圖2中的D點）。

這種具有循環加速機制的科學技術結構的建立，一方面需要合適的社會條件，另一方面，除了理論、實驗和技術三足鼎立外，其個個子系統內部也應有合理的結構。下面我們首先分析循環加速機制對內部結構有哪些要求。

四、近代科學技術的結構

要形成循環加速的科學技術結構，科學理論必須是建立在構造性自然觀的基礎之上。構造性自然觀有兩重含義，第一是指必須從結構的角度來把握自然現象，第二是指理論必須是邏輯構造型的。

所謂邏輯構造型理論，是指一個科學理論體系內部的各種論斷不是各自獨立的，這些論斷

可以歸爲幾個最基本的假設和公理，又可據此運用形式邏輯做出一系列推斷，這些推斷不能互相矛盾。這樣，整個理論體系形成了整體有秩序的結構。

我們知道，爲了構建理論與實驗之間的循環，科學理論必須對實驗有指導和設計的作用，這就需要從結構的角度來把握自然現象。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認爲天上物體的運動是完美的，取圓周形態的，地上物體的運動不能與之相比。在這種理論規範之下，力學實驗就不能有效地進行。從伽利略到牛頓逐漸明確了無論是天體、蘋果、木球，不論他們處於世界的什麼位置，它們都遵循相同的力學規律。在研究自然界中與力學有關的現象時，我們只要抽取物質的質量、空間位置和速度、加速度等這些變量來構造模型就夠了，事物的第二「性質」與力學規律無關。實驗室中得到的變量之間關係完全可以運用到天體運行之中。這就是從結構角度把握自然現象。任何實驗對象都是複雜的，科學家在實驗過程中會碰到數不清的變量，而且正如世界上沒有兩片樹葉是相同的，也沒有兩個實驗是絕對一樣的。只有用結構觀點把握實驗對象，才能在實體具有的豐富衆多的規定性中把主要變量和次要變量加以區分選擇，實驗條件的控制和實驗的重複才有明確的標準。

同樣，實驗對理論的鑒別作用越強，理論與實驗之間的循環也越有利。這一方面要求理論的各論斷必須建立在嚴密的邏輯推理之上，更重要的是理論必須滿足構造性要求。我們舉一個著名的例子來說明。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中有兩個論斷，其一是越重的物體下落得越快；其二是，由於有動力因的存在，當輕的物體（下落得慢）和重的物體（下落得快）在一起時

，那麼落得慢的將阻碍落得快的物體。顯然，這是人們從實踐經驗中歸納出來的兩個全稱判斷。在亞里士多德的體系中，它們獨立存在着，在一千年的時間裏沒有被證僞。而到伽利略時代，科學家則開始把這兩個診斷之間用某種構造結合起來考察了。即設想把一個重的物體和輕的物體用繩子聯在一起，據第一個診斷，它們的總重量增加了應該落得更快；據第二個診斷，輕的阻碍重的下落，下落速度應在輕重兩物單獨下落之間。這是一個悖論！那末，其中必有一個錯了。這個例子表明，對構造性理論體系，實驗的鑒別作用大大加強了。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體系中，日常經驗是不能對這些論斷證僞的，而在構造性理論體系中却可以。構造性與邏輯性是有關的，但不是一回事。人們常常把這個例子看作理想實驗鑒別和邏輯檢驗。實際上，亞里士多德是精於邏輯的。他只是沒有把他的理論搞成構造性體系。構造性自然觀最早出現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之中。從伽利略開始，科學家才把歐幾里得幾何中邏輯構造型模式普遍用於建立科學理論，這樣，實驗對理論的鑒別作用就大大加強了。

特別是在笛卡兒那裏，這種構造性自然觀被賦予了二元論的形式，加速了構造自然觀的傳播。笛卡兒在他的名著『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中，明確地把歐幾里得幾何學的構造方法推廣到所有科學理論的建立和鑒別中去。在建立科學理論時，可以先提出假設，由假設推出某些結論，如果結論與實驗符合，則假設為真，反之，假設就要修改。這種理論構造和鑒別的基本原則，至今還為科學家們所遵循。

總之，構造性自然觀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它具有證僞性；第二、它具有預見性。這兩個特點把它與實驗緊密結合在一起，先由

實驗歸納出某些結論，科學家提出理論來解釋它們，並預言其他結論，這些結論又可以由實驗來鑒別，這樣就保證了理論—實驗—理論的反覆循環。

近代科學技術的循環加速機制對實驗的要求是：科學實驗必須是受控實驗（這裏所指的實驗是包括觀察在內的廣義的實驗）。

所謂受控實驗，是指實驗應在嚴格控制條件下進行，而不是以在不可控的偶然因素起主要作用時的觀察或測試結果為據。只要控制條件足夠嚴格，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用同樣的條件和方法做同一實驗，實驗結果都能以穩定的幾率再現。

實驗只有是受控的，才可能在它的基礎上建立明晰的構造性理論。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伽利略不是用小球在斜面上運動做實驗，而是像傳聞的那樣在比薩斜塔做自由落體實驗的話，那麼他是不可能得到自由落體運動定律的。因為當時沒有足夠準確的鐘，而自由落體運動太快就測不出它們是否同時着地，再加上不可排除的空氣阻力等影響，使得在比薩斜塔上做實驗就不是完全受控的。而小球在斜面上運動在當時條件下就是受控的了（小球運動速度可用斜面傾角調節，時間用滴漏來測量）。

實驗只有成爲受控的，才能被廣泛地重複，才能從偶然誤差和錯誤中解放出來，使得理論—實驗—理論這一循環有可能在整個社會中進行。中國古代科學家對實驗做得很認真，觀察也很精確，像磁偏角的發現就是例子。但是受控實驗結構一直沒有確立起來，這使得很多實驗不能重複，甚至和迷信、方術混在一起不能分離。如元代大科學家郭守敬曾試圖按照『後漢書』和『隋書』上的記載，做「候氣密室

」的實驗。據載，這種裝置每當交節氣的時候，與之相應的管子裏的灰就會飛散出來，無論郭守敬怎樣絞盡腦汁，他仍然不能重複這一實驗。顯然，古書上的這一實驗記載即使不說是無稽之談，至少也可以說它是非受控實驗。

受控實驗的第一個條件是盡可能使用儀器來控制實驗過程，并用儀器來反映實驗過程所涉及的變量與變量之間的關係，只有這樣，實驗成果才能社會化，特別是轉化爲技術，加入到與理論、技術的循環加速過程中去。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近代科學各學科建立的順序，就可以發現，它們是和這些學科引進受控實驗特別是系統使用儀器的順序聯繫在一起的。無疑，最早和人類生產實踐活動緊密相關的實驗是測量土地。測量是最簡單而最易掌握的受控實驗，因此，幾何學成爲最早建立的自成嚴密體系的學科。與力學聯繫的受控實驗和儀器則複雜得多了，它主要是在16世紀以後發展起來的。以後，磁學、生理學、化學、電學等等學科的相繼確立，都是和相應的與儀器相關的受控實驗聯繫在一起的。自16、17世紀以後，西方對儀器的崇尚，很典型的反映了科學家對受控實驗的重視。天秤、溫度計、氣壓計、真空泵、望遠鏡及顯微鏡等就是在這時相繼出現和不斷改進的。牛頓被吸收爲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最初不是因爲他那偉大的理論，而是由於他成功地設計了一台反射望遠鏡。

受控實驗的第二個要求是實驗必須和構造性自然觀結合，也就是說實驗和理論結合，儀器和原理結合。只有這樣，科學家才能設計某一特點的受控實驗來驗證特定的理論，並將其原理用來設計技術設備。而中國古代科學理論和實驗之間，這種聯繫一直沒有明確地建立起來。我國古代曾有一些非常傑出的實驗。如

『淮南萬畢術』中有個實驗：將沸水倒入很薄的銅瓷之中而不灌滿，很快將瓷密封投入井中，大氣壓力加上水壓就會將銅瓷壓破，產生爆炸(4)，這或許是世界上最早的真空實驗。但由於沒有相應的構造性理論，它是不能向技術轉化的。這樣中國古代雖有真空實驗，但却產生不出製造蒸汽機的設計。到頭來只是以水排和風箱為西方製造蒸汽機奠定技術基礎。這一現象相當普遍。甚至，我國歷史上許多傑出的實驗只有一般記述，對實驗原理和方法都沒有明確的記載。張衡製造的世界第一台地震儀，無疑是建立在實驗基礎上的。但因沒有留下相應的原理和製作方法，以至於郭守敬這樣的實驗大師企圖仿製都不能成功。這樣在古代，它當然不能成爲一種普遍運用的技術設備。

受控實驗結構的全面建立需要學者傳統和工匠傳統的結合。因爲一般提出理論、完成非實用目的實驗是學者的工作，但製造儀器和將儀器轉化爲技術工具則只有靠工匠來完成。翻開科學史，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受控實驗結構的建立，幾乎都是由工匠和學者的結合完成的。工匠出身的工程師達塔格里亞和斯台文研究彈道和自由落體，學者伽利略則綜合他們的研究發現自由落體定律。眼鏡商漢斯·立帕席發明望遠鏡，開普勒立即研究其光學機制，再經伽利略改造設計了新的望遠鏡，接着又立即由工匠們投入生產。匠人羅伯特·諾曼發現磁偏角，學者吉爾伯特則構想出磁針指北的機制，并寫出「磁力論」。無疑，工匠傳統與學者傳統的結合是科學與技術之間循環加速的重要保證。

近代科學技術的循環加速結構對技術的要求是：它必須是一個開放性的技術系統。所謂開放性，是指技術本身能從掌握技術的個人手中游離出來，從它生產的具體產品(

目的物)中游離出來。也就是說，技術不再是某個狹窄、專門行業的技藝了，而成爲一種普遍的社會生產力。古代大多數技術都不是這樣，技藝和掌握它的匠人不可分離，生產技術和它所生產的具體產品不可分離。這樣，不僅科學和技術之間互相循環加速是不可能的，而且一種技術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也極爲困難。

開放性技術體系的形成，要有兩個前提，第一，要求技術的改進和轉移必須具有強大的經濟動力，也就是說，有賴於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產生和發展。在封建社會中，技術的產物可以是商品，但技術本身却不是商品。技術成爲商品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才能做到。一方面工匠自身成爲僱傭勞動者，他們的技能和人一起轉化爲商品；另一方面，技術被還原成一般等價物，可以純粹用它的經濟效益來衡量。這樣，技術部門之間的狹隘的壁壘被打穿了。第二，技術必須和人類的一般自然觀相結合，被賦予某種普遍的觀念。構造性自然觀和受控實驗的確立，使技術具有了科學的靈魂，使技術從一般技藝和狹隘分工中相對解放出來，從而可以實現科學和技術之間的轉化，實現部門行業間的轉移。

我們在圖4C中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規律，西方科學理論和實驗的加速發展在十六、十七世紀就開始了。但這一時期，技術水平增長并不明顯。技術水平的加速發展是十八世紀開始的。爲什麼？它很明確地反映出開放性技術體系建立的兩個前提，第一是十六、十七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形成，第二是合理的科學理論結構和實驗結構的建立。循環加速機制首先在科學理論和實驗之間發生。當近代科學基本成熟時，技術才能接受一般自然觀的支配，

科學和技術之間循環加速導致了整個科技水平的起飛。在這兩個條件具備之前，開放性技術體系是建立不起來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近代科學技術結構表示如下(圖8)：即科學理論結構是構造性自然觀，實驗必須是受控實驗，而技術結構則必須是開放性的。這三個子系統相互作用，具有循環加速的機制，整個近代科學技術就是在這樣一種結構中加速發展起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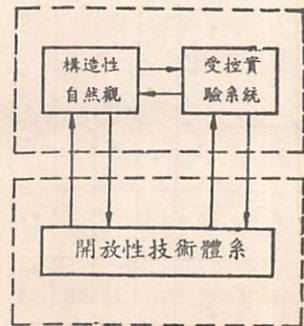


圖8 近代科學技術結構

科學技術是人類有組織地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活動。在近代科學技術結構形成之前，人類這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發展速度也較緩慢。科學技術系統內部的，即科學、實驗、技術三者之間的相互聯繫和作用，都比較弱。在人類六千年的文明史上，科學技術的循環加速結構只是近四百年來才形成和確立起來的。一旦這種結構確立了，科學理論、實驗和技術就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也只有這樣，循環加速的機制才能發動，才能極大地放大大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廿世紀後，我們更加看清了這一點。

五、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特點

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結構如何？它為什麼不具備循環加速機制呢？我們先分析中國傳統的技術結構。衆所周知，指南針、造紙、火藥和活字印刷四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奉獻給世界並改變了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偉大技術成果。饒有興趣的是，這些閃爍着中華民族智慧光彩的瑰寶，不僅反映和代表了我國古代技術的水平 and 最高成就，而且它們也恰好展現了中國傳統技術結構的重大特點以及和古代社會結構的內在聯繫。

一個社會的技術結構取決於社會結構以及它對技術的需求，四大發明是滿足於什麼樣的社會需求呢？十分明顯，它們與農業和手工業等直接滿足吃穿住所需要的創造發明不同，是為社會在廣闊地域上組成強大、統一的國家機構服務的。紙張、指南針和印刷術作為社會通訊（交通）工具自不待言，火藥雖然來自金丹術，而在唐以後能成爲一種技術，主要還是由於大一統國家的需要。有明確文字記載者，宋代開始把火藥用於武器製造，北宋初年就曾用火器鎮壓李順、王小波起義軍。控制論的創建人維納有句名言：「社會通訊是社會這個建築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漿土」(5)。四大發明便集中表明了中國古代技術的發達，是與中國封建社會以大一統的組織形態存在這一點密切相關的。我們知道，歐洲本土在中世紀時，碎裂爲幾百個甚至上千個細小的部分。他們是一些相互聯繫甚弱的相對獨立的經濟文化單位。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封建社會自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以後，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國始終是社會結構的主導形式。強大、統一

的行政控制，內部經濟商業貿易的密切交流，統一的文化 and 信仰，這一切都需要有發達的通訊技術（交通運輸和文化交流、傳播的工具等）、強大的軍事力量、「敬授民時」的曆法、土地丈量技術、繪製地圖的技術，乃至體現皇權威嚴的皇宮建築等等，我們把這些統稱爲「大一統」技術。如果把中國古代的技術成果按農業、「大一統」技術、手工業和醫藥技術加以分類統計，同樣採用前面所述的計分標準，可以算出各類技術在整個技術構成中所佔的百分比※，見下表。

※有些技術成果的計分是均分於兩類之中進行統計的，如曆法技術的計分分攤在農業與「大一統」技術中，火藥分攤在「大一統」與手工業中。

表三的統計數字表明，與大一統社會結構相聯繫的技術成果所佔的百分比，多在三十%以上；分裂時期則在一三%以下。

傳統技術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手工業」是否也和「大一統」社會形態有關呢？一個社會的手工業技術水平取決於商品經濟發達的程度。我們知道，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殊結構，大一統的封建官僚政府對經濟的調節作用，使得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和西歐封建社會具有不同形態。中國封建地主經濟結構對商品經濟的容納程度遠大於西方領主經濟結構，而發達的商品經濟必然刺激手工業的進步，於是，中國古代的手工業水平遠高於西方也是當然的了。表三中歷代手工業多佔技術總分的三〇—五〇%。這樣，在統一時期，手工業和「大一統」技術的加合計分就佔了整個技術總分的七〇—八〇%，它們決定了整個社會的技術水平。因此，我們可以把中國傳統技術結構稱爲「大一統型」的。它的發達完全是由大一統的社會組

表3 中國古代各類技術在總技術構成中的比重(%)

朝 代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魏、西晉	南北朝	隋	唐	北宋	南宋	元	明	清
農 業	16	26	1	5	4	12	13	1	4	2	7	12	6	2
「大一統」	13	12	59	24	41	12	13	58	32	53	43	28	34	40
手 工 業	40	43	40	63	47	35	45	27	47	43	39	37	45	46
醫 藥	20	18	0	8	8	41	10	14	16	2	10	3	13	12
其 他	11	1	0	0	0	0	19	0	1	0	1	20	2	0

織形態和相應的地主經濟所決定的。圖九所示的中國科學技術淨增長曲線表明，一個王朝的技術增長和它的中央集權程度以及商品經濟發達程度直接相關，圖九中出現了北宋時期的最高峯，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在宋代，不僅大一統的官僚政治形態臻於完善，而且地主經濟和商品經濟也非常發達。當時國家徵收的商業稅的年收入就曾達二千二百萬緡，約佔總歲收

的一／七(6)。當時廿萬人口的城市多達六個，臨安則是三十餘萬戶、百餘萬人的商業消費大城市。又據「宋史·食貨誌」，當時「各路繳納稅絹達三四一萬匹」。相反，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國家陷於分裂狀態，地主經濟衰落，商品經濟普遍蕭條，圖九中顯示這一時期技術淨增長水平也最低。唐朝開元年間的統一和商品經濟發達是衆所週知的，與此對應的技術淨增長綫也很高，而到安史之亂以後商品經濟衰落下去時，技術淨增長綫便跟着下降。五代的情況也是這樣。

大一統型技術雖然發達，但它不是開放性技術體系，而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殊結構的產物。只能在封建地主經濟結構所限定的框架中發展。對於一個個具體的行業，如紡織、瓷器、冶金、造船等等，其技術水平可以很高，不僅為中世紀的西方所望塵莫及，而且有些至今也令人嘆為觀止。兩千多年前，貴族王侯就在使用表面鍍鉻氧化物的防銹利劍，貴族夫人就身穿用提花機織出的精美的絨圈錦花紗的棉袍。而優質瓷器的製作，則必須掌握控制超高溫的複雜技術。對於一個個匠人來說，他們的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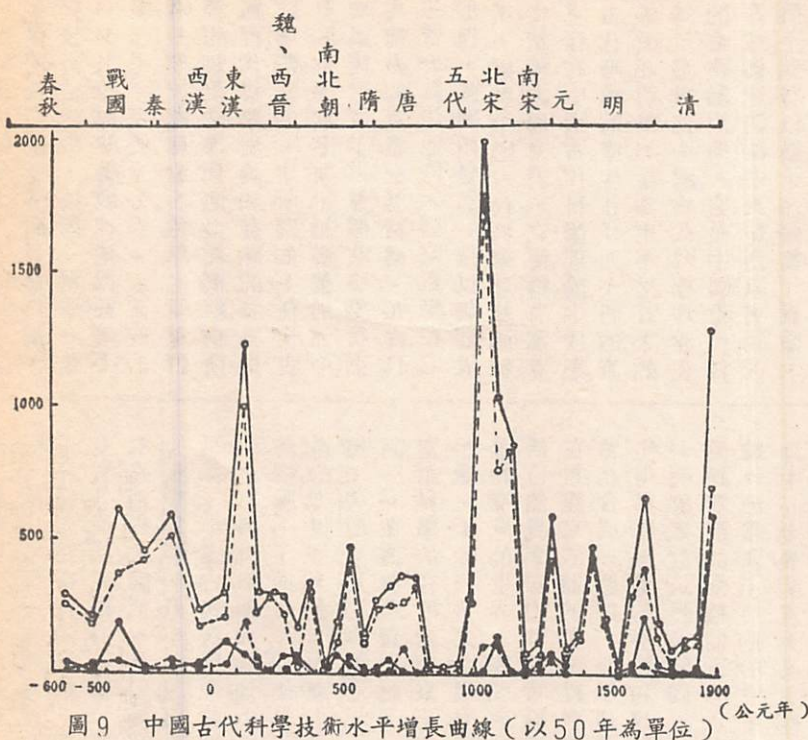


圖9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增長曲綫(以50年為單位)

○——○表示總和 ●——●表示理論
●……●表示實驗 ○……○表示技術

更是具有傳奇般的色彩，魯班、扁鵲、華佗不僅是偉大的發明家，也是歷代匠人醫士可望而不可及的崇拜偶像。

但這種技術再高超，它和社會結構的關係決定了它不能向開放性技術體系轉化，比如，中國的瓷器製造技術很發達，但玻璃製造技術就較落後。控制密內溫度和氧化還原時間，只被限制作為製造瓷器的方法。大一統技術是在政治文化組織形態促進下形成的，官僚行政控制網在技術體系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就技術本身來說却是封閉的。技術被長期封閉在一個個具體的行業中，靠自身經驗積累發展着，很難對其它部門產生革命性的影響。此外，技術還與操作技術的人不可分割，它必須由每一個企業掌握這項技術的工匠，不斷地製造某一產品才能獲得。它的繼承性往往是由父子「秘傳」、行會師授或官營壟斷的。中國古代關於「得心應手」和「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不僅表現出一種高超的技藝，而且反映了這種技藝的封閉性。正因為這樣，中國歷史上技術失傳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是令人吃驚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一統技術發展必然和大一統王朝的穩定性聯繫在一起，王朝的崩潰就是對技術體系的一次大破壞。圖九表明，中國傳統技術水平發展隨着王朝週期性崩潰而呈現週期性振蕩，這對於技術水平的積累和時間空間上的轉移構成巨大障礙。這樣，技術就深深陷在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桎梏之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紡織機械：早在宋代，我國就發明了卅二錠畜力和水力大紡機，其產量是小紡車的三〇—五〇倍。據記載：大紡車「晝夜紡織百斤，不勞而畢，可代女工兼倍省」(7)。西方一直到工業革命前才出現類似的紡織機械，但它是工業革命一系列技術轉移和發展中的一環。而中國却不

是這樣，隨着大一統王朝的崩潰，商品經濟受到摧殘，這些發達的技術也會受到致命打擊。顯然，在大一統技術結構中，技術一科學（包括理論和實驗）——技術的循環加速機制是不可能出現的。

如果說中國古代技術發達的特點主要是由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結構和地主經濟結構所決定，那麼中國古代科學理論和實驗的特點則主要是由文化結構帶來的。衆所周知，任何古代科學理論都是和哲學觀點緊密相聯繫的。中國封建社會自秦以後形成了一種儒家學說爲正統，道家學說爲補充的意識形態結構。在古代哲學中儒家思想居於統治地位。儒家哲學在它的創始人孔子那裡，就開始變爲一個以倫理道德爲核心的體系，這對中國古代科學理論的影響是巨大的。從積極方面來看，它使得有獨立人格和意志的上帝在中國古代科學理論中找不到插足之地。古代理論的產生往往與人們的直覺經驗和直觀感受相聯繫（當然也不乏天才的想象力和推理），這就使中國古代科學理論往往帶有經驗論的唯物論傾向。它是中國古代科學理論比神學自然觀統治的中世紀西歐更爲先進的原因。我們不僅有以墨子、張衡、劉徽、祖沖之、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時珍、宋應星等爲代表的聞名於世界的大科學家；而且從總體上看，將圖二與圖三加以對比，可知中國的理論水平在中世紀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裡高於西方同期理論水平。

以個人經驗（包括社會的和心理的諸方面）合理外推，是儒家認識世界的模式。這種模式也就給自然科學理論帶來了直觀和思辨的特點，特別是儒家倫理中心主義使科學理論趨於保守和缺乏明晰性，無論是董仲舒、朱熹，還是王充、沈括，他們大多以人的行爲和感受外

推而解釋自然現象（比如，王充就以「元氣呼吸，隨日盛衰」來解釋潮汐週期）。這就出現了一種頗爲奇特的現象：在那些用日常經驗和直觀外推能解釋的科學領域，中國科學理論都有過精彩的論述，如對流星、隕石、化石、虹的解釋等等。但一旦越出直觀外推所能把握的領域，中國古代科學理論就顯得含混不清。儒家的有機自然觀和倫理中心主義長期使科學理論擺脫不了稚氣。即使是已經踩着近代科學門檻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仍然在宣講什麼「夫聲氣風力實傳心光，受命如響，神不可測」。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人們很難把自然界當作科學的客觀對象來研究。理氣之爭與善惡相隨，天地日月之論與君臣等級相伴，世界是萬物交感的世界，學問家的任務在於建立起包括自然現象在內的結合倫理說明的理論體系。在封建宗法制的中國社會裡，政治和倫理是緊密結成一體的。科學理論倫理化的傾向，就使得科學理論的爭論和政治鬥爭糾纏不清，大一統政權愈是強大鞏固，科學理論的發展愈是受到政治的強控制，一旦它不能滿足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前進的道路就有可能被阻塞。倫理中心主義的巨大保守性對構造性自然觀的建立是極爲不利的。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中國學者對理論的評價中。直到清代，著名學者阮元在談到西方天文學時還說，西方天文學爲了解釋天體運動不勻速的原因，先後提出過本輪勻速說，日心地動說和橢圓面積說，他嘆道：「其法屢變」、「吾不知其伊於何底也」，他認爲，「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理論應該「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只有這樣，理論才能「終古無弊」。(8)當西方科學家已自覺地運用理論——實驗——理論的循環過程，反覆修改自己的

理論使科學加速發展的時候，我國科學家仍在尋求「終古無弊」、「不復強求其所以然」的解釋，慎於立言，追求着與封建倫理相和諧的萬古不變的思辨體系。

另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朱熹。朱熹對化石成因有正確認識，又用鞭炮來解釋雷鳴，用下雨使日光散射來解釋虹，用「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變爲石」來解釋隕石。確實，在當時能達到這種認識已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了。但是，作爲理論大師的朱熹並沒有構造性自然觀，他的一些觀點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在朱熹的宇宙模型裡，天在白天時自左向右旋轉，夜間又自右向左旋轉。同時，朱熹還同意張載的天地均左旋而遲速不同的見解。他甚至選用張載的這個學說來解釋七曜運轉和制定曆法。(9)作爲一個大哲學家，居然可以容忍自己的理論模型中有互相矛盾、互相對立的學說同時並存，這的確是令人十分吃驚的，也是任何一個構造性理論體系中不能允許的。這種特點，在中國古代不少科學理論中都存在。

中國古代科學理論另一個基本特點是技術化傾向。一方面是技術發達，另一方面是儒家理論模式的經驗性和直觀特點，這使得中國古代科學理論中關於技術經驗的總結很豐富。表的統計表明，主要是記錄、總結技術經驗的著述在歷代理論成果積分中多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在宋朝的技術高峰之後，經元至明，到了對中國古代技術進行全面總結的時期，「本草綱目」、「農政全書」、「天工開物」就是在醫藥、農、工三大領域中最高水平的總結。但是，儒家要求對自然界的認識爲倫理學說服務，其積極入世的現實主義精神使它並不絕對排斥某些爲現實生活服務的理論和技術，而不爲現實生活服務的理論與技術則被斥之爲「屠龍之術

「。這就造成理論的技術化傾向，對於獨立於技術之外的純粹理論結構形成很不利。於是乎，天文學附屬於曆法，數學偏重於解題和運算技巧，生物學知識幾乎完全存在於農學與醫學之中。曆法經常隨着需要而修改，而且越改越趨於精確，到元代授時曆出現，已達到第谷·布拉埃的水平。但天文學理論幾乎是停滯的。表四表明，中國古代科學理論的這種技術化傾向，自宋至明越演越烈，這對構造自然觀的建立是巨大障礙。

表4 歷代關於技術經驗總結性的著述在理論成果積分中所佔比重(%)

朝代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魏、西晉	南北朝	隋	唐	北宋	南宋	元	明	清
技術經驗總結	29	25	0	25	6	13	20	100	27	17	18	41	35	23
其它理論成果	71	75	0	75	94	87	80	0	73	83	82	59	65	77

科學史家常常感慨，爲什麼在數學相當發達的古代中國，沒有產生解析幾何？確實，中國古代代數學十分發達，並從張衡、裴秀那裡

就幾乎已具備了類似笛卡兒的坐標系表示法。按理說，由兩者結合產生解析幾何並不困難。而實際上，即使到明清時期，圓錐曲線和解析幾何相繼傳入中國後，中國數學家仍然按照舊的套路計算曲線長度和它們所圍的面積、體積。正如有的科學史研究者分析指出的那樣：從數學內部的因素來說，中國不僅在中古代，甚至在明末清初的一段時間內也不可能產生解析幾何學⁽¹⁰⁾。理論技術化傾向顯然是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中國傳統數學儘管有高超玄妙的運算技巧，但它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構造型的理論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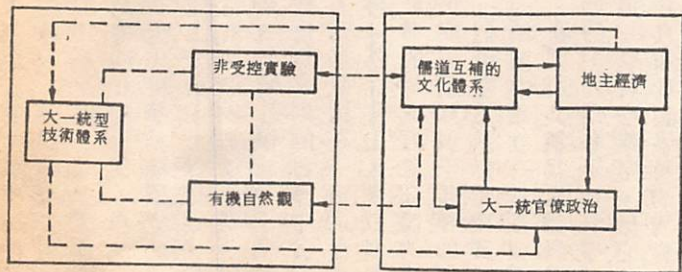
由於中國古代科學理論的這些特點，那些不以實用爲目的而是爲了證明科學理論的實驗，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中就只有被放在一個可有可無的位置上了。尤其是宋明理學產生以後更是這樣。

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明代理學家王陽明的「格竹子」。當時讀書人以格物、致知、窮理爲使命。據說，王陽明在一位錢姓朋友坐在亭子裡格竹子三晝夜病倒後，他自己又去靜觀七天，仍一無所獲有關竹子的道理，他感慨道：「天下之物如何格得？」於是，他便勸人們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內心上來，「其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這似乎是一個笑話，但真正却是一個歷史的大悲劇。

當王陽明先生靜坐格竹子的時候，我們想想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與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同時在世的達·芬奇（一四五二—一五一九），一面在畫着蒙娜麗莎的迷人微笑，一面在解剖死尸、製作各種新巧的機械。並且，他還以大師的語言宣稱：「科學如果不是從實驗中產生，並以一種清晰實驗結束，便是毫無用處的，充滿謬誤的。」這不只

是他一個人的聲音，而是一個科學新時代的先驅者們的聲音。大體與此同時，麥哲倫率領的船隊完成了最早的環球航行，帕拉塞斯衝破了煉金術的牢籠而成爲醫化學的開山鼻祖，費希爾測定了地球的大小，而哥白尼和維薩留斯則在準備以「天體運行論」和「人體結構」的偉大著述推出近代科學黎明期的曙光。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結構的特點，可以用它和社會結構的關係來說明。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政治形態和商品經濟相對發達的地主經濟決定了它的技術結構是「大一統」型的。理論和實驗結構則與以儒家爲正統、道家爲補充的文化結構相適應（圖十）。



科學技術結構 社會結構
圖10 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結構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由於大一統技術發達，中國成爲造紙、指南針、火藥和活字印刷技術的發源地，具有無神論、經驗論傾向的理論比起歐洲中世紀神學自然觀較爲先進，但是科學實驗、理論、技術三者基本上是互相隔裂的，它們之間不能形成互相促進的循環加速機制。這樣它們只能各自獨立地緩慢地進步着，甚至有趣於飽和的傾向。因此，自十六世紀以後，在西方科學技術革命興起時中國日益落後於西方。

六、原始科學結構及其社會化

我們雖然從科學技術結構的特點和是否產生循環加速機制來說明中國科學於十七世紀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但疑問還繼續存在。

就中世紀科學技術結構而論，西歐比中國更爲落後，那麼，爲什麼近代科學技術結構能在西方以基督教神學自然觀和經院哲學爲文化背景的社會中建立起來，而不能由中國的傳統科學技術結構轉化而來呢？當然，這和西歐十六世紀後封建社會瓦解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直接相關，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結構的長期停滯使得與其相應的科學技術結構也長期停滯在古老而幼稚的形態中。但是，科學技術結構畢竟與社會結構是不同的，近代科學技術結構的確立一方面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但還需要其本身內部的動力，因爲科學技術是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動。近代科學技術結構的成長包含着套正確合理的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以及相應的科學研究和技術的組織形態的發展。僅僅有經濟和政治的動力，還不足以說明它的形成。在近代科學技術結構三個子系統中，開放性技術體系的確立與政治經濟的關係最爲密切。要弄清爲什麼中國沒有建立開放

性技術體系，首先就必須探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這個問題更爲廣泛，我們在此不深入展開討論）。而即使回答了這個問題，也還是不能解釋近代科學技術結構何以不能最先在中國確立。我們已在第四節指出，開放性技術體系的確立，除了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結構外，還要有構造性自然觀與受控實驗系統爲基礎。我們打開科學技術史，可以發現，就科學結構而言，它們甚至比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確立還早一些。更進一步說，它本身就是摧毀西歐封建制度而爲資本主義制度開路的有力武器



元代科學家郭守敬。



東漢天文學家張衡。

爲了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科學技術在十七世紀以後落後的原因，我們必須去研究科學結構和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並在這種相互作用中來把握科學結構演化的規律，爲此，我們把討論的重點放在近代科學結構確立的過程上。

從整體上分析，可以把近代科學結構形成的過程分爲兩個階段加以考察。第一階段，人類首先在某一特殊領域，一個最容易發現這些正確認識自然原則的科學中發現了這些原則。第二步，這些原則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斷擴大其影響，爲社會上大多數科學家所接受。近代科學結構的形成好象晶體的成長一樣，它必須首先在一個最容易進行受控實驗和確立構造性自然觀的領域中建立一種類似於近代科學結構的體系。我們將其稱爲原始科學結構。其之所以是原始的，因爲和近代科學結構相似的規範雖然在這一學科中確定，但它沒有上升到一般原則，並且和具體學科的內容還不會分離，它的影響只局限在很窄的一個領域以及與這一領域有直接關係的學科。原始科學結構在合適的社會條件下，不斷成長，不斷擴張到越來越廣闊的科學研究範圍，最後形成科學結構，我們稱其爲原始科學結構的社會化過程。研究爲什麼西歐在十六世紀後能確立近代科學結構，就是去剖析原始科學結構的形成過程及其社會化的條件。

古代科學理論一般是宗教或自然哲學的一部分，實驗限於個人的肉眼觀察或簡單儀器的使用，技術雖然存在於生產實踐之中，但在大多數領域中，科學理論、實驗和技術三者是互相隔裂的。原始科學結構只可能最先產生於一開始就不能把理論、實驗和技術之間關係截然分割的特殊部門。顯然幾何學是第一個具備

這種條件的領域。在幾何學中，相應的實驗就是測量，空間測量無疑是一切科學實驗中最容易成爲受控實驗的，當古人發明第一根尺，用拉緊繩子作爲直線時，幾何實驗就開始客觀化和量化了。有了測量儀器，對於同一段距離，同一個正方形，同一個角度，不同人測量都得到同樣的並且可以億萬次重複的結果。而且，測量也是人類最早將實驗與技術結合起來的領域。技術和科學不同，它因純粹政治、經濟等實用目的而發展起來，所以，它是社會化的。古埃及尼羅河的定期泛濫而淹沒地界，使得土地測量成爲一種最早社會化具有經濟目的的技術活動，這種技術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在其可能達到的領域中），它不可能被嚴格地禁錮在某些特殊的測量對象之中。所以就幾何學而論，它相應的實驗結構和技術結構是容易建立起類似近代科學技術結構中的規範的。理論結構又如何呢？科學史告訴我們，歐幾里得幾何學正好是第一個邏輯構造型的理論體系。幾何理論中的沒有大小的點，沒有寬窄的線，沒有厚度的面，這些抽象和定義，的確成功地忽略了物體衆多的第二性質，而從空間結構的角度來把握研究對象。在今天看來，差不多一切古代科學知識體系都消失了，唯有歐氏幾何學是一個例外，我們關於現實空間結構的知識並沒有超出歐氏幾何的範圍，這恰恰表明，歐氏幾何體系是在科學史上第一個建立起滿足近代科學技術結構規範的體系。

在幾何學的實驗和技術結構中建立起類似於近代科學技術結構的規範是比較容易的，古代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都幾乎獨立地邁出了這一步。而建立構造性理論體系則比較困難。只有古代希臘人大致達到了這一點。圖十一表示歐氏幾何理論體系建立的幾個主要步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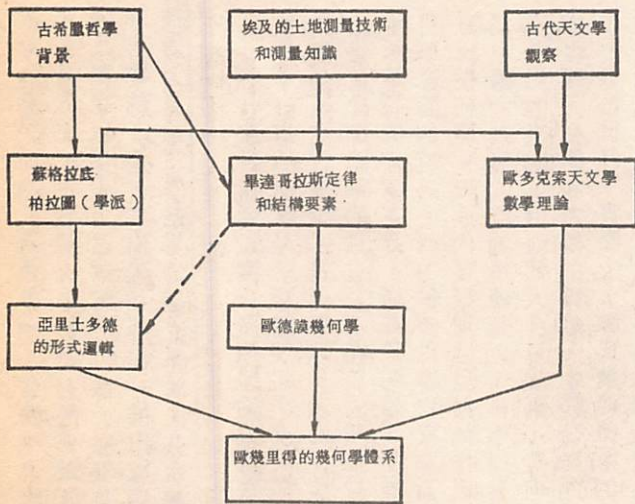


圖 11 原始科學結構的形成

。首先，古埃及發達的測量技術以及完備的測量工具爲它奠定了基礎。相傳愛奧尼亞哲學家米利都的泰勒斯到埃及游歷回來後，就想到可以根據土地測量的經驗規則，建立起一門關於空間形式的理想科學⁽¹⁾。接着畢達哥拉斯學派發現了勾股定理，并按照某種邏輯順利地把它已知定理排列起來，賦予理論體系以某種結構性要素。從公元前三二〇年歐德謨所著幾何學史的殘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理論結構又是怎樣逐步完善起來的。在理性主義的古希臘哲學背景之中，亞里士多德發現了形式邏輯，它一方面受到了正在形成的幾何理論體系的影響，另一方面，形式邏輯的發現無疑把邏輯和構造結合起來，以至於歐幾里得最後能賦予幾何學以一種明確的邏輯構造型理論體系。

在幾何學中形成原始科學結構方面，古代中國所走過的道路和古希臘是不同的。我們知道，就測量技術和測量儀器的發明而言，中國和西方一樣早，被認爲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神祇的女媧和伏羲是手中握着規和矩的。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的哲學起到了類似古希臘哲學對原始科學結構的孕育作用。春秋戰國時期的名辯思潮包含有初步的形式邏輯思想；「考工記」中出現了角度概念；中醫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天文學思想也有很大發展。確實，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原始科學結構在形成。李約瑟曾把「墨經」中有關的幾何定義和定理與歐氏幾何原本作了對比，發現歐氏書中的許多定義和定理和「墨經」中的表達一模一樣⁽²⁾。「墨經」幾乎是一本尚未完成的中國式幾何原本。但不幸的是，中國幾何學中構造性理論體系尚未確立就夭折了（圖十二），一方面，墨經並沒有完成原始科學結構的建造，更重要的是，隨着百家爭鳴時代的結束，中國建立了大一統封建王朝，號稱顯學的墨家衰亡了，墨經從此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而幾何學的知識被納入到更爲實用的天文學體系裏與測量技術中去了，獨尊儒術後帶來的理論技術化傾向無疑加強了這一結合。其結果是，中國的數學理論模式幾乎是以天文學和計算數學爲中心而形成的。對後世科學理論建立起示範作用的不是「墨經」，而是「周髀算經」。顯而易見，就原始科學結構形成而言，天文學遠比幾何學不利，古代天文學中實驗受控程度低於幾何學，在幾何理論體系本身不完備的條件下，由於天文歷法的實用要求會促使整個數學（包括幾何）朝着算術化的方向發展，其結果愈加不利於幾何學中構造性理論體系的成熟。

對比一下中國和古希臘數學與天文學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重要差別，古希臘的天文學主要是在幾何學影響和哺育之下發展起來的，而中國則反過來是天文曆法影響着數學的發展。在科學史上它表現為希臘科學是幾何式的而中國則以代數算術見長。就古代科學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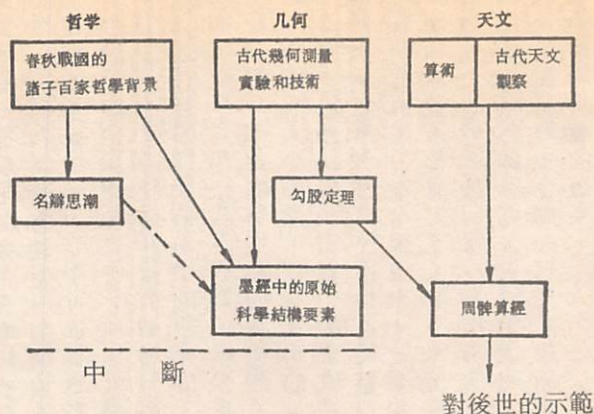


圖 12 中國古代科學示範體系的形成

本身的發展而論，這種差別不會帶來太大的損害。實際上，古希臘大多數幾何學成就，中國古代數學家都用自己獨特的方法（主要是算術和代數的方法，如出入相補法）推出來了。但是對於原始科學結構的建立來說，其含義就大不相同了。

爲什麼古希臘以歐氏幾何體系爲代表的原始科學結構的出現是這樣重要呢？就人類整個科學知識內容來說，幾何學只是滄海一粟，歐氏幾何理論體系的意義並不在於人類在幾何學中所掌握的知識本身，而在於明確了一種建立科學理論的模式。西方很多科學史家都看到了歐氏幾何體系對近代科學理論發展的作用，認爲中國的幾何知識的單薄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出現的原因，但他們大多只看到了幾何學的內容對天文學和力學的貢獻，李約瑟對此提出了中肯的批評。實際上，歐氏幾何體系的作用在於它集中地代表了原始科學結構的理論雛形。我們在後面將指出，它爲近代科學結構（主要指構造性自然觀）的建立起到了某種模板的作用。而這種模板在科學史上只能最先在幾何中建立，而不能在別的學科中建立。醫學由於其對象過於複雜使得實驗很難受控，天文學理論由於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只有當原始科學結構在幾何學中形成後才能在其中建立類似幾何的理論體系（古希臘正是如此）。否則，它會長期停滯在曆法算術和混沌的原始宇宙模型之中。化學、生物學等由於它們在古代理論、實驗、技術三個系統的分裂和不完善，形成原始科學結構更爲困難。歷史表明，中國科學理論中的技術化傾向、春秋戰國後期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墨家學說的流產，使得原始科學結構的確立失去了歷史的機會，它對以後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

（未完待續）

註釋

- (1) 胡菊人：『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文化生活出版社（香港），一九七八，第四十一頁。
- (2) 胡菊人：『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文化生活出版社（香港），一九七八，第四十頁。原圖題爲「中西科學交流期與融合期的分類示意圖」，圖1是據此簡化後繪制的。
- (3) 曲綏由科學技術成果記分累加取對數而得。公元5—6世紀，隨着古希臘羅馬文明的衰落，古希臘科學成果幾乎被遺忘，圖3中5世紀作了累加中斷處理，古希臘科學成果是大翻譯後重新累加到西方增長曲綫中去的。
- (4) 劉安『淮南萬畢術』，『南書書院叢書第三集第四種』。
- (5) 維納：『人有人的用處』（陳步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八，第十七頁。
- (6) 『宋史』卷一七九「食貨誌下」，中華書局版第十三冊，第四三四九頁。
- (7) 王禎：『農書』卷二，農業出版社，一九六三，第五二一頁。
- (8) 阮元：『疇人傳』卷四六，商務版，第三冊，第六一〇頁。
- (9) 張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二六五頁。
- (10) 梅榮照：『明代以後中國傳統數學落後的原因』，『中國科技史料』，科學普及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十五頁。
- (11) W. C. 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五），第八二頁。
- (12)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三卷，科學出版社，第二〇三—二二二頁。

鄧小平欲取消十大軍區

(國內) 柳平

最近，從北京機關大院裡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鄧小平準備解散十大軍區編制，所有野戰部隊都歸中央直轄。這個消息無疑是反映了最近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內的變化動向，對軍內的權力架構以及政治局勢的走向，都會有其深遠的影響。

十大軍區的形成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軍隊的分佈和結構，經歷了好幾個重要的階段。首先是國內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分成四個大野戰部隊（彭德懷、賀龍的一野，劉伯承、鄧小平的二野，陳毅、粟裕的三野，林彪、羅榮桓的四野）和十幾個游擊縱隊（如東縱、珠縱等等……）。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五十年代早期，就取消了「野」和「縱隊」的稱號，改成以地區來劃分，以軍分區為稱號（如華南軍分區轄華南幾省，葉劍英為華南軍分區司令員），四個野戰部隊的權力開始分散。五十年代中的最重要的變動，就是再進一步把軍分區變成以城市命名劃分部隊的管轄範圍，於是產生了十大軍區。

十大軍區計有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福州軍區、蘭州軍區、廣州軍區、武漢軍區、成都軍區、昆明軍區。另外，新疆軍區也是獨立單位。十大軍區都轄二至三個省份，例如廣州軍區轄廣東、廣西、湖南三省，瀋陽軍區轄東北三省。這些大軍區屬下又按省份來分省軍區，但省軍區只負責地方治安部隊和民兵師，並無實際的大作戰能力。擁有綜合作戰能力的野戰部隊都歸大軍區統轄。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真正擁有兵權的是十大軍區的負責人，以及各兵種、軍種（例如空軍、海軍、裝甲部隊、鐵道兵部隊、一炮、二炮……）的負責人。

十大軍區司令員舉足輕重

大軍區轄區內一般都有若干個軍的兵力，例如文化革命期間，廣州軍區轄內就有四十二軍、四十七軍、五十五軍等好幾個野戰軍。有兵就有權，因此，軍區司令員都肩負對內維持政局安定，緊急時出兵平亂討逆的責任，對外是封疆大吏，宣戰時就是前綫指揮。

例如文化革命時期，四人幫的黨羽在上海

準備兵變，南京部隊就移師東進，迫使上海警備司令和民兵就範。八十年代新疆建設兵團的知識青年鬧事，蘭州部隊就移師西向鎮壓。七十年代初的中蘇珍寶島之戰，七十年代末的中越邊境之戰，瀋陽軍區司令員和廣州軍區司令員，就成了當然的前綫總指揮，指揮的得當失宜，決定了整個國家的命運。

十大軍區司令員的權勢顯赫，不單在於個人地位的重要，還在於長期盤踞一方，培植了自成一體系的勢力，盤根錯節於所轄管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前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事敗倒台，中央軍委為清除他在廣東、廣西、湖南三省的黨羽舊部，歷時幾年，調動了好幾次的負責人，仍然未能乾淨。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近二十年來的政局，雖然表面上還是高唱着「黨指揮槍」的調子，實質上却是一部「槍左右黨」的近代史。毛澤東之所以敢發動文化大革命，排斥劉、鄧，並不把空有頭銜的「元帥」們放在眼裡，是因為他確信大軍區的司令員們是忠於自己和林彪的。林彪之所以敢謀圖在廣州另立中央，是因為黃永勝苦心經營廣州部隊十幾年。四人幫事發，十大軍區司令員電文向中央表忠，無疑是

穩定政局最重要的一步棋，華國鋒被鄧小平一推就倒，政方的原因不說，軍方的因素就是十大軍區司令員無一是華的部下，大家瞧他不上眼。

基于上述的種種理由，黨中央內老謀深算的權術家們歷來都把十大軍區司令員的位置看作是兵家必爭之位，特別是毛澤東，更是苦心經營幾十年，確保坐在這些位置上的人是忠于自己的。原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屢次揚言，誰要反對毛主席，他就帶兵打到北京去。這樣的忠心耿耿的「老八路」，佔了當時的軍區司令員的多數，難怪國家主席也好，元帥也好，都奈跡近瘋狂的老毛不何。據說，毛病逝前，曾召十大軍區司令員到榻前密議，這些「遺詔」至今未為外人所知。鄧小平一直對此事耿耿於懷，但又無從發作，只好一直對軍方讓步三分。



十大軍區示意圖

鄧復出後的策略

但是，鄧小平也不是個弱者，他深知自己在軍方的勢力遠遠比不上毛，因此採用極其迂迴的策略，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目的。

他運用了兩個成功的戰術。

一曰調換。第一次在七十年代的末期，他利用原二野系流的勢力和對他有好感的一些司令員，以孤立了親林彪四人幫的司令員，對十大軍區司令員突然來一個大對換，把丁盛調到了南京，把劉興元調到了四川，命令隨身只帶警衛員，不得帶任何部屬，到任一年後才把他們抓起來。既避免了內亂外逃，又穩定了政局。跟着在八十年代他排除了華國鋒，取得了軍委主席的大權後，又進行了十大軍區司令員的大調換，排斥了那些親葉劍英，同情華國鋒的勢力，讓凡是派在軍內的地盤動搖，為下一步大規模地開展經濟改革消除阻力。總而言之，在幾年裡，把十大軍區司令員換得團團轉。這個方法厲害得很，軍區司令員再不能像文化大革命前一樣，在所轄區裡長久經營，培植自己的黨羽勢力，把它變成「針插不進，水潑不入」的獨立王國。這種調換的戰術謂之「浮萍」政策。

二曰「年輕化」。近年整軍的最大目的之一，就是請那批「忠于毛主席」的老八路走路，這批人大都是跟毛澤東爬雪山、過草地的大老粗，文化程度不高，對黨對毛澤東功勞却大，屁股坐在司令員的位子上，肚子裡却是一肚子對「修正主義」的不滿。因此，整軍大量提拔年青幹部，特別是提拔對鄧胡政策有好感的青少壯派和技術幹部，可以架空那些趕不走的



華國鋒靠「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上台，由于沒有軍權，很快被整垮了。

土八路。最近，中央軍委命令，軍師級幹部年紀超過五十歲的全部退離，可以說是把這種戰術發揮到了頂點。可想而知，軍區司令員下面一級就是各軍軍長，軍長都不是老部下了，司令員就算是五台山出來的，也要不出幾套「拳腳」了罷？這種戰術可以命名為「架空」政策。

鄧小平的這兩種戰術的運用，可以算得上是極為成功的，一方面他進行得很慢很穩，不愠不火，一方面給司令員們留了面子，一方面又堂而皇之，大義凜然，讓他們無話可說。因此，八年下來，軍內人事變遷，幾乎面目全非，却無人公開發難。不知不覺中，頑固派的老頭子們已漸漸大勢已去，幾乎無還手之力。

仍有隱患

然而，雖然不少中外的軍事政治家們對鄧小平的權力手腕五體投地，雖然軍內的「司令員」們正在節節退讓，但真正心知肚明的，却是鄧小平自己，因為，只有他才真正感到潛在的威脅。

首先是，並不是每一個司令員都那麼服服貼貼，相反却是刺蝟頭——難刺得很。第一個是李德生，此君坐着瀋陽軍區司令員的位子，一坐就是十多年，千調萬調不出來。硬的軟的都不吃，所在的位置又面臨蘇修，搞不好又怕他反過去，就像個燙手的山芋。再一個是許世友，雖然把他從南京軍區調了進京，然而這個南京部隊的老司令經營軍區幾十年，滿營上下皆是部屬，又是保衛毛主席，打倒四人幫的大功臣，鄧小平也讓他三分，胡、趙更不在話下。前段時期對「修正主義」一生氣，就跑到南京，引起許多閒言閒語，近來又嚷着要重掌中越邊境戰事的軍權，搞得滿朝上下都頭痛。還有諸如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前幾年被葉文福一首詩刺了一下，大動干戈，聯合起十幾個將軍上書，給改革派難看，最近更和自己在武漢軍區的老部下串同一氣，公開發表文章，為自己當司令員時的武漢七·二〇事件翻案，鬧得武漢地區原兩大派群眾緊張兮兮。總之，這些老司令員們個個都是身懷「十八般武藝」，不是不跳，時辰未到而已，一個鬧不好，改革派們會吃不了，兜着走。鄧小平如此精明的人，如何會看不到？

眼前這幾個令人憂心忡忡的老「寶貝」不說，就是假以年日，把十大軍區司令員的寶座

和平過渡到少壯派手裡，仍然未能消除潛在最後的隱患。

這就是因為大軍區司令員的權勢，如前所述，實在太大，「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就算是改革派培植出來的人當了軍區司令員，也難保他不變。「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更何況「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遠在邊陲，手頭上有幾十萬人的部隊，進入鄰近小國簡直是如入無人之境。一旦反將起來，那裡來得及制止？



鄧小平想把軍權轉給胡耀邦（左）。

再說，現在鄧主任尚坐鎮得住，一旦鄧百年之後，試問在朝的改革派，包括胡耀邦、趙紫陽，誰能鎮得住這些將軍們？

一了百了、一勞永逸

「若無遠慮，必有近憂。」鄧小平真不愧是毛澤東之後的第二號強人，他在軍內局勢頻告捷聲中，竟然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在今年年初大規模整軍宣告「圓滿結束」之後，緊跟着就想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體制改革最石破天驚的一步，乾脆解散十大軍區，把軍事大權集中到北京來。

這次軍隊改革的方案是：(1)大軍區解散後，各地野戰軍直歸中央軍委統轄；(2)原大軍區所轄的特種部隊，都劃歸為相應的特種兵總部，如原南京軍區空軍所屬的部隊，一律歸北京的空軍司令部指揮。現在，軍委的各特種兵部隊包括空軍、海軍、炮兵、第二炮兵、防化兵、鐵道兵、通訊兵、雷達兵等。

取銷十大軍區後，這些部隊總部的權力都相應增大。

據傳，目前軍隊頭頭們正在頻頻串聯，各種意見在此關鍵問題上互相交鋒。鄧小平的設想是否成功，還要等待一段時間才能斷定。

中國最頭疼的問題始終是軍權問題，這是中共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必然結果。鄧小平年紀已過八十，他能否將軍權順利地轉移給胡耀邦，海內外都極為關切。為了削平軍隊山頭、防止鄧辭世後大軍區造反而出現內戰局面，鄧小平已決定對軍隊系統進行大變動，取消傳統大軍區編制。發展趨向如何，必將吸引研究中國軍事和政治的專家們的注意。

美國竹聯幫首領白狼(張安樂)披露

刺殺王炳章的交易

刺客背景為中國大陸

刺殺理由為王「叛國」

本刊綜合整理

轟動世界的江南命案至今尚未完全落幕，却又爆發了王炳章曾被人買凶刺殺事件，而且是發生在江南被刺以前。所不同的是一個被刺身亡，一個預先得警告而倖免。此二件事雖沒有直接的關連，但却讓人對中國走向民主、法治的希望，又一次被抹上了暗淡的色彩。

白狼是在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在紐約容閣小學紀念江南的公聽會上，披露王炳章曾被人謀刺一事的。

前些日子，白狼曾在加州一次江南事件座談會上披露說，他還知道另一個在美國人被人預謀刺殺的內幕。其後，各界紛紛猜測，加州華人作家陳若曦、台灣作家柏楊等均被推斷為目標人物。這次白狼在紐約的披露，揭開了謎底，澄清了外界傳說。

在白狼披露此事後，中國民聯常委林樵清起來證言。在其證言中，強調只敘述事件的經過，不做任何猜測和判斷。以下為證言全文及白狼的補正。

首先，我要說的，只是我這方面所知道的事實和事件的經過，並不做出任何的猜測和判斷。如果我所說的和張安樂先生所了解的有所出入，還請張先生加以更正。

去年，一九八四年九月三十日紐約時間凌晨二時，我們接到中國民聯洛杉磯代表張愛急電，謂洛杉磯的張安樂通知他，竹聯幫正式接到一筆生意，要買王炳章的頭，代價是五千元。要我們嚴加防範。我們得到通知後，立刻商討對策。除了通知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外，並採取了其他各種防範措施。聯邦調查局隨後展開調查。爲了此事，張安樂先生曾遭受了不少的不便，我們覺得很抱歉。

就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江南案發生了，我們感到壓力驟然減輕。因爲我們了解，任何人再做同樣事件的機會不大。因此，我們認爲，江南先生之死是代替了王炳章之死。

後來我們在這一切安排妥當之後，我於去年十二月六日爲此事被派往洛杉磯。在洛杉磯，我見到了張安樂先生和一些其他人。我曾要求去見那位買兇者，但張安樂先生基於江湖道義的理由，沒有讓我見到他。我們不是江湖



四月十四日，在紐約容閣小學紀念江南的公聽會上，白狼(右一)披露刺殺王炳章一案，林樵清(左一)起而證言。右二為江南遺孀崔蓉芝。

中人，不了解幫派的規矩，但我仍尊重張先生的做法。並由衷感激張先生能在得到消息後立即通知我們，免除了另一場江南式的悲劇。

在洛杉磯時，張先生曾告訴我有關於買兇者的兩個背景。一、他是由中國大陸來的。二、他要殺王炳章的動機是認爲王炳章是「叛國份子」。這就是我們到此爲止所知有關買兇者的全部情況。至於真實情況到底是如何？是左派

還是右派？是個人行為還是官方行為？除非有更進一步的證據顯示，我們將不作出任何猜測和判斷。

很多人會問我們，為什麼一直不將此事公諸社會大眾？我們是基於兩個原因：

一、不要影響我們民聯其他成員的情緒。
二、我們和張安樂先生的默契並不夠，而且也並不了解江湖上的規矩。如果我們單方面講出去，而得不到張安樂先生的證實，會讓人覺得我們有不實在的感覺。因此，我們決定和許多事情一樣，低調處理此事。並決定，除非張安樂先生先講，我們不講。如果張安樂先生講了，我們就加以證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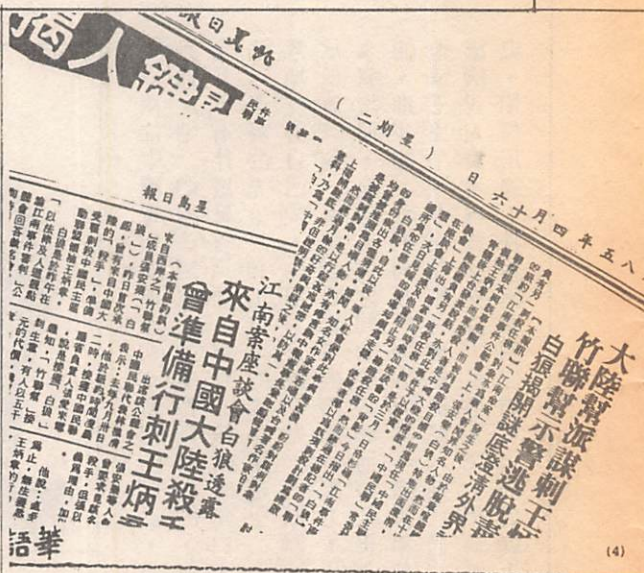
這就是整個事件的過程（我知道的）。在這裡，我們要向江南夫人致以深切的哀悼。我們私下知道，江南的血是為王炳章流的。如果當初是王炳章先被刺倒，江南的就被刺就可避免了。當然，我們還要向張安樂先生致謝，沒有張安樂先生的深明大義，今天，躺在血泊裡的，不是江南，而是王炳章。

最後，我覺得，從江南命案和王炳章被買的事件來看，中國要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還有一段長長的距離。

張安樂隨後更正兩點：

一、不是竹聯幫接到要刺殺王炳章的生意。是他聽到別人要刺殺王炳章而告之張愛。竹聯幫不會為錢而殺人。

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他在洛杉磯跟林樵清講的那個欲殺王炳章的人不是買兇者，而是行兇者。



「王炳章」會被刺倒嗎（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南思蜀

據自稱是「竹聯幫」成員的張安樂（白狼）證實：確有來自大陸行兇者曾經受僱，準備刺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王炳章。
王炳章博士是中國大陸的公費留學生，是學醫的，如果他當一名醫生，可以治病救人，也可以有很豐厚的收入。但是為了中國的民主、法治和人權，為了祖國的繁榮和統一，他放棄了個人的小我利益來從事「中國之春」的民主運動。

和其它革命運動一樣，「中國之春」的民主運動，也是有人不喜歡的，有人反對的，甚至想收買刺客，用刺殺的方法來除掉他。

在歷史上有過許多行刺的例子。但是事實證明：用行刺的方法來排除異己，不僅是笨拙的，而且是不得人心的，往往有反效果。

在孫中山先生初期領導的革命運動中，並不因吳祿貞、宋教仁遇刺身死而削弱國民黨的力量，正相反，後來倒台的是袁世凱。美國總統林肯肯、肯尼迪被人暗殺，而美國人民更加懷念他們；美國民權領袖黑人金牧師遇刺身亡，反而使民權運動更加發達，種族主義者更加受人唾棄。最近發生了江南被害案，因為國民黨的情治單位受到牽涉，使國民黨大傷腦筋。如果說刺殺江南是想報效國民黨的話，這真是幫了一個大倒忙。

可以斷言：如果王炳章被刺，將會使人們更加同情他；殺了王炳章決不能撲滅「中國之春」的民主運動，反之將有更多的王炳章起來繼續和完成他的民主事業。我們希望準備刺殺者以歷史為殷鑒，不要出此下策。

白狼在座談會中宣稱 有人出錢要殺王炳章

（本報消息）「白狼」張安樂在「江南命案座談會」中，公開發表在座談會中，宣稱：有人出錢要殺王炳章。張安樂說，他在洛杉磯與公報社、民主黨人士對談時，有人出錢要殺王炳章。張安樂說，他是在座談會中，宣稱：有人出錢要殺王炳章。張安樂說，他是在座談會中，宣稱：有人出錢要殺王炳章。

白狼在座談會中宣稱，有人出錢要殺王炳章。張安樂說，他是在座談會中，宣稱：有人出錢要殺王炳章。張安樂說，他是在座談會中，宣稱：有人出錢要殺王炳章。

崔蓉芝指江南之死 已成華人共同負擔

（本報消息）江南命案發生後，華人社區中，對江南之死的看法，不一而足。有人認為，江南之死，是中國民主運動的犧牲品。有人認為，江南之死，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障礙。有人認為，江南之死，是中國民主運動的轉捩點。



背影指責某報 歪曲他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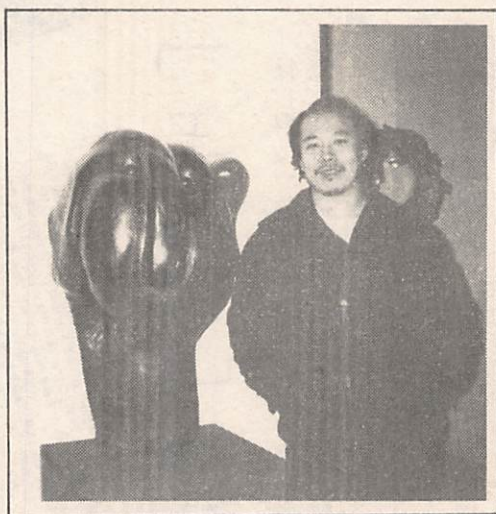
王克平、李爽在國外嶄露頭角

(中國之春駐歐記者) 黃忠豫

經過千難萬險，王克平和李爽總算在國外立住了腳，在紙醉金迷的巴黎大都市，他(她)們並沒有沉醉于燈紅酒綠之中，他(她)們牢牢記着「在一個閉鎖的國家曾被壓抑的藝術，沒有別的出路！只有做！」他們堅定地相信：中國除了需要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之外，也一定會需要現代化的藝術流派。社會的變革是立體的，工業、經濟、政治體制、思想、文化藝術缺一不可，中國社會的民主和現代化需要有一個廣闊的戰綫。

兩位青年藝術家帶着賭氣、志氣和才氣，日以繼夜，苦攻藝術之門，他們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社會交際，不貪求虛名，一邊認真學習國外的藝術新流派，一邊刻苦創作，在短短的一年多內，王克平先後創作了十幾樽雕塑藝術品，分別參加了在巴黎岡巴類王宮舉行的「國際藝術作品展覽會」和在法國巴黎「蓬皮杜國際藝術中心」旁舉行的法國「人像雕塑大展」，並且舉辦了自己的作品室展。

女畫家李爽，在國外的創作生涯中也初顯才華，她的作品有兩幅被選中參加在岡巴類王宮舉行的「國際藝術作品展」，並在藝術品雲集的塞納河畔舉行了自己的畫展，他(她)們的作品受到了許多中外朋友的欣賞，並受到了國際藝術界的重視，許多人在作品前照了像并獻了鮮花。



王克平在法國展出作品

兩位中國青年藝術家初步取得的成就，是與他(她)們的法國親人的支持分不開的，無論外界有什麼風言風語，善良的法國青年白天祥(李爽的先生)和王克平的妻子總是全心全意地支持自己愛人的努力，他(她)們默默地承受着家務、財源和卑鄙者的冷眼的壓力，用事實證明，異國人民之間的戀愛和通婚是正義的、進步的。我們向奮鬥中的僑外中國青年藝術家王克平、李爽和無私地支持他(她)們的法國親人表示祝賀和支持，相信人民，相信歷史，相信正義！并希望看到你們更大的成就！

法國的「中國人權演講會」

(中國之春駐歐記者)

黃忠豫

曾獲得世界諾貝爾和平獎的「國際特赦組織」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在法國巴黎舉行了一次：「中國人權問題演講會」，近百名中、法學者和知識份子出席了會議。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法國聯絡站的成員參加了演講會，在會議上出售了探索中國民主道路的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并向與會人士贈送了中國民主運動年曆。

在法國的民運戰士林希翎女士在會上發表了演講，她以親身經歷和見聞，揭露了中國對政治和思想進行殘酷迫害的事實。她呼籲一切正直、善良的國際組織、國際友人和愛國同胞們關心中國人民的人權和民主問題，敦促中國政府釋放魏京生、陳爾晉等被捕的民運人士。但是她感嘆討論關於中國的人權問題的會，不能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召開，而只能在外國召開，而中國的人權問題要由外國人來呼籲！

「國際特赦組織」在法國的負責人也發表了演講，他提供了該組織所掌握的「中國人權問題」的材料及該組織就釋放魏京生等民運青年《給中國政府主席李先念的信》，會議還邀請了中國問題學者普極欄作了演講。

「我們要和人一様生活！」

——請聽城市待業青年的呼聲

——本刊編輯部

最近，中國民聯總部接到由出國人員帶出來的數份城市待業青年和農村插隊青年的呼籲書，要求中國之春雜誌發表，以引起海內外對中國城鎮待業青年問題的關注。

受待業青年委托，把這些呼籲書轉交到中國民聯總部的出國人員，向我們反映了如下情況：

一、據有關方面估計，當前城鎮待業青年（失業青年）總數全國達二千多萬。

二、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待業青年，已從各種渠道瞭解到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消息，他們深受鼓舞，希望中國民聯能迅速壯大，有所作為，在改變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三、有的地方的城鎮待業青年已自發組織起來，成立了小組，要求中國民聯總部承認他們為中國民聯的分支組織。

四、尚有一批城市插隊青年，由於沒有「後門」，仍未能回到城鎮。

五、城市工業改革後，待業青年的處境更為困難。他們原先在家等待上級的分配，現在，這種期望已完全化為烏有，因為一些國營企業也面臨裁員、甚至關閉的問題。原來，各城市都有一個「待業青年（知識青年）辦公室」，負責回城或留城的知識青年的工作分配。如今，「知青辦」已不起什麼分配待業青年工作的作用，代之要求待業青年自己謀尋出路，如聯合起來做小生意等。問題在於，這些待業青年大部出身於平民階層，既沒錢、又沒權、也沒有「後門」，否則，他們也就不「待業」了。看看那些特權階層的子孫，有幾個找不到滿意的「工作」而待業呢？待業青年組織起來的「小公司」、創辦的小生意，由於沒有特權階級的後門，難以貸到款，難以搞到搶手貨。除個別人有獨到的能力和手藝之外，待業青年的「公司」和生意，多半沒什

麼競爭，很快就會被有強大後台做支柱的高幹子弟組織的「公司」和生意所擠垮。

在這種「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下，待業青年沒有前途、沒有希望。很多人三十多歲還靠父母生活，更談不上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甚至有些待業青年盼着世界大戰，以便改變環境。個別待業青年鋌而走險，走上了犯罪道路。然而，絕大多數青年在坎坷的困境中，在一系列打擊下，覺醒過來，逐步認識到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性，有些走上了民主運動的道路。

我們希望國內有關當局認真解決待業青年的問題。我們有如下建議：

第一、在私人企業的僱工方面，一定要打破僱工五人的限制。否則，僱員受限，私有企業就發展不起來，無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第二、可考慮全面設計、修築全國公路網，此項工程可容納大批待業青年。進行此項工程的前提——糧食問題，已經解決。

第三、政府制定法律，給待業青年辦的「公司」和企業在貸款、商品供應、原材料供應等提供市場方面，給予優惠待遇。

第四、擴辦函授教育和中專、中技教育。

待業青年問題，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處理得不好，易引發爆炸性事件，請北京政府三思之。

下面選擇發表的三篇呼籲書，是國內待業青年委托出國人員轉交中國之春編輯部的。為真實反映國內待業青年的心聲，我們未對他們的作品做語言上的修飾，僅把明顯的錯字錯句，稍為修改一下，以便讀者理解。

「我們要和人一様生活！」請聽聽待業青年的呼聲吧！

待業何時止

我們這出生於五十年代後的年輕人，經過歲月的交替，都已是卅歲開外的人了。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儘管走過多麼艱苦的旅程，到如今給我們的仍是「待業」！

在我們幼小之時靠父母養育，不久來了文化大革命。我們響應了黨的號召，奔赴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在城裏吃閒飯。北大荒的十年，無情的奪去我們的青春年華，學業荒廢了，前途沒有了光明，今天我們回到城裏，又開始了新的待業生活，朝夕盼望招工、盼望工作，我們總不能讓父母養我們小，又養我們老吧！我們也要生活，我們也有兩隻手，不能總吃閒飯；我們要自食其力，我們又不願意去做那傷天害理的事——走犯罪的道路。但我們的出路在哪裏呢？我們這些問題，又有誰為我們解決呢？真是盼工作而眼望穿，希望在明天，年年失望年年，為工作望斷肝腸！

我們大聲疾呼：「待業何時止！」

待業青年的呼聲

真理在哪裏

我是一九七〇年高中畢業以後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十二年的寒窗苦，現在拿起鋤頭來種地。我在農村裏勞動了幾年，年年掙的工分連口糧都領不回來，還要欠隊裏的債。我想我在農村已經勞動了五、六年了，和我一起下放的青年人都大部份調回城裏去工作了，他們大部份的父母都是有權有勢的大幹部，有人幫忙，所以能調回去。我想我已經在農村勞動了幾年了，從各方面我並不如他們那個人差，所差的是我的父母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沒有人給幫忙。我再三請求上級領導要求調回去，但他們不但不給幫助解決，還說我違反了計劃生育計

劃所規定的一對夫妻一個小孩的規定，因此不給調動。可為什麼和我一樣的青年也有二個小孩的，不但他本人給安排了工作，而且還連他的愛人都給安排了工作，為什麼我就不行呢？雖然現在已經換了多少個朝代，但實際上還是和過去一樣。就像大家所說的：「有權有勢的孩子就有門，」上面有人能走後門，無權無勢的沒有門，看來我這無權無勢、上面無人的，是一輩子沒有門了，只好這樣一輩子了，我大聲喊道：哪裏有真理？真理在哪裏？

一個知識青年的呼聲

給我們工作

我們是一代非常不幸的青年人。在文化革命時候，我們造反革命，後來我們又被強迫趕到農村、山區、邊疆，在那裏，我們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過着十分艱苦的生活，遠離父母和親人。我們在那裏每天像牛馬一樣的幹活，日未出來，我們下地去勞動，日落我們回來，每天要幹十幾個小時的活。我們都是十五、六歲的青年人，要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下生活。有些人生了各種病，我們在那裏忍受着非人的生活。所以在無法忍受的時候，我們開始返城和親人團聚。可是我們返城之後又遇到了新的不幸。因為我們要生活、要工作，可是我們在城裏沒有工作，數十萬青年人失業。在生活逼迫之下，有些青年走向了犯罪道路。因為在他們無法生活的時候，不得不去幹壞事情。這並不是青年人自己願意走向罪惡之路，而是他們失業造成的。我們青年人都是人，我們每天在死亡的道路上掙扎着。可是有些人生活在幸福的海洋裏，過着甜蜜生活。我們對此要抗議，要造反！我們要為這代不幸的青年人而戰鬥，會吃青年聯合起來，為我們自由、幸福、生存而戰鬥。給我們工作，我們要工作，因為我們是人，我們要和人一樣生活。

「會吃」青年聯盟

台獨之路

(台灣旅美作家)阿修伯

一、台獨的正面價值

今天的華人分爲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新加坡，大家互相比較互相切磋，看看誰搞得更好，只有貨比貨才能促進好貨色。正由於台灣新「走資派」的存在，同是華人的中共才知道它自己那一套並不是絕對真理，於是開始走務實修正開放路線，近些年中國大陸才漸漸有了起色像個樣子，這不正是華人分立的好處嗎？

二、台灣人的委曲

今天台灣的人口將近一千九百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僅次於孟加拉的國家。這一千九百萬人中，原住土著的高山族人僅餘約三十萬，又可細分爲十族。高山族文化落後生活原始，四百年來受盡了外來異族的侵掠、屠殺、驅趕、剝削、壓榨、欺騙、奴役，至今其命運仍然是十分悲慘，男的多半從事最辛苦最危險的漁船船員、礦工工作，女的多半淪落風塵。這四百年來，他們的生活充滿血淚，他們與美洲的紅人（印第安人）境況十分類似。

雖然高山族是真正的台灣人，但他們的聲音十分微弱，今天他們但求能改善其生活，能受到絕大多數漢系移民的公平待遇於願已足，至於台灣的政治命運，台灣的前途，他們已無力插手了。今天能理直氣壯的關心台灣的命運，主張台灣的未來，呼籲「台灣獨立」「台灣民族自決」的乃是佔台灣人口大半數（約一千二百餘萬）的漢系福佬人（即中國閩南人）。

福佬人自明朝末年至清朝末年，大量自中國福建南部漳州、泉州、廈門移民台灣。其移民原因主要還是因爲中國的戰亂饑荒，其移民過程也是充滿了血淚。明朝清朝都曾實施嚴厲的海禁，片板不得入海。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不是給朝廷抓去砍頭就是葬身於洶湧的台灣海峽。僥倖到達台灣的還要面對兇悍的原住民和疫病，又有荷蘭、西班牙、美、法、英等西洋殖民者和日本東洋殖民者的侵掠、屠殺、壓榨、奴役。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終於有來自中國祖國的同胞到台灣接收。然而，經過五十年的隔離，台灣人看那些中國同胞就像陌生人一樣，而那些中國同胞更是不爭氣，貪污腐化朽爛無能，表現惡劣之至，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變，台灣人受到了無情鎮壓，三十多年過去了，這一股怨恨仍然存在於許多台灣人的心中。

時至今日台灣的政權還是掌握在那些「中國人」手中，再看看中國大陸那十億同胞渾渾噩噩，專政的共產黨野蠻落後，強橫霸道胡搞亂來。思前想後，台灣人愈想愈委屈，愈想愈不願意做中國人，爲什麼台灣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三、獨立的障礙

約三百萬人口的第二台灣人——客家人，也是和福佬人一樣自中國大陸移來台灣，一切福佬台灣人的委屈，客家台灣人也一一承受過。他們多半來自廣東梅縣、海、陸豐等客家縣份。因爲生活、語言、風俗與福佬人有差異，他們更多受一層福佬人的欺壓。客家頑強民風的保守農村性格與活潑變通的福佬人商業性格（泉州是中國歷史上著名商港）大大不同。



真正的台灣人—高山族

客家人始終自認為是正統的中原漢族，正統的中國人。即使他們也對國民黨共產黨的統治感到失望，但因此而要客家人斬斷中國的根，要比福佬人困難得多。在滿清時代，福佬人多次抗清起義，客家人也都幫助清廷平亂，使台灣重歸中國版圖。這是因為福客移民台灣有許多矛盾爭戰，人少勢弱的客家多半吃虧，因此對於福佬人一直心懷疑懼。即使時至今日，傾向於中國統一的客家人還是比傾向於福佬台獨分裂的客家人要多。把福佬客家連結在一起的是漢民族這個共同意識而不是「台民族」這個意識。

至於另外三百多萬戰後來台的外省人，他們被激烈台獨人士目為外來異族。他們在台灣，根還沒有牢固扎下。第一代國民黨政大員至今仍掌握台灣政權，但他們對未來台灣前途並沒有什麼信心，也沒有什麼「光復大陸，解救同胞」的雄心壯志。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大多移民海外，將來情勢有變，很容易就遠走高飛。剩下來是可憐的中下外省人，他們成為台獨仇恨分離意識者發洩怨氣的對象，在政治上是代罪的羔羊在經濟上是無根的飄萍。

現在台灣私營公司招請員工多半明文規定限用台灣籍，公然進行地域歧視。如果有美國公司限用白人，黑人求職者告它違反民權法案就夠它受的了，但在台灣外省人却一點保障也沒有。這些外省人走投無路，是亞細亞的新孤兒。將來局勢有變，或者中共武力統一，他們毫無疑問會像滿清時代的台灣客家人一樣去做「義民」，裡應外合幫助中共。雖然他們之不喜歡中共就像客家人之不喜歡滿清一樣。當年吳三桂引異族的滿清入關，後世罵之為漢奸，今日在台外省人引同族的中共統一台灣，後世必贊之為民族英雄。

四、結果預測

面對台灣內部對獨立運動的阻力，島內外台獨人士不但不想化解，反而更加走火入魔的以福佬為基礎大力提倡台灣語言（福佬話）台灣文化而稱之為「台灣人意識」並宣揚「台灣民族」的優秀遠非「中國民族」所能比。與「中國民族」劃清界綫，絕不與「中國民族」分享光榮（如美國小姐梅仙麗事），這是數百年來南方中國人分類械鬥的惡劣傳統。其情況之熱烈有點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提倡的「



這是一九八〇年福建木偶劇團訪美演出掌中戲。四年後，台灣小西園劇團也來美演出掌中戲。台獨人士所云「台灣文化」，哪一種不是從大陸傳去的？

日耳曼意識」和日本軍閥的「大和魂」精神。新加坡早已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國家，但他們仍然提倡說中國標準華語（普通話）宣揚儒家思想。在政治上法律上他們是新加坡國籍，在民族文化上他們從不否認他們是華裔華人。美國總統雷根回愛爾蘭尋根受到血濃於水同胞們的熱烈歡迎，難道將來「台灣國」的總統就不想回中國漳州、泉州去尋根了嗎？難道台灣人比美國人要無情無義嗎？

福佬台獨人士恨不得斬斷他們的中華根源，他們自稱是「台裔」否認是華裔，並說其文化是文明進步，光明優秀的「移民文化」「海洋文化」，而今天在台「中國人」（外省人）的文化是野蠻落後、黑暗低劣的「難民文化」

「大陸文化」，這兩種文化互相衝突不能並存。另外還有廢棄漢文漢字創造台文台字等偏激言論。一切中華的漢民族的都被他們嗤之以鼻，他們已經不是反共而是反國反中華了。他們以福佬沙文主義做建國的動力，在台外省人極有可能成爲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猶太人，或者成爲今天印度的錫克人。情況再擴大惡化，將來「台灣國人」在十億中國人的汪洋大海中也有可能成爲印度的錫克人，冤冤相報何等可怕！吾華人同胞能不警惕以防止悲劇乎？

今天在海外福佬台灣人受到了國共雙方的重視爭取成了天之驕子，國府方面儘量採取低姿勢想要與台獨意識的福佬台灣人溝通以求台灣內部的安定和諧。但是，台獨人士努力發揚「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意識」，一副唯我獨台妄自尊大盛氣凌人的態度，令人難以接近，於是對立抗拒的危機日漸嚴重。

雖然有極少數理性未泯的台獨人士也看到了種種危機，然而他們人少力弱不足以去獨力挽狂瀾。展望未來台灣前途，難免是歷史悲劇重演：國府老朽僵硬，逃避拖混不思振作，其統治力量自然漸漸薄弱而遭淘汰，少壯台獨意識者接班時機成熟成立台灣國，以新興「民族」的狂熱推行「台灣化」，逼使內部外省人客家人不安，島內發生變亂，中共乘機宣佈武力封鎖。此時尚有一部份擁有軍權的外省人立刻響應中共裡應外合，短短幾個月台灣國即烟消雲散，像清朝時的「鴨母王」朱一貴一樣「三日打到府，一暝溜到厝」。平添幾許冤魂爲後人留下幾聲嘆息！幾絲惆悵！

五、焚香祝禱

雖然情勢是一步步走向令人沮喪的境地，海外華人基於血濃於水同胞之情，不偏袒任何

一個政治勢力（左、右、獨），唯希望華人同胞間能和平、妥協、互諒、互讓，不要仇恨厭惡，不要流血破壞，不要暴亂兵戎相見。

1. 有望於中共政權者：毛澤東四人幫極左勢力垮台，舉世華人額首稱慶。中共開始走實際開放路線大力修正。世間本就沒有什麼神聖教條，絕對真理，但中共還是要掛出「四大堅持」的招牌，我們也明白中共有其苦衷。雖然是掛羊頭（社）賣狗肉（資）只要好好的賣，先把經濟搞上去，隨着生活的改善，一切都會跟着進步了，「四大堅持」的招牌自然就掉了下來。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前途一定光明的。

對於華人同胞台、港、新的成就，中共應該虛心學習尊重，不可因自卑而嫉妬，不可因欲吞之消之而後快。自然，在走資修正的同時，台、港、新的種種缺失也須小心檢討避免。像今日台灣過份的崇洋媚外，喪失了自己的本位文化本位立場，使得國民對自己沒有信心，對於國家發展的前途也是十分不利的。

今日各華人政權中，中共的力量是壓倒性的強大，因此中共也應有「壓倒性」的寬容忍耐，最重要的是好好建立信用表示誠意，不要恹恹然惶惶然氣急敗壞的急於「大一統」。

中共既然要與國府和談，却又苦苦相逼相脅有我無你不共戴天，難以令人信任，徒增反感。奉勸中共還是好好建設改進缺點才是道理。

2. 有望於國府政權者：面對中共台獨兩股勢力的壓迫，國府處境確實艱苦。如果放棄中華民國法統，與中國大陸劃清界綫，則在台灣統治地位立刻動搖，無法應付台獨人士的挑戰。如果堅持中華民國法統，又競爭不過中共，國際地位孤立困窘無比。只知推拖逃避決非長遠之計。

現在中共既然擺出一副笑臉要求三通和談，何不將計就計，正好把台灣這些年來的成績「通」給大陸同胞看看，對於促進大陸的修正走資開放，吸引大陸同胞的向心力，減輕海峽兩岸緊張情勢，必然大有助益。

對於台灣人仍應主動接觸溝通，使他們明瞭台灣經不起變亂，愛護台灣島要顧全大局。台灣的政權還須向台灣本地人更加開放，那些過時了的黨禁報禁戒嚴法都應該解除了，許多政治犯都應該釋放了，實施民主以化解地域性的隔閡猜忌才能造成一片祥和團結之氣。

3. 有望於台獨人士的：國、共、獨三者心胸都不算開闊，其中台獨人士心胸尤其狹小偏激，絲毫不容異見異己。台灣人怎麼能一骨腦把三百多年的委屈都算在「中國人」頭上？事實上，許多受外人欺壓的委屈，台灣人和「中國人」是同時身受的，「中國人」也有數百年屈辱的情結，大家要互相體諒才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台獨人士要抒發這些委屈，須要爭取世人的同情和理解，尤其華人同胞的同情和理解，同時也須要和平與耐心。如果只求情緒的痛快而把華人罵爲「唐山豬」，視爲非我族類而與之爲敵，那就太不智了。即使台獨人士真的已形成了不同於華人的另外一種「台灣民族」，台灣島內還是有許多「非台灣民族」的華人，對岸中國大陸和全世界還有十億餘衆的華人，要使他們成爲台灣獨立的助力而非阻力才是「台灣民族」建國成功的保證啊！請台獨人士接受筆者衷心的規勸！

謹焚香祝禱各大門派各種政治勢力都虛心檢討修正，走理性之路，希望全世界華人，不分國籍相親相愛，大家都有一個幸福祥和繁榮發達的未來。

「○的突破」

與「知音」

觀後感

(德國) 杞人

聽說今天在漢堡的亞巴當ABATON戲院放映中國電影：「○的突破」和「知音」兩片。「○」片是一部描述一九八四年度奧林匹克世運會中國運動員許海峰奪得第一塊金牌的故事。去年奧運期間，我適赴南歐旅遊，不能坐在電視機旁欣賞我國健兒與各國高手展開競技的精彩鏡頭，現在趁這個機會也好得個補償。時間不容許猶豫，馬上撥電話與L教授聯絡了解地點後邁步出門。由於路生，好不容易找到亞巴當，按電鈴無人應門，原來電影正在放映。片刻，不得其門而入的向隅者陸續增加到十多位

！據了解，他（她）們是來自大陸、台灣、星島、印尼、泰國的留學生和當地華僑，及飯店老板等。雖然都是陌生的臉孔，但却親熱地打招呼，互相寒暄問暖一番。啊！有道人生如戲，這不是一齣活生生的「人際的突破」正在街頭上演嗎？院內「○的突破」院外「人際的突破」，驚動許多往來的洋人投以奇異的眼光。有人竊竊私語：要不是爲了「○的突破」大家就不會冒着寒流挨凍？於是又有人感慨地說：「人際的突破」是現實社會一部拍電影的好題材，希望有人肯花心機編導，有人出錢去拍戲，相信必定賣座賺錢？

零下七、八度在街邊呆站的閉門羹真不好受，爲了不白跑一趟；我堅持等候。沒耐性的跑開了，最後只剩下幾個人，直到「○的突破」映完（休息）我們才得溜進去。

因爲遲到雖未能一睹「○的突破」，但想像中官能的感受是頗受用的。那是競技場中第一塊金牌，更何況是在世運歷史上中國人首次打破○拿到閃爍着中國人智慧和光輝的金牌嘛！突破是從無到有、越過自然和人的障礙獲得的勝利成果謂之突破。我馨香默禱我國上自領袖下至人民在各方面都努力謀取突破。尤其是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許多有高瞻遠矚的人士已體認到科技是帶動社會邁向文明進步的關鍵。我國「技不如人」不是在科技領域沒有突破性人材，而是人材外流——「楚材晉用」。如果國家能號召羅致國內外的人材得到發揮潛能的機會，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必能與各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爲世人造福。這樣總要比把大量美鈔進口科技成品強吧？

「知」片是演中國末代皇帝袁世凱搞「洪憲」，雲南軍區司令蔡鍔（松波）極力反對，和外國駐華「五國公使」聯名表示不支持，結果在中國近代史開出一宗八十王天的「洪憲」怪劇。「知」片觀眾的教育意義大抵是：歷史就是一面鏡子——「龍的幽靈」不容許在中國復活。霸道、獨裁，不顧人民死活的政治集團結果必被壓迫者起來推翻。

毛澤東地下

讀「中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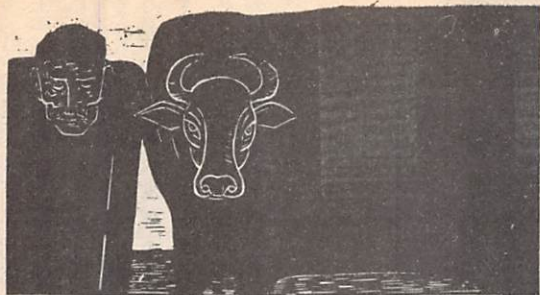
(國內) 洋廣

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毛澤東的靈魂被拘到地府後，由於大家都是皇族，地藏王免他受苦，還給他一間大房做「主席辦公室」。主席他老人家不改當年好學之風，訂閱各種報章，包括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當看到新來的「中國之春」雜誌，不但白天龍顏大怒，且晚間睡不安寧，夢中發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地說個不停。地藏王非常關心，叫主席老人家少看書報。主席動怒說：「我若不讀書、不看報，豈不是變成林彪、陳伯達之類了嗎？」

（編者註：毛在生前曾批評林、陳不讀書，不看報。）

爭牛權的胡大狗

(中國大陸新移民·香港) 黃流



像發夢一樣，胡大狗給關進縣看守所的牢房。他兩眼因被打而淤黑浮腫，因浮腫而視野有點模糊，眼前的物體似乎時隱時現，似乎浮動於煙霧中。

他很希望是發夢，但腦袋晃了十多次，發覺他還是站着，而不是躺着，至於牢房中幾個剃光頭髮的腦袋，又越來越清晰，他才淒慘地嘆了口氣，承認自己又一次落難。

見他不再發楞，有人便向他發問：「喂！你是犯了什麼的？」

他不再思索，隨口便道：「是……是……是談情說愛。」

有人吃吃的笑，有人故作驚訝的起哄，有個嘴角帶笑的則連聲「佩服佩服，七哥居然勾搭上洋婆娘。」胡大狗給譏笑着，倒也醒覺：如果談情說愛也得坐牢，社會主義也不成社會主義了，他尋思片刻，萬般無奈的，只得更正

道：「是通姦，……或者……是和姦。」

「OK！」那嘴角帶笑者又惡作劇，「是跟母牛還是跟母豬？」

人們哄堂大笑，胡大狗雖覺可惡，却也不惱怒，他知道人們為什麼哄堂大笑，因為他相貌太醜陋了，有女人肯跟他通姦，簡直是奇跡。他一隻眼睛大，一隻眼睛小，塌鼻梁，鼻孔朝天，最不幸的是一張嘴，整副牙齒長得太凸出，臉皮及嘴唇幾乎包裹不住，這就使他整個臉孔，有點像煮熟的狗頭。此外，他身材也不好看，腰彎背曲兼雞胸狗肚。對於自己這一尊容，他曾經怨恨他的父母，他父母發覺他怨恨，慌忙把責任推到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去，村中長老替他詳加推究，則推究到他的十九代祖宗，諉過於一代代都窮得發昏，吃了太多的蛇蟲鼠蟻和野果草根。這種種推究，並未能消除他的怨恨，只使他把對父母的怨恨，分攤給十九代祖宗罷了。直到後來，一連串政治運動，鼓吹越窮越好，越窮越光榮，越有革命性

，他並且實際地為此得到尊重；得到出乎意料的好處，他才不再怨恨。大概是心理上需要平衡，每當人們注意到他的醜陋，他便條件反射的產生一個驕傲的念頭：「我是貧農！老子是十九代貧農！」

現在，他就產生了這念頭。打量一下眼前嘻哈大笑的囚犯們，看樣子沒有誰的出身，比他更光榮，他於是反唇相譏道：「我是貧農，老子是十九代貧農！你們都是什麼出身？」

這沒頭沒腦的話，把大家弄得莫名其妙，牢房裡突然靜了。

「我看你一定是官僚地主階級的兔鬼子，是不是？」胡大狗乘勝追擊，譏笑地望著那個嘴角帶笑的囚犯。

嘴角帶笑者眨着眼睛，想搖頭，但忽然又點了點頭：「是的，我也是畜牲。」

胡大狗滿足地自負一笑，也就把對方原諒了，他親善地又問：「你是犯什麼的？」

「我……：我是要爭人權。」

胡大狗楞住了，什麼「爭人權？是欠人錢」，還是「搶人錢」？

「是政治犯，爭取做人的權利。」那嘴角

帶笑者看出胡大狗不懂，但政治犯他懂，也就是反革命份子，他因此吃驚地身子縮了一縮。

囚犯們又喧嚷起來，問胡大狗是怎樣姦姦？姦出洋相還是土相？一邊問，一邊嘻哈大笑。因為各人表示幫忙判斷他會不會被判罪，胡大狗因而也有問必答。問得差不多了，各人果然替他判斷，有的說該判四年勞改，有的說最少應判五年……

胡大狗老希望有人說：沒事的，只要痛哭流涕，檢討一番，就什麼事也沒有。可憐他老等不到誰說出這番話，他耐不住焦躁，向各人反駁道：「你們知不知道！我是貧農！我是十九代貧農！……！」

在一片哄笑聲中，那嘴角帶笑者忽然又笑道：「十九代貧農，這的確會令法官專政時手足無措。但再追上去呢？你的二十代祖宗是幹什麼的！三十年一代，你的二十代祖宗應該生活在明朝初年，看來你祖宗是大奸黨胡惟庸。他的反革命案，黨還未平反呢。……！」

「這……：這……：」胡大狗雖然莫名其妙，但還是老大一驚。驚魂稍定，慌忙又氣憤道：「那是不查的，只查十八代，最了不起是查到十九代。」

各人又哄笑起來。在哄笑中七嘴八舌：

「土哥，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勞改四年，是檢了大便宜。」

「土哥，過四年回鄉，孩子胡小狗三歲了，簡直是福氣。」

胡大狗急得頸脖發漲，兩排牙齒凸出唇外。他放出最後一個護身法寶：「我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出生的，跟新中國是同一個娘胎。……！」

犯人們登時瞪大了眼睛。靜了片刻，那嘴角帶笑者才友善道：「我們是有眼不識泰山。」



國內槍斃人後，要張貼布告，以做世人。
上：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法院布告。
下：雲南省思茅縣法院布告。

—本刊記者攝于一九八四年



不過，這一切恐怕不頂用，我建議你別胡思亂想。還是安靜地想下怎麼對付審訊吧。」

二

「這一切恐怕不頂用？」不！胡大狗堅決不信，他堅決不信那個邪。

憑什麼要信呢？他至今還記得一清二楚：當年，文化革命時候，城裡紅衛兵下鄉串連，號召社員們起來造官僚的反，大家當家作主。他想不明白，反駁道：「不行！沒有官不成世界，沒有官誰給我們記工分，分糧食，分布票？我們是牛，就得聽看牛的人管。」他認準一個理就死不轉彎，不惜跟紅衛兵頂牛。結果被紅衛兵和造反的社員打成保皇黨，鬥得他昏天黑地，腦袋撞向牆去，鮮血把牆上的毛主席像弄污了，他嚇得逃往外縣山區躲着搞了一年副業，山區突然清理外來人，他被捆綁了遣送回鄉，旋即交付造反農民法庭審判。他被判死刑，立即槍決。但當時有人大聲呼叫：「胡大狗是貧農！」這一叫真是威力無比，人們嚷嚷一番，證實了，他隨即獲得無罪釋放。到了清理階級隊伍時候，他的保皇黨罪還成了光榮事蹟。在一個學毛著的講用大會上，領導叫他講用，他什麼也不會說，只是大叫一聲：「我是貧農！」得！真是一句頂一萬句。就這樣，他當了好幾個月貧協委員，威風十足。

還有呢，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有一天他蹲在茅廁裡大便，一時無聊，隨手在茅廁板上寫上「毛主席萬歲？」沒想到拉這一泡屎，竟驚動了全公社，縣公安局也派人下來調查，要追查反動標語，一查，把他抓到公社去，他據實說明他不知道「？」和「！」有什麼不同，這絲毫不頂用。審訊還是沒日沒夜的進行。

他急了，呼叫道：「我是貧農！」這馬上頂用了，審訊停下來，次日，他更進一步，呼叫道：「同志！我是十九代貧農！」就這樣，專案幹部徹底感動了，一查，確實鐵一窮一如山。於是全公社發了通告，不但替他開脫了罪狀，而且還表揚了他，說他階級感情深厚，心中時刻想着毛主席。這一點，他捫心自問，倒也受之無愧，說真的，一邊拉屎還一邊想着毛主席，他媽的誰做得到？

再有其他細碎的風浪，沒法記得那麼多了，只記得在鄧小平再上台的時候，他又經歷了一次驚心動魄的反覆，那時，他雖然還認定窮是光榮，但想到窮得討不到婆娘，他的十九代光榮將沒人繼承，他的心也亂了。看見人們求神拜佛，求財神爺可憐個，他於是也求拜。他想過了；要就不要拜，要就拜到神鬼感動得哭起來，所以他迅速地成了求神拜佛的急先鋒。就這樣，他忽然又被公社抓了，縣公安局又派了人來，要押他進城坐牢，殺雞儆猴。這一次很糟，糟在不公審，也不審訊，他因而沒有機會高呼「我是貧農！我是十九代貧農！」然而，在火燎眼眉的關頭，縣的黨委書記來到公社，不讓公安局押走他。過了兩天還忽然請他去參加幹部會議。在會議上，縣黨委書記敲鑼打鼓似的叫嚷：「同志們，我去訪問了胡大狗的娘，她老人家對我說：『大狗是解放前一年出生的。我們這裡是哪一年解放？是五〇年，所以大狗是四九年出生。』我再問是哪一個月，哪一天出生。她說：『是八月初十。』天呵！你們知道這一天是什麼日子？我莊嚴地告訴你們，這就是公曆十月一日。也就是說：胡大狗是跟新中國同時誕生！同志們呵！這可不是簡單呵！這是很光榮的呵！這是不起的幸福呵！……可是，大家看看吧，我們的胡大狗同

志有什麼幸福？他窮得讀不起書，他窮得三十多年來總是閒時吃稀，農時吃半稀半乾，拌以乾糧。他已經三十多歲了，却還是窮得討不起老婆。這是怎麼回事？我們鬧革命就為着讓農民永遠這樣窮嗎？我們不大事改革，讓人民富足起來，我們共產黨還能混得下去嗎？胡大狗絕對沒有罪！因為人們信賴我們，信了三十多年，信不出好日子來，他們才信鬼神……」這鑼鼓一樣的講話，真把他胡大狗敲打得渾身舒暢。他當然立即無罪釋放了。這件事說明了什麼？這不是說明他簡直是皇親國戚嗎？不是意味新中國活着，他就自然要被關照嗎？

三

終於熬到審訊員來傳訊。胡大狗已打定主義：堅決相信黨，坦白交代一切，一有機會或者爭得機會，便亮出自己的護身法寶。

在審訊室坐下，一望審訊員，他的還不甚安定的心竟完全安定了，因為審訊員像他一樣的腰拳背曲，雞胸狗肚，看樣子分明也是出身貧農，祖上多半做過乞丐，這就是說，是階級哥哥來審問階級弟弟。一切好說，一切好說。他衝動得幾乎就脫口而出——「我是貧農……」只因做審訊記錄的女陪審員一照面就對他聲明，問什麼就答什麼，不准胡說八道，他才沒有造次，並警戒自己要跟上時代，嚴肅法制。

審訊問姓名、籍貫、民族、歲數、文化程度。他一邊答，一邊整足氣力，準備一問到他的家庭出身時，便作獅子吼——「我是貧農……」但奇怪了，審訊員偏偏沒有問這個，就進入了案情審訊：

「你坦白交代，你犯了什麼罪？」



南无封侯特叔菩

「是……是跟楊妹通姦。」胡大狗只得應對道。

「通姦？」審訊員驚異地說，「楊妹有丈夫，她爲什麼要跟你通姦？是貪圖你長得漂亮？……」。

「她是窮得沒辦法。她曾經借我拾元錢，拖欠了兩年仍沒法還。」胡大狗挺爽快的坦白，「我當然要經常提起這件事，以免她忘記。但有一天，她突然悄悄對我說：『不還可不可以？我只怕這是到死也還不了啦。』我嚇了一跳，連聲說不行。她更低聲說：『我給你玩一次，以後就兩不相欠。』我的心砰的一聲響，差一點點就昏了。十元錢一次，是貴了還是便宜，我不知道，我當時也不會想了，只是心慌

慌地說：『你男人會殺了你和我……』她又說：『不會知道的，馬過石橋不留印，井水偷擔有啥痕？』我一想，有道理，我總不至於把石橋碰崩了一塊。再說，我實在也太想見識見識女人那個……。所以我就向她哼了一聲：『得！』」

「情況就這麼樣？」
「一點不假。」胡大狗指天誓日，「情況就這麼樣。」

「好吧。」審訊員木無表情，「你複述一次姦的過程。」

胡大狗把「複述」聽成了「複做」，不禁發楞：楊妹不在審訊室，怎麼「複做」一次呢？他只得狼狽道：「這個我做不到，我只記得我手忙腳亂，我還未找到井口，就被人抓了，那是下午，在蕉林子裡。……」

「慢着。你這樣交待怎麼記錄？」審訊員嚴厲插話，「你聽着，我要你複述一次姦的過程。」

胡大狗楞了好一會，沒法了，要「複做」就複做，他站起來，「是這麼樣，我先脫褲，……」他說着，扒了扒褲子，褲子因爲沒有扣皮帶，一扒就脫了下來，他沒有穿內褲，所以……，那審訊員一看，便怒喝道：

「你……畜牲！……」

胡大狗把「畜牲！」聽作「出身？」這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才盼到的提問，他當下拼命也似的，立即大聲道：「我是貧農！我是十九代貧農！」

好一陣忙亂，他才知道審訊員是罵他畜牲，並慌忙把褲子穿好。

謝天謝地，似乎申明自己的出身以後，審訊員的態度便轉變了。死板板的臉上有活了活氣，只見他笑了一笑，忽然改口道：「你既然是

貧農，就不要欺騙黨，欺騙無產階級專政。告訴你，你的案子是強姦案，不是通姦案。我們驗看過，楊妹身上有許多傷痕。看你剛才的不知羞耻，當着女審訊員的面也敢脫下褲子。可見……」

「法官同志，」胡大狗叫苦道，「我不是有意要弄傷她，我不知道我的手那麼重，真的，我沒有想到，是我的手自動發狂。」

「我理解，你當然是失去了理智，只求發洩獸慾。」審訊員皮笑肉不笑。

「對了。我是失去了……失去了腦袋。」審訊員贊許地點點頭，吩咐胡大狗繼續好好合作，又問道：「你已經把她按倒在地？」

「是的。我估計那不會是站着幹的。」

「你是赤條條的？」

「不，是赤着下身。我只是赤着下身。」

「楊妹是上下都赤條條啦？」

「這怎麼說呢？……是這樣吧，我是掀起她的衣服，褲子則脫了一半。算是赤中身吧。」

「你繼續說下去。」審訊員幾乎忍俊不住。

「還說什麼呢，他娘的，有人跑來了。」

「你於是急忙拔出生殖器？」

「哪裡呢？我是急忙穿上褲子，把它藏起來。」

類似的回答又重複幾次，審訊員才又說道：「這裡有楊妹的口供，她說你是強姦她。」

「不可能！不會的！她對我挺好。幫我縫補過好幾次衣服了。人心是肉做的，我怎麼能反而強姦她？」

「那麼她是陷害你，誣告你啦？」

「不會的！她對我很好，她的心很和善，他挺愛惜我。」

審訊員沉思片刻，把幾頁楊妹簽字的審訊記錄拿出來，唸給胡大狗聽，隨後說道：「現在撥亂反正了，要嚴肅法紀，我們不再搞逼供訊。你是強姦就趕快認罪，否則，你是貧農也不予以從寬處理。至於你確實不是強姦，那就請你給我一個解釋；楊妹爲什麼要誣告你，你說得合情合理，我們就把楊妹抓來，與你對簿公堂。你辯贏了，那就請她坐牢勞改。現在已經取締四大自由，誣告是有罪的。……就這樣吧，你好好想一想，明天再審。」

第一輪審訊就這樣結束，真是大出胡大狗意外。還記得的，過去一連串被揪鬥，被審判，被關押，有哪一次不是呼天搶地，哭爹喚娘？……好了，這一次居然就沒有動他一根汗毛。他坦白交代的每一句話，又都被批准，通過，由女秘書記錄下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被押返牢房，胡大狗想來想去，不由不欣然一笑：沒說的，必是及時說出「我是貧農」；因而立即被另眼相看。

欣慰之情盪漾着，再尋思明天的審訊，他忽然頗感煩難；按事實來交代罷，他當然要堅持是通姦，並且是通姦未遂。但這麼一來，這世界上第一個肯赤着「中身」，任他的目光、任他的雙手予盡情摸索的好心腸女人，却要被抓到牢中來，跟他辯論，辯完了要背一條誣告罪，要被判刑勞改，這怎麼好？這對得起她嗎？對不起！他娘的太對不起，簡直是恩將仇報。

苦惱了很久，始終不能兩全其美，他才猛然氣惱、困惑；明明是通姦，楊妹怎麼要誣告，說是他強姦？

這一問真把它問住了，尋思了大半天，才突然「哦」的一聲，恍然大悟了：敢情就是這

樣！她是女人，女人通姦被捉，夠多難爲情？以後拿什麼臉面去見人？最糟的是，她的丈夫還要揍她，她的兒女呢，只怕一想到從今要被人們恥笑：「大狗入的龜孫」，必定也要罵她。面對這一大堆災難，能叫她不愧亂嗎？一慌亂當然就會急中生智：把通姦說成是強姦。這麼一說，自然一切就變了，人們不會笑話她，丈夫不會揍她，兒女也不會罵她，恰恰相反，人們還會同情她，可憐她，安慰她。

困惑一解，他也不再氣惱。只覺自己還負有責任要幫楊妹挽回面子，排除災難。撇開他對他很關心愛護一點不講，也撇開她賣身還債，窮得怪可憐一點不講，就憑她是中農出身，他也應該幫助她。黨說的嘛，貧農要團結中農。

至於怎麼樣幫助楊妹，費煞思量，他好歹想出了悲壯的主意，就由他承認是強姦好了。強姦雖然有罪，按同房囚犯分析，應判四年勞改，但是，第一，他姦而未姦進去，這應從輕一年吧？第二，他是貧農，十九代的貧農，這應該又從輕一年吧？第三，他是「新中國」的同胞兄弟，這又可以再從輕一年吧？第四，他不是強姦而承認是強姦，這比竹筒倒豆般的坦白，更爲難得，照理不又從寬減一年，說不過去吧？好了，拿算盤一算，還有什麼罪？

反覆地精打細算，只覺唯此才能兩全其美。他不禁開顏作笑，眼前陰森狹小的牢房，似乎也有彩虹在飛舞了。

次日提堂，他真是敢想敢幹，立即調整了他的口供，自然，他也讓審訊員清晰地知道：他是「新中國」的同胞兄弟，份屬皇親國戚。

四

又經過幾次提堂，簽名畫押，終於結案。過了兩個月，判決書發下來，一聽宣讀，是判他勞改兩年，他吃了老大一驚，想到勞改回來就變成「勞改釋放犯」，再也不被當成出身「貧農」，一切革命色彩也蕩然無存。他不由不手脚撲騰，衝着唸判決書的法官尖聲叫罵：「這是怎麼搞的？這是什麼鳥從寬？簡直是豬狗鴨開戲班——胡鬧……！他娘的，公社書記強姦了多少婦女？文革鬥完了就啥事也沒有了，他還真材實料的姦了進去。……」

「你不服可以上訴。」讀判決書的法官看去像貧農出身，身材很瘦小，腦袋雖然大，但臉上瘦得只怕刮不出一兩肉，臉皮又薄得簡直不像臉皮而像一層油漆。他向胡大狗愛莫能助似的攤手，隨後微笑着勸告：「謾罵是不容許的，謾罵是藐視法庭，要加刑。」

被友善地勸告，胡大狗不好意思再罵，他眨着眼睛一想，想到判決佈告上通常寫明犯人出身地主，或出身反動官僚，但他的判決書上却没有他的家庭出身一項，當下急忙叫苦道：

「這判決書不夠全面！我是貧農……」。法官沒時間聽他囉嗦，再一次說明不服可以上訴，便叫人把他押走。

好吧，上訴就上訴。胡大狗給押回牢房，喉嚨間好像卡着一塊石頭，怨氣出不來，冤氣吞不下，他環視同房囚犯，只覺那個嘴角帶笑者，最有文氣，他於是請他幫忙上訴。經兩天相處，他已經知道他叫張勁草。

張勁草表示願意幫忙，但聽完他的陳述，却搖搖頭道：「認爲判得太重，這不成理由。我們的法律絕大部分都含糊糊糊，就像你弄不清楚楊妹是赤上身還是赤下身一樣，你能憑什麼說判得太重？這樣空洞的上訴，將絕對有害

而無益。」

「就憑跟公社黨書記來比，他是地主出身，他馬過石橋又留下許多印。他娘的……」張勁草給纏得沒辦法，只得代他寫了上訴書。

一個月後，重審。又一個月後，判決再次宣讀，改判四年徒刑。

胡大狗幾乎沒氣死。他認真動了氣：毛主席說的，老子偏不信這個邪，老子再上訴。

張勁草不再嘴角帶笑，傷感地勸說道：「以同樣的理由再上訴，我敢肯定你刑滿釋放時胡小狗將是七歲而不是三歲。」

「老子拼啦！」胡大狗氣壯山河。然而，張勁草悲天憫人的堅決不幫忙。聲明要上訴就必須有新理由。胡大狗沒辦法，想了半天，才又說道，「好吧，我就用新的理由上訴：除了說明我是十九代貧農，我是新中國的同胞兄弟之外，你添上去：我的名字是大狗，實際上我是牛。人們都說革命勝利了，可以豐衣足食過好日子了。我相信，所以我起勁唱社會主義好，唱人民公社是天堂，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唱共產黨，像太陽……可是，我十歲還赤着下身，十二歲就要做工，看牛，檢牛屎，十八歲被揪鬥，十九歲被判死刑，二十三歲被關押在廁所裡，將近三十四歲的現在，則又坐了大牢。回憶一下吧，我一直窮得讀不成書，我老是穿打補釘的衣服，長年累月，我每天至少要吃一頓稀粥，能吃上一頓乾飯的日子，掃起來沒有一籬。還有，我操他娘的，我又老是被誤會，說我反革命，門牙被打掉了四隻，肋骨被打斷了兩條，左腳被打跛了四個月，心窩背脊不知吃了多少棍棒拳頭，他娘的這就叫做社會主義幸福？不錯，我強姦，這犯了法，但道理就是這麼樣：我是牛，三十四年來我實際被

當成牛，好唄，牛就牛吧，我沒意見，我決不像你張勁草那樣爭什麼人權。但我是牛，我可以爭牛權吧？我想，公牛看見母牛是可以撲上去樂一樂的，牛主人不同意，可以把我攆開，攆開就應該沒事，沒理由就這樣把我打進地獄，判四年勞改。如果硬要這麼判，那等於說我是沒有牛權了，好吧，沒有牛權，那麼，社會主義就應該給我賠償，賠一個人似的胡大狗給我，賠吧！他娘的！把我當人，我保證就不會像牛。……」

他訴說著，咬牙切齒，又涕泗橫流，張勁草受感動不過，只得又替他寫了上訴書。上訴書把激憤的話盡量減去了，措詞哀而動人，一句句唸給胡大狗聽，全部同意了，於是按手指模，立即遞上去。

又過了一個月，新的判決書發下，沒有加刑，却也沒有減刑。而堅持判四年的理由極為現代化，現在已否定文革，從今法不阿貴，人人平等。

胡大狗仍不死心，但開始感覺強姦罪，他實在惹不起了，既然冒認強姦，只是楊妹有好處，而他自己却犧牲慘重，他可不願憐香惜玉當呆鳥了，當下，他聲淚俱下的向張勁草訴述他其實不是強姦。

經過一天一夜的反覆盤問，張勁草才相信了他，然而，明白了，相信了，張勁草却沮喪道，「我恐怕沒用了，假作真時真亦假，如果據實上訴，可能被斥為翻案，不肯服法認罪，那刑期會翻一番的。司法的也要大幹快上。」胡大狗捶胸頓足，聲明不在乎，他決不能吞下一口冤氣，被糾纏不過，張勁草只得又捉刀代筆。

五

過幾天就是國慶節，第三次上訴的判決下來了，胡大狗一向思想反動，曾書寫反革命標語，曾大搞封建迷信，至於現行罪是：一強姦婦女；二在法庭向女司法人員裸露下體，藐視、瀆視無產階級專政；三頻繁翻案，拒不認罪，更進而惡毒誹謗社會主義。總之，不殺實不足平民憤，經上級批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胡大狗嚇得腦袋嗡嗡響，昏了。張勁草從他衣袋裡掏出判決書一看，腦袋也像炸了，他驚魂甫定，便憤怒地呼叫管教幹部，要求見公安局局長。半小時後他被押解出去，一小時後又被押解回來，那張嘴角不再是帶笑的嘴角，一本來紅潤的臉孔，變得鐵青。

「我……我該怎麼辦？」胡大狗像皮球洩了氣，像瀕死的魚瞪着眼。

「沒法上訴了。」張勁草悲憤地說，「明天就槍決。……槍決他們剛剛要批行的法治。」

「怎麼會這……」胡大狗呼吸也感困難。「我問了。」張勁草好半天才說，「現在來了指示；可抓可不抓的要抓，可殺可不殺的要殺！審案要從重，從快，全國各地派了槍殺名額，要上繳人頭……人頭不足，就繳牛頭、狗頭……」

說着話，管教幹部給張勁草送來半隻白切雞，二斤米飯，張勁草接過遞給胡大狗，說道：「……我代我父母向你請罪，他們許諾讓你做人，但他們革命至死，你還是做不成人，連牛權也爭不到。……」見胡大狗慘白的臉上，微現出詭異的神色，張勁草又道，「我父母是革命幹部，跟公安局長是生死戰友。我不是要騙你，按我分析，我父母應該是終生為官僚地主階級奮鬥，自詡什麼為人民，簡直是扯淡。……真的，我只要肯認錯，寫一張檢討，宣佈

我從西單民主牆帶回來的東西，都是他媽的屁賞，我就不用坐牢了。……他慘然一笑，拍拍胡大狗的肩膀，又道：「剛才我罵了局長，罵得他抬不起頭。看來他也明白不該殺你，只是你的腦袋比不上他的官帽貴重。沒法了，我的力量只有這麼多，你好好享受一餐，做幾分鐘人。」

張勁草說着，眼眶潤濕，那份真摯及傷感，把胡大狗弄得手足無措，一時間感激之情蓋過了驚恐絕望之情，他哽咽道：「你別難過……我……我沒有什麼……其實還未必就一定被槍斃。當年……當年我就被判過死刑了，但死不去。明天，他娘的，我要親自叫嚷我是……我是貧農……」

提起往事，他的眼睛忽然閃出亮光，猛想到叫嚷要打雷一樣響亮，沒氣力不行，他也不客套了，立即吃飯吃雞，狼吞虎嚥。

這一天晚上，張勁草安慰他，想對他說：他張勁草將把他的枉死昭告天地，昭告歷史，一個高唱恢復法制，却又玩弄法制的官僚政體，將要償還血債，將要被人民審判。……但是，因見他一直發楞，什麼話也不想說，張勁草也就什麼也沒說了。

次日，果然召開公審大會，很多公安人員，解放軍戰士走進監獄中來，刀槍閃亮，殺氣騰騰。許多犯人被推出網綁，胡大狗也被結結實實的綁架起來。

他弄不清楚他被怎麼訓斥，怎樣被推上汽車，以及公審大會的景況怎麼樣，他只記得當宣判他的罪行，給他插上槍決的令牌時，他鼓起吃奶的力，要高呼他是貧農的時候，頸脖的繩索突然一勒，把他的話勒在肚裡，好一會，繩索鬆了，他却也只能喘氣，那裡說得出話？

西安市槍斃人前的遊街示衆。一本刊記者攝



他憤恨焦躁，當然不死心，俟喘氣喘過了，腦袋一昂，便張口呼叫，但只叫出一個「我」字他身後的刑警突然又一勒繩子，這一勒幾乎把他的眼珠子勒得跳出眼眶去，意識復即模糊。當他頭腦又會思量時，行刑車已載着他奔行在馬路上。這時，他感覺到頸脖的繩索特別鬆，身後的刑警似乎不大理會他，情況似乎許他喊叫了，但廣播喇叭呼叫着口號，那口號聲震耳欲聾，震得他五臟六腑似乎鬆散了，互相脫離了，他因而還是沒有呼喊。

他不能呼喊，却可以看見，前面有十多部行刑車，每部車上都有一、二個插着槍決牌的犯人及十多個解放軍士兵、民警，跟這十多部刑車同時進行的，是兩列摩托車隊，摩托車上都架着輕、重機槍。馬路兩旁，觀看的人，密密麻麻，像蟲蟻似湧動。

除了可以看見，他也可以想。但這時他還能想什麼？眼前的恐怖氣氛，恐怖場面，比當年的農民法庭厲害一萬倍。肯仗義勇為救他的，也就要拿出一萬倍的勇氣，誰能？就算有人真能吧，在炮彈轟炸似的喇叭叫嚷聲中，呼叫「胡大狗是貧農」，也只有鬼才聽得見。他絕望了，估量死定了，這念頭使他悲憤莫名，怨苦像火一樣燃燒，因而使他只能怨毒地想，他娘的，殺吧，殺吧！這不過是殺了你們的二十代貧農，殺了你們新中國的同胞兄弟。總之，是你們家裡死人。老子不在乎，老子只不過損失一條牛罷了。……

然而，遮天蓋地的殺氣，逐漸透入他的心，擴散於他全身，他不能再怨毒地想，只能驚恐地想着子彈將如何打入他的背脊，打入他的腦袋；血像泥水似滲出，還是噴泉似噴出？他的身體是瀕死的牛似搖動？還是死蛇似扭曲撲騰？……想着想着，他驚怖得臉色慘白，全身癱軟，尿尿了，撒尿了。……

當被拖下汽車，放置於刑場時，他已恐懼得失去知覺，在全無知覺的狀態中，他的喉嚨居然哼出了一句：「我是貧農！」這喊聲因顛懷和虛弱，變成了：「我是飯桶！」那行刑的士兵為此向他呼喝：「你不是飯桶，你是畜牲！」呼喝着，還踢了他一脚。他腿軟跌倒了，臉孔撞在地上，這一撞使他有了模糊的知覺。在霎那間，通姦被捕，不服上訴，被押赴刑場等等遭遇，都恍惚如夢。他巴不得是發夢，因而急急忙忙睜大眼睛，愧動腦袋。以求掙扎出夢境。但猛然「砰」一聲響，他的以「我是貧農……」為統帥的意識，登時爆炸了，迸散了……

黃昏的鐵路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劉宏平

黃昏的碎步
 滲透空間
 叩響了我
 沉落的呼吸
 霧拖曳
 烟爬行
 樹梢在撕扯
 夕陽墜落的裂口
 蝙蝠圈住
 荒土靜靜的欄杆
 夜在抽搐
 心在流失
 枕木冷漠
 托起時間的碎步
 鐵軌盤綠
 鏽住清醒的記憶
 野草的喧響
 晚風的採弦
 道旁破損的小站
 瘦長的路燈
 正悄悄地提醒
 一個徒然的尋找

春之夜思

日軌的座右銘上
 晾乾的光綫在吞吐
 黃昏的隱私
 今晚，夜不再撒謊
 朝着天花板天花似的謎語
 我的神經迷亂交錯
 思绪在逃匿
 感官伸出瘦骨
 從血液裡撈起合謀的種子
 它的中心
 欲望在啃噬
 膨脹的軀體

而灼熱的嘴唇朝向門去
 乾燥的眼睛聽不見，此刻
 窗外淚珠般溫存的細雨
 彈起懺悔的夜曲
 風則從海的臂彎裡掙脫
 一路揚起積壓的貞操
 却又遺落了綠頭巾
 飄在單相思的心上
 樹操起手勢
 草喃喃嚙語
 彷彿想着一個太古的傳說
 春初潮了……

(美國) 劉宏平

我知道，我知道
 今晚我早發的朦朧詩意
 難再揮灑噴湧，追隨着你
 演奏力之旋舞
 只有佇立窗前
 靜靜地等待
 昨夜我出走的思绪
 會在濕淋的曠野
 托起清甜清甜的朝露
 重綻新綠

政治笑話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國內) 泰恒

沈陽某中學的牛棚裏又添了三名新成員：一位語文教師，一位生理衛生教師和一位英文教師。

在「牛鬼蛇神」們做完一天苦役並在毛像面前晚懺悔之後，監視人員離開了牛棚。三位新「牛鬼」聚集一起互相訴說自己的遭遇。

語文教師：「我的一位學生有次做詞句解釋，把『無毒不丈夫』解釋成『不狠毒的男子；又結不了婚』。我批閱時作了如下的批注：『此處丈夫特指偉大人物而非普通意義之丈夫。』想不到我這個批注今天竟成了『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鐵證。』你說冤不冤？」

生理衛生教師：「我才冤枉呢！我是在一次課堂上講了『正常的人大約有一百萬根頭髮。』就被指為『含沙射影攻擊偉大的副統帥，惡毒污蔑副統帥神經不正常，無法無天。』」

英文教師：「我更倒楣。有次我給學生解釋詞，對學生說：『RIGHT意思是對，正確。』我用的完全是詞典裏所下的定義。誰料到竟會被分析上綱為右派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對黨的歷次政治運動耿耿於懷。」

(英文教師怒不可遏，大聲喊叫起來)。

這時，過來一位老牛神，對英文教師輕聲說道：「你當心點！這牛棚裏有臭虫，誰說話，專咬誰。」英文教師領會了他的意思，緊咬嘴唇，不再說下去了。

註：臭虫的英文是BUG，但另一個意思是竊聽器。

中國民聯擴大招收盟員 啓 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成立已有一年。各地分支機構經過整頓，整個團體已經穩定下來。一個遍及五大洲、海內外配合運作的、爭取中國民主的組織架構已初步建立，現在，是健全並使之豐滿的時候了。

過去，有些人認為中國民聯為一秘密團體，不公開招收盟員。還有人認為，中國民聯只吸收大陸留學生，不歡迎香港、台灣學生及華僑參加。這些，實際上都是誤會。中國民聯是一個光明磊落的、爭取在中國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群眾團體，中國民聯的大門始終是向所有嚮往民主的中國人敞開的。

在此，我們宣佈公開擴大招收盟員。

- 一、凡贊同中國民聯章程者，不論其身份，均可申請入盟；
- 二、入盟者是否公開，中國民聯尊重入盟者的選擇。
- 三、欲入盟者可向總部及各地聯絡站索取章程和申請表。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

捐款獎勵優秀作品 ● 徵文啓事 ●

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中國之春雜誌創刊兩周年紀念日。中國之春堅持了兩年，近幾期愈辦愈好，對中國政局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為了支持中國之春雜誌，鼓勵各界人士踴躍投稿，愛護這棵民主幼苗，我準備捐助貳仟美元做為獎金，獎勵自第二期至第二十六期即將發表的優秀文章。獎金為：一等獎——壹仟美元；二等獎——陸佰美元；三等獎——肆佰美元（此外，編輯部將另付正常稿酬。）

評獎的辦法為：編輯部發出調查信，在廣泛徵求讀者意見的基礎上，由編輯部作出決定。徵文的要求如下：

- 1 文章內容與中國民主前途有關；體裁（論述、報導、文藝作品）不限；
 - 2 文章要力求有新的創意。
 - 3 徵文截稿日期為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
- 敬請大家踴躍投稿。

加拿大溫哥華僑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近期徵稿 啓 事

一、中國之春近幾期的專題如下，歡迎撰稿人圍繞這些專題寫稿：

- 1 世界各國民主政體之比較；中國需要何種形式的民主政體；
- 2 經濟發展了，可自然推動政治民主嗎？
- 3 溫元凱改革模式的評估；
- 4 留學生的心聲（反映他們的學習、生活、思想變化、回國後待遇等各個層面）；
- 二、此外，凡探討中西方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稿件，不拘形式、內容，均表歡迎。本刊亦歡迎留學雜感、消息報導、時事評論和評論中國之春雜誌的有關內容等文章。

- 三、投稿人身份不限，但本刊尤為歡迎中國大陸公自費留學生及訪問學者投稿。
- 四、本刊稿酬每千字廿五至卅美元。優秀作品稿費更高。
- 五、本刊編輯部對投稿者的情況絕對保密。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港澳聯絡站：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
好望角大廈21樓3E2室 電話：3 318387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
四十六號信箱

澳大利亞墨爾本聯絡站：

G.P.O.Box 376 F
Melburnue, VIC (3001) Australia

澳洲雪梨支部聯絡信箱：

P.O.Box K522, Haymark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歐洲巴黎聯絡站：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歐洲西德聯絡站：

Postfach 9505
4800 Bielefeld 1 West Germany

歐洲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el 020-999037

歐洲比利時聯絡站：

P.B. 246
5000 Namur Belgium

非洲毛里求斯聯絡站：

已成立，聯絡暫經總部

加拿大蒙特利爾聯絡站：

P.O.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加拿大多倫多聯絡站：

P.O. Box 23 Station G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4M 3E8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 Box 94052
Richmond Postal Station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A2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1827 Haight St. Box 100
San Francisco, CA 94117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 Box 74
Monrovia, CA 91016 Tel: (818) 357-4363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Mr. Bell M. S. Wong
9453 Cloverdale CT.
Burke, VA 22015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 Box 42821, No. 806
Houston, TX 77042 Tel:(713)879-7107

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聯絡站：

P.O. Box 42561 Sun Station
Tucson, AZ 85733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O. Box 7122 Pittsburgh, PA 15213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P.O. Box 16061 Chicago, IL 60616-0061

美國波士頓聯絡站：

P.O. Box 2438
Boston, MA 02208

總部聯絡信箱：

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機關刊物中國之春月刊(中文版)

-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 通訊處：(美洲)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21字樓3E2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
-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 (718)507-6442
(香港) 3-318387
- 零售價：(美) 2.00美元 (加) 2.50加幣 (港) 6.00

SECON CLASS
PENDING
FLUSHING N. Y.
ISSN 0735-8237

Lee, T.P.
19-25#8444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